

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七册

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七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1)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附件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 (39)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

会谈上的声明 …………… (42)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三：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

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 (45)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47)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

的通知…………… (65)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 (68)

-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78)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 (114)
(一九六三年九月)
- 奋发图强, 勤俭建国…… (116)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
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决定…… (124)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力争超额完成一九六三
年度棉花收购任务的指示…… (129)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棉花生产工作的决定…… (133)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 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交通
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草案)…… (137)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国务院批转试行)
-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谭震林、聂荣臻《关于
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 (142)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
纪要》的指示…… (237)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商业各部门
财务和管理工作的决定…………… (263)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267)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
当前市场方面资本主义势力活动情况和加强
旺季市场管理的报告》…………… (293)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周 扬 (300)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 发明奖励条例…………… (315)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国务院发布施行)
- 技术改进奖励条例…………… (320)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国务院发布施行)
-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325)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
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
的报告…………… 李先念 (357)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383)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监督
工作的指示…………… (413)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批示…………… (418)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 过渡计划和长远规划…………… 周恩来 (440)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 比学赶帮，齐争上游…………… (446)
- 论各地工业企业之间比先进、学先
进、赶先进、帮后进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451)
-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
骄傲自满的指示…………… (487)
- 批转湖南省委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 毛泽东 (490)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在春耕前普遍讲解一次
两个文件的指示…………… (492)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

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

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

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覆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

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

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

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

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

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于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

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〇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

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

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

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

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做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要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〇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

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〇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

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

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覆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

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

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

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

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

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political、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附件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的意见提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 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 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 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 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

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 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 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 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 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 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 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有关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附件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 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

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今后我们准备在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我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别人接受。赫鲁晓夫同志在这

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附件三：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 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

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

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

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

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

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

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

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做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

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

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总政治部：

从去年以来，到北京各中央机关要求解决工作安置、户口迁移、生活困难等各种具体问题的群众日渐增多。在今年内，每天达到四五百人次。从现在的情况看，还有增加的趋势。许多群众之所以要千里迢迢地跑来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在原地方、原单位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没有得到较满意的解决。如此众多的群众到北京要求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这给中央机关的工作增加很多困难。对于群众本身来说，这样往返奔波，不论在经济上、时间上，也都是很大的负担。这个问题亟需解决。现在把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1〕}，转发给你们参考。中央和国务院认为，这个报告里所提的改进工作的意见，都是可行的。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组织的接待人民来访的单位，应当加强工作。群众提出的各种要求，凡是合理的、现在可以解决的，都应当负责地、及时地给以解决；不合理的、现在还不能解决的，都应当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委，应当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努力做到使群众的各种具体问题就地解决，以免他们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四处奔

跑。为了加强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组织的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的工作，中央和国务院特作以下规定：

（一）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都要有一位领导同志主管这项工作。一九五七年底，曾经根据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的建议，确定中央各部门由一位部长，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由一位书记，人委由一位省长或者市长，管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这个规定应当仍然有效。如果主管人已经调离了的，应当重新确定。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必须真正管起来，要经常对这项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和帮助，要亲自处理一些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要把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到本机关的会议上研究解决。

（二）对于人民群众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在中央、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一般是采取归口处理，即是依靠各个专业部门，结合他们的业务工作，进行处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共同制定了《关于中央机关接待和处理人民来访的几项规定》，按照问题性质和业务系统作了分工。中央各部门应当按照分工的规定，对于归自己处理的问题，负责进行处理，不能推诿。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也应当根据情况，在各业务部门之间规定适当的分工。

（三）省、地（专）两级的党政机关，对于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应当力求多办，少往下转。一些重要的问题或者下级机关难于解决的问题，必须直接处理。

（四）县的党政机关，对于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一般应当做到只办不转。

（五）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组织，在这次“五反”运动中间，应当对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的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总结工作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把这项工作切实

地加强起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本书从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今年的全国农业生产，总的说来是好的。不少地方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大部分地区，今年的小麦、早稻和中稻已获丰收，秋熟作物也丰收在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的自然灾害却很严重。从去冬今春以来，全国多数省区曾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旱风虫等灾害；其中，一部分是往年常有的一般灾害，一部分是历史少见的严重灾害。黄淮平原的河北、河南等省区，七八月间突降暴雨，发为洪水，灾害集中，程度深广，因灾绝收和基本绝收的田亩比例较大，牲口、农具、房屋、被服和生活用具等等，损失比较严重。南方的广西、湖南、云南等省区，由于长期持续的干旱，减产也比较严重。尽管如此，全国算总账，一九六三年预计，棉花将比一九六二年增产，粮食也可能稍有增加，要待秋收确定。

整个农村仍然是大好形势。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和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继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由物质变精神的第一个飞跃之后，正在进入由精神变物质的第二个飞跃的过程中。

在黄淮平原的洪涝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立即发出了生产救灾的紧急指示，号召灾区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

斗争，战胜灾荒；号召非灾区和轻灾区努力增产，以丰补歉。遭受这次洪水袭击的地区，各级干部、党团员、工人和农民的绝大多数，在防汛抢险、救人救畜和抢救物资当中，充分表现出舍己救人、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许多轻灾区和非灾区的干部和人民，在支援灾区的工作中，也尽了一定的力量。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在抢险救援的工作中，表现出日以继夜、奋不顾身的雷锋精神。他们都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表扬和尊敬。

现在，防汛抢险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心任务是救灾渡荒，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受灾地区，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再接再厉，坚持斗争，不盲目外流，就地搞好生产，渡过灾荒，并且为一九六四年的农业丰收创造有利条件。为此，现做如下的决定：

（一）救灾工作的根本方针。

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这是救灾工作历来采取的根本方针。这个方针的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救灾渡荒的力量大，办法多。靠群众，靠集体经济组织，自力更生，节约渡荒，而不是单纯依赖国家救济。二是救灾要从积极方面着手，首先抓生产。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就更有力量渡过灾荒。救济也要与扶持灾区生产相结合，使救济粮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单纯的救济。

（二）灾区当前农业生产的中心是排水种麦。

除了抓紧时机，抢种秋菜，加强后期田间管理，力争多收以外，当前灾区的中心工作是排水种麦。在上下游兼顾的原则下，顺水归槽，排除积水，力争被淹土地早日脱水，赶上季节，播种冬麦。在切实保证完成一九六四年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计划的前提下，争取多种冬麦，多种早熟作物，早接

口粮，缩短春荒。

麦种不足的地方，首先用其他粮食向本地农户或者附近生产队调换麦种。把当地夏季征购入库的小麦拿出作种，这比从外省调入种子要好一些；实在无法解决的，再由外省调入麦种。农业、粮食等有关部门，已经安排调给河北、河南等省的麦种，一定要抓紧检查，按时调入，拨到生产队，不误播种。拌种用的化肥和农药，供销合作社等有关部门也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供应，按时调到。

九月份生产的拖拉机和配套农具，首先供应黄淮平原水灾区，抢种冬麦。拖拉机代耕，一般应该收费。某些生产队现时无力支付、明年麦收后能够归还的，可以由银行贷款帮助解决；少数遭灾特别严重的生产队，明年收获以后也无力支付的，可以免费代耕，由国家财政专案报销。

（三）保护耕畜安全过冬，要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一部分被洪水淹没的特重灾区，耕畜损失严重，淹死一批，留下的普遍瘦弱，病疫正在发展。首先，要充分调动城乡兽医人员、特别是大量民间兽医的积极性，开展牲畜治病防疫工作。重灾区实行免费治疗。倒塌了的牲口棚圈，要在风雪严冬到来以前，抓紧修复。

缺乏饲草，是灾区的一大困难。耕畜最起码的饲料，必须同人的口粮一样，切实安排好。必须把一切可以用做饲草的作物秸秆，完全留作饲草，社员自留地的作物秸秆，也要根据合理付酬的原则交队使用。组织社员打草贮草，千方百计地解决耕畜饲草问题。那些淹没时间较久、饲草确实无法解决的地方，应该及早安排，与邻近的专、县、社挂钩，把耕畜转移到就近的有草地区，就草寄养，渡过灾荒。

供销和农业等有关部门，还要积极设法，在明年春耕之

前，从内蒙、新疆等畜牧业基地，调剂一批耕畜，支援灾区。建议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布置保畜工作。必须了解，保畜工作如果做不好，不能防止灾区耕畜的成批死亡，就会更加加重这些地区畜力不足的严重困难，给这些地区明年甚至今后几年的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晌。

（四）副业生产，是生产救灾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这次遭受洪涝灾害虽属平原地区，但副业生产的门路也很多，还大有可为。在发展副业生产的时候，要因地制宜，要根据原料、技术和销路等具体条件，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不能粗制滥造，不能盲目生产。发展副业，是搞生产，而不是搞商业，要以发展集体副业生产为主，也要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帮助社员搞家庭副业，生产渡荒。

供销、商业和手工业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收购推销工作，在不赔不赚的原则下，尽力支持灾区发展副业生产。某些淀洼的周围地区，发展渔业所需的物资，水产部门要尽力协助解决。

（五）灾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发生的几个新问题。

第一，重灾区有一些绝收和基本绝收的生产队，今年秋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集体收入可供分配，他们为了调动社员参加种麦和其他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把社员在灾后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工分合并到明年麦收统一分配。这种临时办法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轻灾队和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体收入可供分配的重灾队，还是以坚持原定的分配年度为好。

第二，有少数绝收的生产队，酝酿全大队统一分配。还有的生产队，土地被洪水冲没，或者水退后沙压变质，不能耕种，耕畜农具损失很大，他们要求向邻近队调整土地、耕畜、

农具等生产资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一方面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必须坚持，除原来就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以外，不要改为全大队统一分配，不要因为遭灾而打乱所有制，不能平调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可以发扬群众互助互济，在真正自愿的原则下，出人工帮助损失很重的生产队修整耕地，出畜工帮助种麦，也可以借给这些生产队一些粮食、农具和生活用具，但是，要保证有借有还。

第三，还有少数社员的自留地被水冲毁了，原则上不能从集体耕地中补拨自留地，也不能从其他社员的自留地中调整，应该设法帮助他们把冲毁的自留地整理修复起来，或者另开小片荒地来解决。也不允许社员利用重修房屋的机会，多占宅基地，扩大自留地。

（六）安排好灾民生活。

第一，灾民最起码的口粮，国家应该保证供应。但是，遭灾以后的口粮标准，应该低于常年。以生产队为单位计算，因灾减产，每人每天的口粮平均不足半市斤的，国家尽力供应，保证吃到半市斤。对于参加种麦等集体生产的劳动力，对于参加堵口复堤和恢复被水冲毁的水利、交通等工程的劳动力，都要给以适当的照顾。为了保证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棉花等集中产区农民的口粮水平，也要给以适当的照顾。灾民的口粮，应当是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要提倡节约用粮，计划用粮，尽力收集瓜菜等代食品，补充口粮之不足。

半市斤口粮是个平均数，可以忙时多吃一点，闲时少吃一点；可以参加劳动的人多吃一点，不参加劳动的人少吃一点；可以全部按人口平均分配，也可以拿出一小部分，例如百分之十左右按劳分配，百分之九十左右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四属户、五保户和贫下中农的困难户的口粮，应该给

以照顾，并且要认真安排落实。

第二，对于衣被漂没、无以御寒的灾民，国家已经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成衣、布匹和棉花，要保证在冬季到来以前供应到他们手中。

第三，房屋倒塌、无处安身的灾民，可以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劳动力，利用原有的砖瓦木料，抢修一部分房屋。木料冲走、无可利用的，由木材销售部门帮助解决。一定要在冬季到来以前，使无住房的灾民每户有一间临时房子安身御寒。全部倒塌房屋的修复要有一个分年计划，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修庄台，抬高宅基，尽可能多修砖墙，少修土墙，以免年年水淹倒塌，年年重修。

修房用工，除了五保户由生产队开支，劳动力少的四属户和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由生产队酌情照顾以外，一般应该是由房主的劳动工分中扣还。

修房所用的物料，由房主负责。房主一时无现款购置修房物料的，可以由信用合作社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酌情贷款扶助。房主在长时期内无力购置修房物料时，可以由救济款解决。

第四，缺乏烧柴的灾区，做饭和冬季御寒的煤炭供应，要安排落实，及时运到灾区。

第五，水灾引起的流行病，要组织一批医药卫生力量，积极治疗。要搞好灾后的环境卫生，避免病疫的蔓延。治病一般应该收费，困难的四属户、五保户、贫下中农的困难户和其他生活确实困难的社员，可以减收或免收。

救济灾区的粮食、布匹和煤炭等，由粮食、商业等部门按牌价供应。灾民有现钱、有存款的，可以备款购买；确实无力购买的，由国家发放救济款帮助解决。救济粮、棉、布等的分配和救济款的发放，都要经过贫农、下中农和全体社员民主评

定，张榜公布，社队各级干部不许专断，更不许多吃多占。多吃多占的，要从严处分。

在灾民生活安排和救济中，对于有计划放水的行洪、滞洪区，应该同一般遭灾淹没区有所区别，给以适当的照顾。

（七）在丰收区和轻灾区多购余粮，支援灾区。

这是安排好灾区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之一。丰收区和轻灾区，重灾区内的丰收社队和轻灾社队，都要全力做好后期田间管理，力争多收，做好收割和打场，力争收净，多收一斤是一斤，颗粒还家。并且要在农民群众中加强宣传“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号召他们多卖余粮，支援灾区。

供销合作社等有关部门，要在全国各地，积极收购枣子、柿子、橡子、薯干、瓜菜和其他代食品，供应灾区，补充灾民口粮之不足。

救灾工作也要城乡结合。城市除了加紧生产灾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以外，还要号召广大的干部、职工和部队节约粮食，支援灾区。特别是遭灾严重的省区所属的城市以及邻近灾区的大城市，应该更深入地动员干部职工群众节粮救灾，暂时适当降低口粮标准，这对加强城乡互助、巩固工农联盟有重大的意义。

（八）堵口复堤，修复被水冲毁的水利工程。

河道堤防，排灌设备和其他水利工程，在这次特大洪水中遭到很大的破坏。恢复这些工程，对保障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保障明年的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抓紧今冬明春的农闲季节，积极进行。另一方面，正由于这些工程的破坏很大，并不是一个冬春能够全部恢复的，又要分别轻重缓急，在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分批分期修复。修复这些工程，必须做好勘察设计，加强技术指导，保证工程质量。同时，还要乘

机加以整顿，该修复的积极修复，不该修复的就不要修复。长期存在的阻水堤坝和渠道等水利纠纷，也要乘机加以解决。冲毁的中小型水库，当前都不再修复，以后结合整体规划另做处理。没有冲毁的中小型水库，也要经过检查和水文计算，分别采取废除、改建或者整修加固等不同办法处理。受这次洪水袭击、局部损坏的大型水库，应该抓紧整修和加固工作。

修复水毁工程的民工的工资补助，可以参照现行规定的标准适当降低，不能提高。堵口复堤和修复水利工程，实际起着以工代赈的积极作用，既做了工程，又救济了一部分灾民，保护了精壮劳动力，有利于明春的农业生产。

（九）黄河、淮河和海河的全面治理，要列入国民经济建设长期计划。

黄淮平原是我国麦子和棉花、油料、烟叶等主要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占的比重很大。但是，这块地区历来是多灾地区，春旱秋涝，土壤盐碱化，农业生产极不稳定。棉、油、烟等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升降的幅度也很大。粮食，全区算总账（不包括京、津两市），丰年可以勉强自给，灾年就要大量调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大块地区农业生产的这种极不稳定的状况，给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今年黄淮平原的特大水灾，使这个问题更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对于黄河淮河和海河这三大河系，必须制定一个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规划，列入国民经济建设长期计划，在若干年内，分批分期地逐步进行。并且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直属国务院，统一领导这项工作。

（十）被这次洪水冲毁的铁路、公路和电讯设备，要力争早日恢复。

在修复铁路、公路的时候，应该根据水文资料，增加应该

增加的桥梁涵洞，加大桥梁涵洞的过水能力。

水毁的工矿企业，农场、林场和拖拉机站等农林企业，在恢复过程中，都应该逐个审查，分别对待。该修复的，集中力量及早修复。本来可以停止生产的工厂和本来布局不适当的拖拉机站等等，就不要修复。

修复工矿、交通、农林、财贸和文教等单位水毁工程所需要的设备、物资和费用，分别由各部门归口审查核实，报计委和经委审查批准，列入国家计划。

灾区救济费和医药补助费，救灾用的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和机耕费用等生产补助费，堵口复堤经费，以及工矿、交通、农林、财贸和文教等水毁工程、建筑物和设备的修复费用，加在一起数目很大。如果安排不当，势必大大影响一九六四年的基建投资，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为了缩小这种不利的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必须开支的，首先动用本地区、本部门一九六三年的财政收入和经费余额，加以解决；一九六三年的财力解决不了的，可以在一九六四年计划安排的基建投资和事业费中调剂解决。要由财政另列专项开支的，首先动用地方财政节余，不足部分再由中央财政统一安排解决。

（十一）今冬灾区的劳动力，要统一安排。

今年冬季，灾区的各项工作是很紧张的。小麦等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堵口复堤、水利和交通等水毁工程的修复、水冲沙压的农田整修、冬季积肥和副业生产以及倒塌房屋的修复，等等，都要同时进行。劳动力的统一安排是一件大事，必须做好。为了保护劳动力，既要参加劳动的人在口粮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又要考虑到重灾以后人们的体质下降和粮食不足等条件，冬季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给劳

动力以适当的休息，以免影响明年的春耕生产。

（十二）加强灾区的领导和政治工作，防止灾民盲目外流，坚持就地搞好生产，争取明年农业丰收。

生产救灾工作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工作，要求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一批干部，深入灾区，核实灾情，帮助社、队干部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使灾区生产和灾民生活的安排真正落实到队到户。灾区的干部和群众，对于生产救灾、节约渡荒是有经验的，各级领导要及时组织经验交流，把生产救灾工作做得更好。

在生产救灾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团组织的作用和贫下中农组织的作用。加强灾区的政治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管制，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乘机破坏，严防他们煽动灾民盲目外流。通过生产救灾，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采取回忆对比的方式，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巩固集体经济。依靠贫农下中农，反对盲目外流，坚持就地搞好生产，安排好生活，保证人畜安全过冬，把冬麦种好管好，并且整好地，多积肥，做好明年春耕以前的各项备耕工作，以便迎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争取一九六四年农业丰收，首先是麦季丰收，把今年遭灾损失的粮食和棉花，在明年夺回来！

* * *

这个决定主要适用于黄淮平原水灾区。决定中提出的救灾工作的根本方针、政策和其他一些原则要求，对其他灾区也是适用的。至于其他灾区的一些具体问题，另行安排处理。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

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

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

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

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1〕}。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2〕}。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

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地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3〕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

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4〕，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5〕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6〕。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

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7〕} 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8〕}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

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9〕。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分”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

成分。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分”，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分”的农业组织，都不

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地地道道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须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国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〇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

（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

的分配，这就使他們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10〕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

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11〕。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12〕。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

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国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

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 （一）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 （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 （三）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 （四）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 （五）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 （六）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 （七）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

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铋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

“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〇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

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U—2飞机事件。一九六〇年美国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〇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

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

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

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

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倡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

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回避了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 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说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只是浪费时间”，“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

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

铁托集团，联合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

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2〕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纳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纳尔约合一元人民币。

〔3〕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4〕卡德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词。

〔5〕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6〕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7〕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8〕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9〕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10〕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11〕巴卡里奇：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2〕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见《集体经济年鉴》，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月号，贝尔格莱德印行。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的强国*

(一九六三年九月)

毛 泽 东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

* 这段文字是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的。

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奋发图强，勤俭建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我国人民怀着无比欢欣的心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热烈庆祝我国十四年来的伟大成就，热烈庆祝一九六三年的伟大成就。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时候，我国人民高兴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开始全面好转的新局面。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已经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了。

国民经济的开始全面好转，首先表现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年多来，我们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交通部门的工作和整个经济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动员和集中了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力方面，积极地支援了农业，支援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

悟, 进一步发挥了农民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农村基层干部贯彻执行了一九五八年党中央的决定, 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城市知识青年也踊跃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所有这些, 都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今年, 虽然有局部地区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或者旱灾, 但是, 预计全国农业总收成仍然超过去年。大牲畜和猪、羊等家畜家禽也比去年有较大的增长。在许多地方, 出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面增长的好形势。

由于农业的进一步好转, 由于工业部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由于广大职工积极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各工业部门的生产稳步上升。今年以来, 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 绝大多数比去年同期增长。大部分产品的质量继续提高。产品的品种和规格不断增加。在降低产品成本、降低物资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 也有很大成绩。在调整过程中, 我们努力逐步地建立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尽量提供适合农业需要的各种机械、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等生产资料; 同时, 基础工业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这样,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就进一步协调起来。石油、化学、钢材的稀缺品种等产品的生产能力, 都有了新的发展, 并且开始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新兴工业。

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好转, 市场情况也有了显著改善。供应人民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继续增加, 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继续稳定并且有所下降, 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国家的对外贸易计划完成得很好。国家的财政计划也完成得很好。

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 也取得了很

多新的成就。教育工作方面，积极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科学和文化工作方面，积极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大知识分子，热情地为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服务，密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更加欣欣向荣。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进一步证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根据这条总路线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十分清楚，只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进行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历史时期内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人民公社制度日益发挥出它的巨大优越性。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坚决遵循了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因为我们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因为我们在广大城市和农村中，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进行了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是因为我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结果。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时候，我国人民高兴地看到，国际形势正在继续向着有利于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任何血腥镇压和欺骗手段，都不能阻挡这一伟大的历史潮流。

欧洲、北美、大洋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 有了新的发展。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继续存在, 被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核备战和核讹诈的斗争, 正在广泛展开。保卫世界和平的队伍,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大。

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 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由于它到处进行侵略, 妄想称霸全球, 因而处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 越来越陷于孤立。

在过去一年中, 中国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努力争取实现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进一步加强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友好关系。

正因为这样,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 对中国人民就特别仇视。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国, 妄想把中国孤立起来, 把我们压垮。但是, 伟大的、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 在反华大合唱的乌烟瘴气里, 巍然屹立。我们河里的鱼照样游, 我们山上的草照样长, 我们林园中的鸟儿照样歌唱, 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 照样勤奋地劳动, 愉快地生活, 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在我们看到当前国内和国际大好形势的时候, 必须同时看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 也还会给我们

制造这样或那样的麻烦。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必须继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经过长期努力，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打倒了强大的国内外反对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人民也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互相支援下，把我国建设成为拥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把勤俭建国的方针贯彻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中去，是我们过去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后能够继续战胜各种困难，使我国富强起来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道路。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必须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都必须进一步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杜绝各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现象。我们一定要依靠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必须高度地发扬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现在，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起旧中国来，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毕竟还是比较低的。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奋发图强，迎头赶上。

我们还必须十分警惕地注意到, 美帝国主义正在千方百计地推行敌视和侵略中国的政策, 继续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在我们面前, 还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我国领土台湾的神圣任务。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在我们面前, 还有着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义务。所有这些, 都要求我国人民奋发图强, 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 我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迈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五个年头。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进一步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遵循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原则, 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继续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全面的发展。

在农业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和国营农场的职工们, 为争取农业的更好收成而奋斗! 必须在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 用更大努力来加快棉花和烟、糖、油、麻等经济作物的发展, 并且使林业、牧业、副业、渔业有相应的发展。

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和职工们, 为争取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新胜利, 为进一步支援农业生产、改善市场供应和加强国防而奋斗! 继续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品种, 降低产品成本, 降低原材料消耗,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财贸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和职工们, 要努力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这是当前财贸部门的中心任务; 要做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做好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工作;

要加强财政管理和金融管理，促进各方面增产节约，开源节流；更好地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奋斗！

在科学、文化、教育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我国的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的质量，为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加强国防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民兵同志们，要不断地提高军事技术和政治水平，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保卫自己祖国的安全，保卫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各个战线的同志们，要贯彻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

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的一千八百多位朋友们和同志们，同我们一起欢度节日。我们谨向这些朋友们和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衷心感谢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我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决不容许任何人破坏的，也是谁也破坏不了的。

我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国人民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加强同

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 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国人民一定要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 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的斗争, 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 充满着无限的信心。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 曾经庄严地宣布: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十四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 今后的历史将继续证明,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努力, 在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之下, 一定能够胜利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 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国家 支援农业资金的决定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几年来，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些资金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在资金的使用上还缺乏通盘规划和严格的制度管理，也发生了一些浪费资金和挪用资金的现象，使部分资金没有能够收到应有的效果。今后，国家将继续增拨支援农业的资金，大力支援农业生产。为了使这些资金能够充分发挥效益，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为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服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除了建立各级农业资金管理小组，加强支援农业资金的统一管理以外，还有必要从上而下地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的各级机构，把过去由财政部门直接拨付的各项支援农业的资金和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各项农业贷款，统一管理起来，并统一领导农村的信用合作工作。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现在就立即进行筹备工作，力争在一九六三年内把农业银行各级的机构建立起来。为此，特作出如下的决定：

一、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家设立的专业银行，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办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拨付和贷放。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包括国家对农业、林业、牧业、水利等事业的

投资和经费支出，包括国家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拨款和贷款。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由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上级分配的指标范围内安排确定。中国农业银行按照国家的计划、预算、政策和制度，按照既经确定的拨款额度、费用标准和贷款指标，逐笔审查核实，然后拨付和贷放。农业资金管理小组、有关主管部门和中国农业银行，对支援农业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当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随时总结经验，及时反映情况。对违反计划和预算、违反政策、违反制度、浪费资金的现象，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中国农业银行的具体任务如下：

（一）监督支付国家对农业、林业、牧业、水利等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的拨款，仍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监督拨付）。

（二）监督支付国家对农业、林业、牧业、水利等事业单位的事业费用。

（三）监督支付国家对农场、林场、牧场、渔场、拖拉机站、排灌站等国营农业企业的各项财政拨款；办理这些农业企业的贷款。

（四）监督支付国家对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各项财政拨款；监督支付国家对农村的救济费；办理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和社办企业的各项贷款。

（五）协助农业部门，辅导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财务会计工作。

（六）协助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支付商业部门在农村发放的各项农产品预购定金。

（七）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吸收农村闲散资金，发放贷款，帮助贫农下中农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打击高

利贷。

（八）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在农村的存款业务；办理中国人民银行委托的现金管理和其他业务。代办这些业务所吸收的资金，应当全部转交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不得自行支配。

三、中国农业银行实行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办理拨款收取手续费，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中国农业银行办理拨款，是代替财政部门监督支付国家预算所列的资金。中国农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1）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已经贷出的农业贷款资金，全数拨给；（2）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尚未贷出的可用农业贷款指标，作为周转指标，由农业银行继续使用；（3）今后国家预算增拨的农业贷款资金；（4）各级地方财政拨给中国农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资金。

中国农业银行的盈余，上交国家财政，发生亏损，由国家财政弥补。中国农业银行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经济往来，按业务往来的关系办理。

四、中国农业银行的各级机构，在业务上实行垂直领导。有关业务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经国务院批准后，由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下达，或者同有关部门联合下达。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要督促当地农业银行贯彻执行总行下达的计划和制度。中国农业银行的日常工作，由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领导。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本地区的计划指标范围内，有权按照中央和上级的有关规定作适当的调剂和安排。

地方财政的拨款和地方财政拨给的农业贷款资金，它的使用计划和管理方法由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决定。

各级农业银行在有关财政拨款方面，应当和同级财政部门密切联系协作，共同做好工作。各级农业银行的信贷计划和现金收支计划，必须抄送同级人民银行，纳入统一的信贷计划和

现金计划。各级农业银行要严格地执行国家的现金管理制度。

五、中国农业银行自上而下建立垂直系统。中央一级设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省、市、自治区设分行，专区设中心支行，县设支行。区或相当于区的农村人民公社设立营业所。

中国农业银行的编制总额，规定为十三万五千人。专区以上各级行的人数四千人，县支行一级的人数四万一千人，营业所一级人数九万人。这十三万五千人的来源是：（1）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现有人员中抽调七万五千人；（2）从中国人民银行现有未全额的编制中拨给一万人；（3）新增加编制五万人。中国人民银行应将现有的农村金融工作人员，全部划归农业银行，并且给他们配备一批会计人员和领导干部。新增加的编制，连同中国人民银行转来的编制名额，由各地党政负责调配。这些干部可以从现有干部中调配一批，可以从现有信用合作社干部中选拔一批，也可以招收一部分高中、初中毕业学生。调配干部时，要注意搭配一部分领导骨干，要尽可能从有关部门抽调一部分熟悉农业财务和拨款业务的干部，充实这方面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新增编制名额多少，以及需要相应增加的工资指标、口粮指标，由国家编制委员会会同劳动部、粮食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下达。

管好用好农业资金，县一级的领导是重要的环节。必须加强中国农业银行县支行的领导力量，以便协助县委做好这项工作。县支行行长应当选择得力的干部担任。

中国农业银行需要的房屋，由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负责，在当地现有的房屋中，设法调剂解决。需要的家具从各部门现有的家具中抽调解决。

六、建立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家加强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将有利于管好用好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发挥资金的

效果，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有利于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更好地实行自力更生、勤俭办社的方针。

中国农业银行的工作是很复杂的，涉及的面很广，政策性很强，任务很繁重，既要管财政拨款，又要管银行贷款，既要管基本建设投资，又要管事业费用和其他开支。要求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特别在开始建立时期，更要切实抓紧；要求各个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密切同他们协作，从各方面给予支持，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要求农业银行的同志，兢兢业业，虚心学习，努力钻研业务，努力做好工作。农业银行需要建立的工作很多，要分别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开展和深入。在新旧机构交接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工作的衔接，防止脱节现象。

请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抓紧如期建立机构，配备干部，以便迅速开始工作。有关建立农业银行的若干具体问题，另行下达。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力争 超额完成一九六三年度 棉花收购任务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委员会：

棉花收购旺季已经到来。各产棉区应当立即动员起来，抓紧时机，大力开展棉花收购工作。今年的棉花生产，虽然有河北、河南等省遭到了严重水灾，减产较多，但是全国大多数地区棉田面积比去年有所扩大，棉花生长情况良好，总起来看，棉花产量仍然可比去年有较大的增长。经过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今年全国棉花统购计划确定为一千五百四十万担到一千六百一十八万担（分省、市、自治区的计划见附表^{〔1〕}）。换购的棉花不在内。中央、国务院要求产棉区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在今后几个月内，切实抓紧棉花收购工作，努力做到多收获、多收购，把应该收购的棉花全部收购起来，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今年的棉花收购任务。为此，特作以下指示：

一、认真贯彻执行“及时收购，同时安排”的方针和棉花统购政策。

各地应当根据生产队的棉花实际产量，按照国家规定扣除棉农自留量以后，把应当收购的棉花全部收购起来。分散产区在扣除棉农自留量以后，多余的棉花，也应当进行统购。

生产队超产的棉花，应当用统购的办法收购起来，不应当实行换购的办法。今年许多地区的棉花超产较多，如何把超产的棉花及时地收购起来，做到以丰补歉，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复宣传多交售棉花，对于支援国家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增加社员收入的重要意义，力争把超产的棉花收购起来。在受灾减产的地区，也要结合生产救灾加强棉花收购工作，动员棉农适时采摘棉花，尽量减少损失，多收购一斤是一斤。

二、对于棉农个人出售自留棉和自留地、小片荒地生产的棉花，可以按照收购生产队棉花的办法进行奖售（但不应奖售化肥，可以改奖一些日用工业品），也可以用棉布进行换购。换购的标准，继续执行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国务院关于用棉布或其他工业品换购社员自留棉办法的规定。也就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平均计算，每换购一斤皮棉，除了按照国家牌价付给价款以外，同时发给五市尺布票。换购的时间，必须在全省完成棉花统购任务以后，并经国务院批准，不要过早地向群众公布。换购的棉花，全部上缴中央，地方不再分成。

三、产棉区供销合作社必须集中力量踏踏实实地开展棉花收购工作。棉花收购网点要设置好；收棉站的验级、过磅、出纳、会计和保管人员要配备齐全，这些人员都应当由正式职工担任；苫垫器材、包装物料要准备充足，有些地区包装物料原订计划较小的，应当及早调整，及早调拨；加工力量要安排妥善，做到及时加工，并要争取多剥取一些棉籽短绒。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及时督促检查，迅速解决存在的问题，努力做到收购好、加工好、保管好和及时调运。

对于生产队的种籽棉，只收购皮棉，不收购籽棉。如果生产队委托供销合作社轧花厂代为加工种籽棉的时候，供销合

作社的轧花厂应当分收、分存、分轧，坚决避免棉种混杂，保证做到原籽返还原队。对于留种棉以外的棉花，应当尽可能多收购籽棉，少收购皮棉。有关棉油统购和棉籽、棉饼返还等问题，应当按照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收购籽棉和皮棉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在收购、加工、保管和调运过程中，都要注意防火、防盗、防止霉烂损失。一九六二年由于保管不善，损失棉花二万二千五百多担，今年应当力求避免。

四、必须做好产棉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对于棉农的口粮，要切实安排好，保证他们的吃粮水平不低于邻近产粮区农民的口粮标准。粮食部门对于产棉区的粮食供应，应当力求在品种上和质量上有所改善，以鼓励棉农生产和交售棉花的积极性。

收购棉花需用的奖售物资，要迅速调运到基层，保证及时兑现，不要失信于民。由于棉花收购数量增多，需要增加的奖售物资，也要很好地加以安排。

各级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应当密切配合，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做好产棉区的商品供应；供销合作社还应当积极组织地方手工业品和农村副业产品的货源，努力满足棉农生产和生活需要，促进棉花收购任务的完成。

五、切实加强市场管理。无论城市或农村，无论集中产区或分散产区，棉花、土纱、土布在任何时候都不准进入集市贸易。棉农个人的自留棉和自留地、小片荒地生产的棉花，如果需要出售的时候，只能卖给国家，也不准进入集市贸易。对于商品性的土纺土织，应当一律禁止，灾区也不例外。最近有些地区已经出现棉花、土布的黑市交易和投机贩运活动。各地工商行政、公安、税务、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交通运输等有

关部门，应当在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依靠广大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市场管理。对于黑市交易，必须严格取缔；对于投机倒把分子，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三年棉花统购计划表》，本书从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棉花生产工作的决定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去年农业的增产，促进了今年整个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而今年的农业增产，特别是棉花的增产，又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地全面好转。今年，农业生产虽然在局部地区遭到了大旱大水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到了四亿五千万亩，但是，比去年的受灾面积五亿五千万亩要少，绝大多数地区是风调雨顺的。就全局来看，农业仍然是继续增产的局面，不少地区获得了大丰收，特别是棉花生产，取得了更好的收成。

(一) 一九六三年，全国棉花计划保收六千万亩，实际播种了六千四百八十八万亩。这就保证了在严重的水灾情况下，今年棉花实收面积仍然有可能接近六千万亩。根据今年八月来北京开会的十五个省、市、区（不包括河北、河南两省，甘肃、贵州两省未到会）留有余地的估计，可以产皮棉一千六百万担左右，加上河北、河南灾后可能收到的棉花，全国棉花总产量仍有可能达到二千万担左右，仍比一九六二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因此，今年原定一千七百万担的收购计划，包括换购在内，必须力争完成。

(二) 根据八月棉花会议各地自报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水平分析，全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可分为三类棉区。第一类是高产区，包括浙、沪、鄂、苏、赣、新、陕、晋八个省、市、自治区，一九六三年棉田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三点

五，预计总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三，单位面积产量都高于全国平均三十五斤的水平；其中浙江七十四斤，上海七十一斤，湖北五十斤。这类棉区的各省、区，应当向浙、沪、鄂的高产看齐，争取更高水平。第二类是平产区，包括湖南、河北、北京三个省、市，棉田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二，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点二，单位面积产量接近全国平均三十五斤的水平，这类棉区提高棉田单位面积产量的任务是，迅速向第一类棉区看齐，第一步力争亩产达到四十斤左右。第三类是低产区，包括鲁、豫、皖、辽、川、云、贵、甘八个省，棉田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单位面积产量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类棉区亩产首先要赶上和超过全国平均单产三十五斤的水平，尽快地改变低产面貌。我国耕地面积有限，扩大棉田面积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可是提高棉田单位产量是大有可为的。如果全国棉田单产赶上了湖北，甚至赶上了浙江，我国的棉花总产量就很可观。我们号召全国所有棉区，在棉花单产提高的工作上，低产区和平产区应当第一步达到亩产四十斤左右，第二步达到亩产五十斤左右；高产区除浙、沪、鄂继续提高单产外，应当第一步达到亩产五十斤左右，第二步达到亩产七十斤左右，使棉花总产量的增长幅度超过棉田面积扩大的幅度。

（三）各地要继续执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三年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把棉花增产工作一抓到底，切实加强棉田管理，尽一切可能增加棉花的产量。

不管丰产地区或者受灾地区，今年都必须认真做好棉花采摘工作，尽力做到摘干拣净，不丢一桃一瓣，力争多产、多收、多购。

在收购工作中，要坚决执行各项奖售政策。要保证棉农的

口粮及其品种的供应，要保证棉农所需商品的供应。绝对不许棉花进入自由市场。

为了增加纺织工业原料，还要努力增产蚕茧、麻类、羊毛等纤维。

为了协助各地加强棉花工作的督促检查，国务院已经向十六个主要产棉省、市、区的二十五个重点专区、二百三十二个集中产棉县，派出工作组进行工作。

（四）吃饭和穿衣，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大事。随着粮食情况的好转，迅速增产棉花，解决穿衣问题已经成为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一九六四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经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确定，要求达到六千五百三十二万亩到六千六百八十二万亩，总产量达到二千四百四十二万担到二千五百五十三万担；收购量达到二千零七十万担到二千一百八十万担（分省任务见附表）^{〔1〕}。

各地必须在今秋种麦前，把植棉计划落实到生产队，留够棉田，并且安排在高产稳收的土地上。

明年棉花生产，应当继续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三年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特别是对棉农的口粮，应当根据决定作出妥善的安排。现在，根据各地要求，再作如下规定：

第一，一九六四年发放棉花预购定金的比例，提高为占预购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第二，一九六四年的化肥奖售标准，不分南方、北方棉区，一律改为每收购一百斤皮棉，奖售八十五斤化肥；取消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原来规定的十五斤粮食的奖售。

第三，切实做好备种工作，生产队在收棉时，必须做好选种、留种工作，对留种棉要进行分收、分轧，把棉种留够、留

好。受灾地区也要尽量留够棉种，不足部分应由附近的棉区进行调剂。

第四，各地应当在今年年底以前逐级查清现有农药和施药器械的数量、质量，损坏的要在今冬明春修好，不足的提出需要，由供销社供应，以保证明年大力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第五，棉区的技术推广站，应该把指导棉花增产当作主要任务。实行领导、群众、技术干部三结合，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作用，加强植棉技术指导工作。各地应当在总结棉花丰产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开展县、社、队亩产皮棉四十斤、五十斤、六十斤、七十斤、八十斤、一百斤的大面积丰产运动。并号召县、社、队干部，在提高棉田单产方面，分别地区向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湖北、浙江、上海看齐。

为了保证今年和明年棉花生产和收购任务的完成，各地都必须深入地向棉农进行宣传，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说明多产棉花是棉区人民的光荣任务，把广大棉农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棉花生产和收购计划而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一九六四年度棉花生产和收购计划》，本书从略。

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设置 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国务院批转试行）

一、为了建立、健全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严格实行财务、会计监督，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所有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包括建筑安装企业和联合企业所属厂矿）的厂长（或者经理，下同）都应当亲自领导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工作，并根据本规定设置总会计师，作为厂长加强领导这一工作的助手。

没有条件设置总会计师的企业和小型企业，可以先设置副总会计师或者指定专人行使总会计师的职权。

二、总会计师应当挑选高于处（科）长水平的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专业干部担任，一般应当具备的条件是：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能坚持原则，有组织领导能力，具有本单位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对于经济核算、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

担任总会计师的人员，一般不要兼任其他行政领导职务，特别是不要兼任供销副厂长的职务。

总会计师由企业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直接任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厅、局以及各级企业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专

业人材，为全面推行总会计师制度创造条件。

三、总会计师是厂长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助手。他的基本任务是：在厂长领导下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度；组织和推动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工作，负责组织计算与审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技术措施的经济效果，促使企业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监督企业认真执行国家的财经政策、法令和财务、会计制度，遵守财政纪律，维护国家财产的完整，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厉行增产节约，降低成本，增加盈利。

四、总会计师在厂长领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推动企业有关部门实行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监督，协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企业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制度（包括财产管理、资金管理、成本管理、定额管理、会计核算、经济活动分析等方面的制度），并监督其贯彻执行。协助厂长建立、健全企业各部门、各级的经济责任制，使企业的各项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工作都有明确分工和专人负责。

（二）协助有关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组织有关部门，计算和审查向上级提供的产品方案、生产规模方案以及产品设计、技术措施、安排生产和基本建设任务的经济效果，并对这些方案、措施的经济效果实现情况进行检查。

（三）组织有关部门提出企业财务成本计划、产品的定价和调价方案，参与审查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增产节约指标，以保证各项计划、措施的相互协调、相互衔接。

（四）监督本企业认真贯彻国家的有关财务、会计工作方面的政策、法令和财务、会计、信贷、结算等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批准的财务、成本计划，促使计划的圆满实现。

（五）监督企业流动资金、工资基金、大修理基金、企

业基金以及各项专用拨款的合理使用，保证各项资金的专款专用。根据保证生产和节约资金的原则，组织、监督全厂资金的收支平衡工作，促使企业不断地挖掘资金潜力，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六) 监督企业合理使用财产、物资，严格执行财产、物资的验收、领退、调拨制度和保管制度，组织定期和不定期的财产清查，对于财产物资的超储积压、盘盈盘亏、损失浪费，应当查明原因，提出改进措施。

(七) 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关于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划分的规定，正确计算成本、利润，保证成本、利润数字真实可靠。督促有关部门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在生产、供应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上力求节约材料、工资和费用，不断降低成本，增加盈利。

(八) 监督有关部门认真按照会计程序和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好记账、算账、报账工作，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

(九) 负责组织、推动群众性的经济核算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参与有关的经济指标和技术经济定额的制订、修改、考核和评比，促使增产节约措施的实现。

(十) 具体组织全厂的经济活动分析工作，健全厂部、车间、小组的经济活动分析制度，协助厂长定期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议，协同有关副厂长组织有关部门对各项计划、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的或者分项的综合研究和分析比较，找差距、挖潜力，不断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五、总会计师的权限：

(一) 企业内部各职能科室、各车间在经济核算和财务会计工作上，必须服从总会计师的统一组织和业务领导。企业有

关经济核算、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等方面的一般业务性制度、办法，应当由总会计师审查批准。带有重要原则问题的制度、办法，应当由总会计师审查后，提交厂长或者厂务会议决定。

（二）企业上报的财务成本计划、银行贷款计划、产品定价和调价方案、会计报表，都应当由总会计师签署或者会签。对外签订的重要经济合同，应当抄送总会计师一份备案。

（三）对于企业各有关部门提出的不符合经济核算原则和国家制度规定的各种计划、方案、措施、合同，总会计师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对于任何人违反财经政策、法令制度，不执行国家计划、预算，不遵守财政纪律，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上级等违法乱纪行为，总会计师有权进行检查并加以制止，制止无效时，除及时向厂长报告外，并有权越级上报。

（四）企业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免，必须先征求总会计师的意见。财务会计主管人员或者财产物资主管人员调动工作办理交接时，应当由总会计师或者由总会计师指定人员监交。

（五）对于切实遵守经济核算原则，认真执行计划、预算和财务会计制度，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 and 人员，以及对于不讲求经济核算，有意违反财经纪律和财务会计制度，不执行计划、预算，因而使工作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人员，总会计师有权提出意见，报厂长或者厂务会议决定后，分别给以应有的奖励或者处分。

六、总会计师应当定期向厂长或者厂务会议汇报工作，并坚决执行厂长的指示和厂务会议的决议。经常关心企业的全面工作，注意经济核算、财务管理同生产技术管理各项工作之间的配合，对与生产技术、物资供应、劳动奖励等有关的问题，要随时征求有关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意见。

七、企业违反国家的财经政策、法令制度，不遵守财政纪

律，总会计师如果不提出意见加以制止，也不向厂长和上级机关反映的，应当与过失人员负连带责任。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混乱，违反经济核算原则，不讲究经济效果，财产、物资发生损失浪费，总会计师如果不提出意见和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的，应当对这种情况负责。

八、总会计师必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为促进生产发展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而努力。

九、国务院各主管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厅、局，应当根据本规定的原则，订出本部门、本地区工业、交通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具体步骤和办法，并报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刊印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谭震林、聂荣臻《关于全国农业 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

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团体：

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谭震林、聂荣臻同志《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是开得适时的。会议对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形势的估计，以及所提出的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方针和办法，都是正确的。会议所制订的《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山地利用和水土保持等六个专题方案，中央责成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十九个专业和专题规划，责成国务院各有关部和各地方党委与人民委员会在全国统一安排下负责组织实施。会议所提出的十大研究任务，应成为今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全国性的长期的重点，必须大力促其实现，务期在今后十年内做出显著成绩，为我国农业过关提供系统的科学依据。

中央和国务院认为，为了加速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目前采取下列措施是适当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一、在国务院下成立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委员会，委托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负责具体领导；

二、农业科学技术干部，必须尽可能归队，以充实生产、

研究和推广普及的技术力量；

三、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应当逐步按自然区划调整；

四、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推广普及工作的投资和经费，应当有显著的增加，在农业总投资中应占适当比例（这个比例应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加以确定），并须专款专用，切实保证；

五、十大研究试验任务及其所需的投资、经费、劳动工资等，应由国家科委、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逐项作出专门的计划，在目前体制的条件下，其中属于各部门、各地方负责的部分，应由各部门、各地方分别纳入各自的计划；综合性的重大措施，应该列入国家科学事业计划，均应切实予以保证。

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今后都应该经常关心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推广普及工作，并定期检查这一报告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时解决在执行中所发生的各项问题。这个规划的进一步落实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若干修改、补充和发展，以及相应发生的其他问题，今后一律由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处理。

现将谭震林、聂荣臻同志的报告和《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其余附件，供参考。^{〔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

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

主席、中央、国务院：

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从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开始到三月底陆续结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现将会议的基本情况 and 需要请示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会议的情况

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研究了农业发展对农业科学技术的要求。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历次指示，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是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十年规划的目标，是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和二十至二十五年基本完成农业技术改革的宏伟任务提供科学技术根据。大家重新研究了农业发展纲要，认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更加证明这个纲要是既力求先进而又切实可行的，应该成为十年农业科学技术规划的总目标，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应该为实现这个纲要，提出研究试验成果和措施方案。二十至二十五年基本完成农业技术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在头十年期间，必须及早进行有关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若干综合性的根本问题的研究试验，力求能够及早提供更多的科学成果，使今后的农业技术改革工作少走弯路，更加多快好省地进行。

会议研究了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状况。建国以来，农业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开展，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农业科学技术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有了更快的进展。经过近年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更扎实一些。在农业的自然条件与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土地、动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围绕着农业八字宪法，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各项措施，进行了许多因地制宜的研究试验，在若干单科性的工作上，取得了不少可供生产应用的成果。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科学准备工作，也有了初步开展。畜牧、林业、水利、水产、热带作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重大进展。可以说，通过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工作，已经初步建立了分门别类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开始可以比较大量地为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革提供研究试验成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有了相当良好的前进基础。但是，和当前和今后发展的需要来比较，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水平还远远不够。许多综合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试验工作，还没有很好进行；研究机构的布局 and 力量组织，还有待进一步调整；技术推广普及工作与试验基地，还有待进一步充实加强；农业科学技术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还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目前，有必要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和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密切结合农业生产需要，认真总结已有经验，从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出发，制订一个十年规划，更好地组织力量，切实安排，把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引向新的阶段。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四项内容：

一、制订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规划包括了农、林、牧、副、渔、“八字宪法”和“四化”的各个方面，并已概括起来，写成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见附件一）。这次规划的特点：第一，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比较明确。紧密结合农业发展纲要，并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也考虑到农业过关和人口增长、营养提高的关系（见附件三），提出了当前和长远的科学技术任务。第二，全面安排，综合发展，比较全面深入。不仅考虑了农业，而且考虑到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发展；不仅考虑了现有十六亿亩耕地产量的提高，而且考虑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开发利用；不仅考虑了技术措施，而且考虑到经济效益；不仅考虑了生产事业的发展，而且考虑到科学水平的提高。第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做了安排，并明确了重点，既考虑到需要，又考虑到可能。第四，明确了任务，并部分已落实。会议期间，专业组和地区组进行了交叉研究，使大部分任务已落实到具体单位，但也有一部分还需要会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二、讨论了山地利用和水土保持，盐碱土改良，草原利用与改良，海滨、湖滨及河滩地利用，沙漠改造和利用，热带地区的开发利用等六个专题的当前行动计划方案（见附件二），经有关部门研究批准，便可开始行动。

三、交换了有关我国二十至二十五年农业技术改革的意见，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设想（见附件四）。

四、讨论了地方科委如何组织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和各级科学技术协会如何加强农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并进行了适当的安排。全国农业科学技术规划虽然考虑得比较全面，但不可能把各地区所要进行的任务，全部包括进去，因此地方科委除了尽力组织保证国家规划在本地区实现以外，还必须根据地区

特点，制订地方的规划，作为国家规划的补充。

这次会议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大家比较满意：

第一，专家大集中，专业大交叉。这次会议集中了七百五十多位科学家，包括一百多个学科，几十个专业，有关农业各方面各地区的主要的专家大都到了。在讨论的时候，除本学科、本专业能集中全国知名专家意见外，又根据各方面综合发展的需要，采取有关专业与学科结合进行研究，因此比较全面深入。

第二，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大家都踊跃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积极地提出了各种不同建议，一般都能联系我国实际，进行讨论。

第三，领导和专家结合。在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国家科委、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各有关部门二十多位领导同志分别参加和主持各方面的讨论，另外还有各中央局科委、农办，省、市、自治区科委、科协及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负责人二百八十人，也参加了会议，和专家在一起，共同讨论，做到领导与专家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

会议期间，总理报告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几篇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给予大家很大教育，更加激发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决心。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更给大家以莫大的鼓舞。

通过这次会议，不仅为国家制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农业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而且在今后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将起深远的影响。

二、十年规划的主要内容和预期的目标

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内

容包括十九个专业和专题，即：1. 自然区划和农业区划；2. 农业；3. 畜牧、兽医及草原利用；4. 林业，5. 橡胶及热带作物；6. 水产；7. 水利；8. 气象；9. 农业机械；10. 内燃机；11. 化肥；12. 农业电气化；13. 植物保护，农药及施药器械；14. 山地利用与水土保持；15. 土壤盐碱化防治；16. 海滨、湖滨及河滩地利用；17. 沙漠改造利用；18. 农业技术经济；19. 基础理论与新技术应用。研究项目一千三百一十个，课题三千八百四十五个。其中重点项目一百二十四个，占总项目的百分之九点四，重点课题一千零六个，占总课题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二。由中央直属科学研究机关承担的有七千九百八十四题次（一个课题，如有五个单位合作承担，即按五个题次计算），占总题次的百分之三十五；由地方科学研究机关承担的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七个题次，占总题次的百分之五十一；由高等学校承担的四千五百九十三个题次，占总题次的百分之十七点六。现将规划的主要内容、十项重大任务和预期十年后的面貌，简要分述于后。

（一）十年规划的主要内容

1. 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的合理与充分利用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家底”不完全清楚，尚未合理充分利用。这次规划，规定了对现有十六亿亩耕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制订农业区划，作为合理利用土地，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的科学依据，也对十六亿亩以外可以利用的国土，如山地，热带地区，草原，海滨、湖滨和河滩地，盐碱地，沙漠，在过去工作基础上，拟定了进行调查研究的规划，以便进一步摸清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现状，因地制宜地提出农、林、牧、副、渔综合利用规划。我国自然资源虽很丰富，但近几年来，由于对自然资源保护不

够，利用不当，有些资源曾遭到严重的破坏。有关科学家反映了自然资源的破坏情况，并提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系统意见（见附件五），很值得重视。

2. 农业科学

这次规划的中心是十六亿亩耕地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科学任务。根据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亩产四百斤的地区约占总耕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五，一九五七年平均亩产一百六十三点六斤，要达到四百斤，还要增产百分之一百四十五；五百斤的地区约占总耕地的百分之十七点二，一九五七年平均亩产二百二十九点二斤，要达到五百斤，还要增产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百斤的地区约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一九五七年平均亩产四百三十六点一斤，要达到八百斤，还要增产百分之八十三。棉花、油料等都要有大幅度的增长，才能全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要解决农业增产问题，除了应根据国力的可能尽快地进行“四化”而外，必须在农牧结合的原则下，总结提高农民经验和祖国农学遗产，充分运用现代农业科学的成就，抓紧以下几项研究工作。

（1）合理的轮作栽培与作物配置。

轮作栽培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适应各地区和各种作物特点来实现增产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农牧结合、以地养地的关键，也是农业生产布局的一个根本问题。好的轮作栽培可以蓄水保墒，增加肥力，改良土质，防治病虫，调剂劳力。我国农民向来有传统经验，但还需要研究提高。和轮作倒茬相联系的就是作物配置问题，规划中要求根据各地区农业区划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订出轮作栽培、作物配置方案，使粮食、饲料、绿肥的比重平衡，茬口倒得合适，作为一种制度去贯彻执行。

（2）育种、种子管理和引种。

优良品种在生产上的作用很明显，我国的育种工作也做得很有成绩，但从我国品种资源的丰富和今后发展的要求来看，还很不相适应。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应该再多创造些适合于生产多样化要求的新品种。种子管理工作一度放松，良种混杂退化，繁殖基地没有很好解决，推广机构不够健全，工作没有很好展开。这些问题，需要研究出一些规章制度，才能发挥良种应有的作用。十年来，我国在引进国外优良动植物品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多快好省的办法，但缺乏统一领导和严格的检疫制度，成绩很大，流弊也不小，今后应该加强。

（3）防止自然灾害，加强气象科学研究和植物检疫、植物保护工作。

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威胁很大，近年来气象事业发展很快，但在科研方面却比较薄弱；全国气象研究机构及站网还没有很好地建成，装备比较简陋，技术水平落后，气象情报资料及农业气象的工作还远赶不上生产的需要。必须设法赶上去，着重摸清我国气候和农业气象条件，研究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做好灾害性天气预报，研究人工降雨和消雹及改善小气候的途径。

病虫害和杂草对农作物的危害极大。粮食一般在田间约损失百分之十，在仓贮中还要损失百分之五左右，一九六一年螟虫一项即损失稻谷约一百亿斤。今后必须一方面加强植物检疫工作，防止危险病虫传播和蔓延的研究，一方面加强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研究。也应加强仓贮粮食的防虫、防霉和杂草防除的研究。

（4）改良土壤，提高肥力。

华北的盐碱化，南方酸性红、黄壤和西北黄土高原的水土

流失是我国土壤改良中的大问题，严重地影响全国总产量的提高。因此在规划中：①对土壤盐碱化的形成、特点、分布及水盐运动规律与改良分区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找出改良和利用的根本途径；②研究红壤与红壤性水稻土的水分运动，有机质的积累与分解，养分平衡，物理性质的改善，提出改良红壤和综合利用的技术措施；③对黄土高原进行系统的水土保持工作的研究。此外对其他低产水稻土的改良，土壤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提高肥力的研究等，都列了项目。

3. 畜牧科学

我国畜牧业一九六二年产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而世界上农业先进国家，则大体上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或者更多一点。畜牧业上不去，农业也很难过关。目前我国畜牧业的主要问题，一是饲料不足，家畜营养较差，影响生长繁殖；二是家畜、家禽及毛皮兽的生产性能一般较低；三是疫病流行，对一些疫病尚无有效的防治方法。因此，必须：（1）合理利用和改良草原，特别要研究利用地下水解决缺水草原供水问题；（2）以搞好农牧结合的轮作制度、选育饲料良种、合理利用天然饲料和工业产品及其副产品的研究，解决饲料不足的问题；（3）在调查掌握地方畜禽品种特性的基础上，进行杂交改良、利用杂种优势和选育优良品种等研究，以提高家畜、家禽及毛皮兽的生产性能；（4）研究家畜、家禽疫病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方法，对每一种重要的传染病、寄生虫病都要进行流行病学、病原、病理、诊断（包括检疫）、治疗、疫（菌）苗、免疫及防治措施等八个方面的系统研究，以达到控制和消灭主要疫病的目的。农牧结合的重要性，对于农业和牧业的相互促进意义，这次被更多人所理解。

4. 林业科学

我国林业的基本情况是森林少，分布不均，林业生产水平低，木材利用率不高，供需差距很大。同时广大缺林地区的水、旱、风、沙自然灾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危害农业生产。

为了迅速改变上述情况，林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着重对现有林的经营管理、荒山造林、农田防护林、用材林、木本粮油林、“四旁”植树，以及提高木材采运劳动生产率和木材利用率等生产中存在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在营林方面：重点研究合理的森林采伐方式和有效的更新技术；成林的抚育管理和次生林的抚育改造；用材林、木本粮油林和特种经济林的良种选育与丰产培育管理措施；迅速绿化荒山的方法和提高农田防护林的防护效益和营造技术；森林保护的有效方法（森林火灾、病虫害的防治等），以提高林木生产量和资源利用率，并充分发挥森林防止水、旱、风、沙自然灾害的防护效能。森林工业方面：重点研究改进木林采运生产工艺过程机械化及其设备；利用木材采伐加工剩余物制造纤维板、刨花板、厚纸板和各种木材加工的生产工艺及机械设备；木材干燥和木材防腐技术等，以提高木材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木材利用率和延长木材使用年限。

5. 水产科学

我国海洋及淡水渔业资源潜力很大，目前海洋捕捞只限于沿岸近海少数底层鱼虾类。远海及上层鱼类、兽类资源极少利用；海水及淡水养殖的动植物也只限于极少数的种类；中小湖泊、河道、水库尚未养殖利用。应进行四个方面的研究：

（1）近海及内陆水体渔业资源的繁殖、保护和远海新渔场的探索。这是保证增产的科学途径，缺一不可。（2）广泛应用新技术，改进渔具渔法。目的是防止对鱼、虾幼体的损害和

增加对成体的捕获效能。(3)研究可养动、植物的生理、生态,改进海水、淡水养殖技术,增加养殖种类和养殖面积。

(4)水产品加工质量的提高。着重解决鱼、虾类的保鲜问题。

6. 热带作物科学

解放后,我国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生产从原来极为薄弱的基础上,有了成百倍的发展,并已开始较大量提供产品。但对整个热带地区尚缺乏全面合理的综合开发规划。橡胶及热带作物良种少,栽培技术较差,加工技术亦未过关。因此,热带作物科学研究应着重研究提出我国以海南、滇南为主的热带作物合理配置,农、林、牧等综合开发利用方案。橡胶着重引进、鉴定、推广国外单株年产三公斤以上的优良品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具有抗性并适应我国自然条件的更高产品系。研究提出速生、丰产、节约劳动力的栽培、割胶制度。解决制胶的快速凝固,不用或少用木柴熏烟干燥防霉的新工艺流程及设备。掌握以椰子、油棕、剑麻为主的热带作物选种、速生、丰产、优质栽培与加工技术。加强热带农、林、牧等有关热带农业生产专业及热带气候、土壤、植物等生物、地学基础学科的研究。

7. 农业“四化”的科学问题

农、林、牧、副、渔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四化”。

(1)农业机械化的科学问题。

农业机械化的研究方向是,结合我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提供先进的作业方法和机具,并力求以较少的机具系列和最齐全的品种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要同时加强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两方面的研究,并使两者密切结合,为机具的选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要加强国外机具的

引进和试验工作，加强对我国群众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有关基础理论的探讨，以便从选型和设计两方面加速解决机具的品种问题。此外还要研究农业机械的系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以及制造工艺、使用、维修等。

（2）农业电气化的科学问题。

几年来，农业电气化的发展对农业增产起了很大作用。但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设备制造以及安全、经济运行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研究：①农业电气化的合理规划和布局；②电力网、电站的建设和运行技术；③适合农村用的发、供电设备的制造；④电能在农、副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应用技术；⑤农业电气化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以促进农业电气化程度迅速提高。

（3）农业水利化的科学问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水利资源丰富，年径流总量达二万六千八百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也很多。但是各地雨水分布很不均匀，历来水旱灾害频繁。水利化的任务就是要除水害、兴水利，使水旱灾害都能得到治理，保证农业高产稳收。

为了防止江河洪水威胁，减除许多平原粮、棉产区的内涝灾害，充分利用地面水与地下水资源，发展自流灌溉与机电提水，以及防治土壤盐碱化等，都要根据我国水利资源和水旱灾害的特点，研究各项水利建设的合理布局、设计、施工和管理等问题。黄河等多沙河流的治理，更是水利科学技术上的重点课题。此外，在水工建筑、水利施工机械化等方面，有许多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今后需要抓紧研究解决。

（4）农业化学化的科学问题。

农业化学化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化肥和农药。化肥的规划着重在氮肥、磷肥、钾肥及微量元素化肥的原料、品种、生产规

模及技术的研究，特别要着重抓氮肥生产的科学技术问题（部分学者还专门探讨了氮肥、磷肥、钾肥的比例问题，见附件六）。农药的规划着重解决品种、质量及生产技术问题。研究高效低毒、以内吸和具有选择性的药剂为主，兼及其他广谱性的药剂的科学技术问题。同时，对农产品、副产品的化学加工和高分子化合物在农业中的利用也应加以研究和积极利用。

8. 农业技术经济

农业的技术改革措施和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是否在经济上合理，需要进行经济分析研究。目前着重研究“四化”、“八字宪法”的综合运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关系；不同地区的农牧结合的合理结构及相互平衡的经济效益；作物的合理布局和轮作制度的经济效益。

9. 有关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近年以来，国外把许多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农业科学研究中，开辟了农业科学的新园地，提高了农业科学的水平，解决了许多复杂的农业科学技术问题。我国基础学科在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方面的进展还很落后，一般还在四十年代水平。还有不少缺门和薄弱环节，许多新技术还没有能在生产上应用。规划对这些已做了安排，但必须做极大的努力才能逐步改变落后状态。

（二）重大的综合研究任务与研究中心的建立

这次会议认为今后除继续加强各种单科性研究外，应特别加强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实行多兵种的联合作战，在农业科学战线上打几场硬战。科学家们认为，为了农业的全面过关，必须有重点地抓住几个关键性的地区和关键性生产问题，认真地进行综合研究，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作为“样板”，以便取得经验，带动全盘。根据

我国自然和经济条件，以及生产中的问题，拟分期分批，抓以下十个问题。

1. 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最现代化的农业试验场，包括一个相当规模的人工气候室，成为全国的旗帜。组织北京地区的科学技术力量，大力进行。

2. 在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地区建立试验示范基地，研究高产再高产的科学技术问题，为高产区更高产树立典范。

3. 在商品粮潜力大的四川盆地、松辽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建立试验研究中心，研究商品粮大幅度增产的科学技术问题。松辽平原试验基地，同时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研究试验中心。

4. 在黄、淮、海平原中，选定适当地址，建立试验研究中心，以解决河北、山东、河南、皖北、苏北等省区的旱、涝、碱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生产的科学技术问题。

5. 在陕西武功建立研究中心，解决晋、陕、甘、蒙黄土高原上的水土保持和农、林、牧综合发展问题，并负责关中平原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6. 以海南岛为中心研究基地，研究橡胶等热带作物和热带农业问题。

7. 在江西设立研究中心，研究南方山地利用和红壤区土壤改良，综合发展农、林、牧问题。

8. 根据全国不同自然条件、经济建设需要和不同林种、树种，在东北、热带及亚热带等地区，设立现代化森林的营造、管理、利用等实验林区。

9. 在内蒙建立草原研究中心，研究现代化的畜牧业和草原的利用与改造问题。

10. 在广东建立以南海为对象深海远洋渔业的实验研究中心，在长江流域建立大中型水体养殖的实验研究中心。

上述十大任务是我国农业中最关键问题，也是十年农业规划的最主要的目标和途径。但这些问题不是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学科或一个地方所能解决的，必须组织各方面力量，在坚强的统一领导下，开展综合性的研究。目前，在这些方面，大都已有一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场、林场、牧场等，应就现有基础，在勤俭办科学的原则下，充分发挥现有潜力，可以将这些方面的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同时，还需按任务建立必要的专职管理机构，给以专门的编制、投资和设备，组织必要的专职的科学技术队伍，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为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研究试验经费、投资等应由国家计划切实加以保证。

（三）十年规划实现后的预期面貌

当十年农业科学技术规划全部实现以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可以设想达到下述的目标：

1. 全国自然条件和土地生物资源已大体调查清楚，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已基本完成；
2. 在探寻十六亿亩耕地中各种不同地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科学技术途径方面，已经作出显著的成绩；
3. 对十六亿亩耕地以外的土地和水域的开发利用，已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并已有成功的样板；
4. 基本摸清了我国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科学途径，在农业机械、水利工程、化学肥料、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有重点地赶上六十年代的工业技术水平；
5. 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程度，有极大的增长。科学布局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关农业的基础学科和空白及薄弱的学科已大大加强。中国特有的农业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研究的装备已相当先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干部在数量

上和质量上已初步能适应当时的需要。

三、实现规划的重要措施

上述目标能否实现？现在看来，经过重大的努力后是可能的。因为有利条件很多。首先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号召，引起了各级组织的重视，加强了对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其次，解放以来，农业科学技术队伍有相当大的发展，科学技术人员的政治觉悟与业务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第三，不少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要完成十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还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困难有三：1. 任务重，力量不足；2. 农业科学力量的布局上还相当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使现有力量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3. 推广普及的组织很不健全，不能适应需要。我们研究了这三方面的情况，并根据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勤俭建国的精神，提出以下的意见：

（一）关于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力量问题

从规划项目的落实情况看来，虽然百分之九十的项目都有单位承担了，但有很大一部分项目近期都不能上马。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农业科学院直属十七个专业所，共承担了四百七十四个项目，有一百九十六项不能上马，占承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一点四；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十一个省农业科学院（所）共承担了一千七百八十四个项目，有六百四十一项不能上马，占承担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九；农业机械专业研究机构缺门过多，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力量也很薄弱，在承担任务上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农林院校这次分得

一千万元研究经费，五百名研究人员的编制，研究力量会有所提高，但因过去研究工作条件差，一时还不易充分发挥作用。不能在近期上马的项目大多是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综合性问题。对于这个矛盾，除在这次规划任务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应作进一步调整，分别主次，分期分批地加以安排，尽可能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而外，主要应从下述几个方面逐步加以解决。

1. 必须根据需求和目前的可能，逐步充实农业科学研究的队伍。尤其对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水产、林业、草原、水利、土壤改良、气象、农业技术经济……等当前力量特别薄弱的专业，应尽快加以充实。加强的办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归队的指示。

解放以来，全国农业院校毕业生有七万多人，中等农校毕业的有二十万人，加上解放前培养的农业干部，总数不下三十万人。但是目前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包括农、林、牧、渔、农垦、水利、气象等）的研究人员，连同技术辅助人员在内不过两万人左右，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技术人员，除去一部分在农业院校、国营农场、技术推广站以及农业技术行政部门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批，由于种种原因改行转业，到其他部门工作，这些人经过国家长期培养，同样占国家编制，不让他们做农业技术工作，是很大的浪费。中央归队指示下达后，已有少数人归队，但因编制所限，归队效果不大。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业技术人员归队的指示，选拔一批适合作研究工作的人员充实科学研究部门，并大力充实农业推广和普及部门，相应地转移这些人员的编制。

(2) 今后每年应补充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并改进对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的培养使用办法。

我国农业科学队伍总的说来是不足的，对其中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人员应继续进行精减外，主要应逐步地和大力地扩大这支队伍。每年必须新补充一批大学毕业生，并同时相应地增加编制，不要以新替旧，影响新生力量的成长。研究生的分配，应优先照顾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并注意分配一些基础科学的和新技术（如物理、化学、电子学、原子能等）的研究人员。

当前，我国专家少，新生力量成长慢，全国农业科学研究部门的高中级研究人员只有四百人左右，只相当苏联和美国的百分之三至五，应该引起严重的注意。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统计，解放后十几年来，在七百五十七个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中，只培养出副研究员六名，助理研究员二百三十七名，还不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地方就更差些。青年研究人员成长慢，其原因，除去农业本身需要知识范围广，科学研究工作受作物生长周期的限制以及工作上一些缺点等以外，目前分配到研究机关的大学生质量差，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科学技术人员又很不稳定，往往工作三五年刚能独立工作，就调走了，新的又要从头培养，也是成长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今后对现有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凡适合于研究工作的，应稳定下来，以利培养提高。同时，应加速培养研究生的工作，除高等院校以外，农业科学部门中，凡相当副研究员以上，具有一定科学水平，可以培养人才的，均应分配一定的培养研究生任务，以尽快充实中级研究人员。

（3）必须改进高等农业院校的工作。

高等农业院校拥有一大批科学研究力量，有教授、副教授六百多人，占全国农业方面高级研究人员的半数以上，其中有很多可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但过去由于缺乏助手和必要的经

费，潜力未能发挥。这次会议已为一九六三年部分解决了编制和经费，今后必须形成制度，才能不断发挥农业院校的作用。此外，有些高等农业院校的布局、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等不尽合理，也影响潜力的发挥，例如，有的省有两个农学院，专业大部相同，学生不多；有些不必普遍设置的专业，在院校之间也有重复设置的现象，浪费了师资力量。应适当加以调整、集中力量，这既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又可以抽出一定力量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为了提高质量，应选若干重点农林院校改为五年或六年制，由全国统一招生，提高录取标准，并加强基础理论学科及外文的学习，专门培养研究人员和其他农林院校的师资。

2. 改善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

有关农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一般说来，也是比较差的。而农业科学研究又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必须保证必要的条件，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目前有很多单位由于缺乏经费、试验场地、试制工场和必要的工人，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特别是国家财政体制上对于地方农业科学研究经费是“条条拨款，块块平衡”，到地方往往把农业科学经费平衡少了，有的甚至要科学研究单位“经费自给”，这些都直接影响着研究工作效率和质量，使现有的研究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是浪费人才的一个重要现象。为此：

(1) 在国家农业总投资中按一定比例数确定农业、林业、水产、水利等科学研究经费和投资，切实保证专款专用（根据国外资料，苏联一九五八年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一点三，日本一九五九年农业科学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一）。并尽可能拨一部分外汇，进口必要的样品和仪器设备等。对农业科学研究所需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以及

其他试验研究用品，应该列入国家计划，保证及时供应。

(2) 应积极帮助科学研究部门解决试验场地和工人问题，可将适合条件的某些国营农牧场、林场、养殖场、示范繁殖场或加工厂，划归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并根据工作需要合理确定工人编制。为适应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应允许研究单位雇用临时工，由研究部门提出全年计划，由劳动部门一次批准。

(二) 改进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布局

建国以来，各部门和各地区建立了许多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并且培养了技术干部，积蓄了力量。但是，从发展的要求看来，目前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布局和体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 应当针对农、林、牧、副、渔需要加强综合性研究的特点，对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作必要的调整。十余年来，某些专业研究工作中，如育种、植保、兽医等等，均有显著成绩，但需要综合多方面力量进行的重大研究工作，则进展不大。如黄、淮、海河地区的旱涝碱治理问题，是国家农业生产中的重大问题，不仅直接与土壤、水利、水文地质、肥料、农作栽培技术、品种等学科有关，而且和气象、林业、畜牧等学科有关。几年来虽然各单位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些成绩，但星星点点，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又如山、丘陵、草原、沙漠等的改造利用，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都涉及到农、林、牧、水利、农垦等许多部门的工作，必须密切配合，按统一的计划和步调进行试验研究，共同制定符合自然规律的开发利用规划，才有利于各种生产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了促进农业过关，今后必须针对若干战略性的问题，进行攻坚，这就有必要

在统一领导下，把有关的专业学科用适当方式组织起来，共同作战，还须逐步建立少数强大的综合研究中心，负担起重大的综合研究任务。

2. 在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布局问题，是必须大力加强中国农业科学院，使之逐步形成全国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的领导中心。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地区性的特点，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势必多数分散在全国各地，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学术领导中心，在各门学科研究上走在前面，在学术上指导全国科学工作，才能使各地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强大综合性的研究中心。例如苏联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设有农业、畜牧、农业机械化及电气化、水利工程及土壤改良、森林及农业森林土壤改良、农业生产组织及经济等六个学部。美国也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包括农、林、水、土、甚至农产品的加工的研究。其他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英、法、日、瑞典等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有类似规模的全国的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由于历史较短，力量较为薄弱，专业不配套，专家也很少，而且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也不够密切，因此不能很好领导全国农业研究工作。在目前，加强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比较成熟的措施有三：（1）从全国抽调少数专家，充实最薄弱的研究单位；（2）成立几个必要的学部，把院内专家和院外专家联系起来，担负起学术领导的任务；（3）把下放的一批中级研究骨干尽可能调回，以解决干部问题上青黄不接的状态。至于更进一步的方案，目前还很不成熟，以后当另行研究。

3. 应当按自然区划逐步调整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布局。

目前我国地方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一般都是按行政区设置的，因此，在机构及专业设置上有很多不必要的重叠，如兽医等专业，并不是因行政区有所差异，应把全国在这方面的力量按自然区集中起来，搞好几处就可以适应需要了。但目前各地都各搞一套，造成人力物力的分散，对工作极为不利。一省之内也有类似情况。同一自然区内有几个专署往往就设有几个农业研究所，自然生产条件和研究任务基本相同，但每个单位都包括许多彼此大体相同的专业，每种专业只有几个人，都难做出有效成果。地方农业科学机构的研究人员占全国现有研究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问题如不能尽早解决，是人力的严重浪费。因此，对各地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应采取适当步骤，按自然区划逐步加以调整，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现有科学人员的作用。

（三）在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安排上，除必须加强研究机构外，还要加强技术推广和科学普及的工作，健全必要的技术服务队伍，实行两条腿走路

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研究单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且还要靠技术推广部门，因地制宜地在生产中广泛推广应用。任何新技术、新品种，都必须通过大量的区域试验、生产示范，明确推广的条件，并做出样板，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从上到下按行政区建立起一套关于科学成果推广的制度和组织极为重要。轻视研究工作是不对的，轻视推广工作也是不对的。我国现在有不少研究成果没有推广，必须大力加强推广工作。目前“三站一场”正在各地逐步恢复，就现有情况看，技术推广渠道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主要由于：
1. 县以上的农业行政部门没有三站的专管机构，缺乏统一领导和具体的组织检查工作；2. 推广站的设置偏于分散，

“站”多人少，力量薄弱，缺乏坚强的骨干；3. 与科学研究部门联系不够密切，缺乏有力的技术指导，因此还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又影响已有成果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为此，各级农业行政部门都应建立专管机构，切实把“三站”的工作抓起来，县的各种农业技术组织应适当合并，统一组成技术推广总站，配备坚强的领导骨干，并与县示范繁殖场结合起来，根据试验、示范、推广三步走的原则，依靠国营农场和重点生产队，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切实做好样板和技术传授，做到使群众自觉自愿的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一定的技术专业队伍是不可少的。例如土壤勘测队、水利施工队、草原改良工作队、动植物检疫站等。它是行政部门领导生产的有力助手，只要是必要的，而且又组织得精干，是很大的节约而不是浪费。

科学普及工作是和推广工作密切相连的工作。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农民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大多数农民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还缺乏了解，在“四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所造成的许多可以避免的损失，说明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已十分明显。至于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当然也是重大的普及任务。目前加强科学普及工作主要有两个环节：1. 加强各种科学普及的事业，特别是科学普及读物的出版、科技电影、科技展览等，供给五亿农民和农村干部以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科学食粮”，使他们逐步熟悉现代化农业的知识，逐步成为有现代知识的农民。全国和省、市、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应大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部门，农业、工业、商业部门，也应结合自己的业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例如，我们国家的广告、包装等，都应当注意科学普及的作用。2. 加强县级科学技术协会的组织。在农村进行科学普及工作时，首先应以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在乡知识青年

和农民中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作为重点，通过农业技术夜校、训练班、技术会诊、试验小组……等等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首先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然后通过他们向广大农民进行普及。这些工作只有县级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相当健全才好进行。为此必须把县级科学技术协会的组织健全起来，使之能负担向农村进行科学普及工作的任务。

* * *

贯彻上述各项措施，保证规划实现，关键在于加强领导。规划的实现，需要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组织有关的科学技术力量，在全国统一安排之下，密切配合协作，充分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坚持不懈地进行切实的工作。为此，要求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各地农业行政部门和地方科委，按照各自承担的任务，切实组织力量，并在人力、物力上予以保证。各级党委应该加强对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应该把讨论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汇报，检查督促，并且采取措施来促进工作的进展；应该贯彻执行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针，把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技术推广、科学普及机构作为党委在农业技术工作方面的有力助手，使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实现这个规划，要依靠全体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密切地联系生产，联系群众，积极参与讨论、制订重大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埋头苦干，努力承担为农业过关所迫切需要的研究试验任务。各级党和行政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他们建立一种同志式的团结共事关系，给他们创造联系生产实际、联系群众的条件，并且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一起，认真总结农业生产和

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共同为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业现代化事业而努力！

考虑到规划的各项任务，牵涉到许多部门、各个地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具体的安排与大量的协调，并且及时解决那些需要综合解决的问题，有必要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规划的实现。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委员会，委托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具体领导，除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外，还应吸收相当数量的担任学术领导职务的科学家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1. 具体安排十年规划中的各项任务，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定期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并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规划的实现；2. 根据执行情况，对规划作必要的修改、补充；3. 解决各部门、各地方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4. 负责采取措施，组织力量，执行规划纲要中规定的十大综合任务；5. 负责处理这次会议中许多科学家所提出的重要建议。同时根据需要，还应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委员会之下，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

报上的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六个专题的工作方案和建议，请中央和国务院原则上予以审查。这两个文件均将由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组织实施。其余附件，仅供参考。这个报告所请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如中央同意，请批转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党委、人委参照执行。

谭 震 林

聂 荣 臻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全国 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一九六三年三月)

序 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必须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为此，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用二十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基本实现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多快好省地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提供确切的科学技术依据和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及消费水平还不高。今后如按中等营养标准，即大约每人每日从食物中获得热量二千三百—二千四百大卡、蛋白质七十一—八十克，平均每人每月约需：加工粮三十斤，豆类二斤，肉类二斤，蛋一斤，鱼一斤，食用植物油一斤。考虑到十年、二十年后，我国人口有可能达到八亿、十亿左右，农林牧副渔业都必须有较大幅度的增产，才能满足需要。农业除了解决吃的问题以外，还必须提供大量棉花以及麻、毛、丝等，从多方面解决穿的问题。

二十至二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革，规模是巨大的，所包含的农业以及有关工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将是极为复杂的。

我国幅员广阔，自然条件复杂，生物资源繁多。全国耕地总面积约十六亿亩，仅占总土地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百分之十一左右，根据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资料宜农荒地亦仅四亿亩。除此以外，尚有约三十一四十亿亩的草原，十六亿亩的沙漠，占土地面积近三分之二的广大山地丘陵，沿海四十三万平方里的浅海海域及约三亿亩的内陆江河湖泊水域等丰富的土地和水域资源，尚待合理开发利用。根据我国自然资源条件特点及农业生产基础，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从三方面入手：

一、大力提高现有十六亿亩耕地农、牧的单位面积产量

目前，全国平均亩产粮食尚不到二百斤，畜牧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潜力很大。应根据农业八字宪法研究不同作物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增产途径，力求尽快达到平均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和棉花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的指标，并使畜牧业显著增长。

二、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发挥我国现有耕地以外的广大土地的生产潜力

必须着眼于全面开发与合理利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丰富的生物与土地和水域资源，研究改良利用草原、山地、沙漠、内陆水域、海域以及热带地区的科学途径，为全面综合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提供科学根据，开辟我国农业生产的广阔道路。

三、充分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成就，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技术面貌。近代生物学及有关技术基础科学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吸取世界近代科学技术成就，

根据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提高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解决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中的科学技术问题。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队伍与水平，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并取得很多成就，但由于基础太差，仍然落后。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给予必要条件，充实力量，采取单科性的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相结合，总结提高农民生产经验、祖国农学遗产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保证十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实现。

第一章 合理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土地、生物资源

解放以来，在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地貌、气候、水文等条件和土地、动植物资源的基本情况及其开发利用现状，有了一个全面的初步的了解，但是很多“家底”还没有完全摸清楚。

我国除现有耕地的生产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较低，还有成倍的生产潜力可以发掘。此外，还有广大土地和生物资源未得到合理与充分利用。如广大山地、丘陵、草原、沙漠、海滨、湖滨、河滩、热带与青藏高原等地区，尚未很好开发。宜农荒地，亦尚未很好开发。

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完全按自然规律办事，有些地区对有些资源利用不当，甚至破坏了资源，影响了生产。例如：作物茬口安排不当，破坏了合理的轮栽与耕作制度；灌排系统没有搞好，发生了土壤盐碱化；不适当地开荒，破坏了草原和森林，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捕捞不当，影响了渔业生产；猎取过度，野生动物减少等。

今后，必须进一步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调查研究，制订综合性利用改良区划与远景发展规划，提出各地区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科学途径，因地制宜地采取利用改良措施，力求达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目的。

一、制定全国农业区划

执行“十二年科学规划”以来，在制订全国自然区划和全国农业区划方面，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已有初步的自然区划图和全国农业现状图，还取得了许多区域性的和单科性调查研究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今后的农业十年规划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过去对这些工作重视不够，力量太小，许多有益的资料没有系统整理，调查研究工作和掌握的资料都很不全面。

今后应在过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紧以下五个主要环节：（一）进一步修正与补充部门的和综合的自然区划，并加强三级区划以下的分区研究和各种自然资源的评价与综合研究，完成全国性与地区性农业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分区区划及评价；（二）收集整理已有零星资料，加强调查研究，完成主要作物、果树、经济林、用材林及牲畜等的生态分布规律及适合性区划的研究；（三）修正补充已有的农业现状区划，开展农业经济条件的分析研究，完成农业经济条件与农业现状区划；（四）开展农业技术改革条件分区评价的研究；（五）在这四个环节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完成全国的综合性的农业远景区划。

二、充分利用农业气候资源和克服不利气候条件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一般地区，热量资源非常丰富，除青藏高原大多数地区外，平均积温每年均在二千摄氏度以上，热带地区平均每年积温可高达八千五百摄氏度以上，绝大部分地区平均无霜期均在百天以上，热带地区，除个别年份外，全年

无霜冻出现，这对农业发展是一个有利条件。

水文条件则地区分布差异较大，由于我国降水多集中在温暖季节，有利于农作物和其他植物生长发育。但是，冬春雨季降水量较少，许多地区往往形成春旱，这些地区，若无灌溉条件，对越冬作物生长和春播工作，影响很大。

对发展农业生产来说，不仅要最有效地利用气候资源，还要避免与克服不利的气候条件，例如旱涝、冰雹、低温、霜冻、大风、干热风等。

为了充分利用有利气候条件和克服与避免不利气候条件，必须开展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一）不断地逐步揭露和分析我国各地区农业气候资源特征或能量及其变化规律；（二）掌握植物与动物对不同气候条件或因素的反应和生活要求的规律，找出并鉴定影响作物与牲畜生长发育的各种气候指标，制定各种农业气候区划；（三）探寻克服和避免不利气候条件的途径，研究试验相应的措施。为农业合理布局和稳定丰产，作出贡献。

三、合理与充分利用现有耕地和宜耕地的土地资源

我国现有耕地，大部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为了扩大耕地面积，需要大力开垦，但由于对非耕地的特点了解不够，从而使一些地区就受到了盐碱化、风沙、水土流失、霜冻等的为害，有的甚至破坏了草原、森林，使生产发展受到阻碍。开垦宜农荒地，必须按自然条件办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为此，应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已耕地区和宜耕地区进行土地评价和利用改良分区的研究，提出合理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途径。今后主要工作是：（一）在已有的土壤调查制图与土地合理利用的研究工作基础上，进行土地评价的研究，探寻各种土地的土宜（适宜种植什么），研究宜耕地开垦技术和实

现农业技术改革的条件，制定分区分级的土地利用区划和确定土壤改良分区；（二）研究不同作物、不同品种的生物学习性，找出它各自适合性的客观规律，制定土地合理利用区划，为充分合理利用土地、改良低产土壤、开垦荒地、作物的合理布局、建立科学的轮栽制度、耕作制度、施肥制度、灌排制度、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等的农业制度以及因地制宜地逐渐实现农业技术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四、综合利用山地和丘陵地区

我国的山地丘陵分布在全国各地，水、热条件与土壤特性极为复杂，发展农、林、牧生产的潜力很大。为着合理地综合利用山岳、丘陵，必须进行以下工作：（一）调查研究山丘地区的气候、土壤、地貌、植被等，划分山丘地类型，作出较详细的自然区划；（二）调查与选育适宜于不同山区的乔木林、木本粮油、果树、牧草、药材和作物的种类与品种，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与地区适合性，进行山丘地区综合利用区划，提出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生产的途径。在进一步完成全国山丘地合理利用区划的工作中，应首先选择自然条件好、生产潜力大的南方红、黄壤地区，以及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地区，集中力量，开展综合性的调查和试验研究。

五、充分合理利用草原

我国广大草原分布在东北、内蒙古、西北与青藏高原的半干旱、干旱和高寒地区，草原地区的土地资源，还没有充分合理利用。各种类型的草原存在的问题虽然各地不同，但共同的主要问题是：草原中的农牧结合问题没有适当解决；一般草原的载畜量很低，有的缺水，有的草原退化，有的虫害兽害严重。因此，必须开展以下几项工作：（一）整理现有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地貌等的调查资料，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

制定草原土地合理利用区划，提出牧、农、林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草原土地的途径；（二）开展草原植物生理生态学、群落学及其经济价值的调查研究；（三）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地表水与地下水的勘测研究，提出解决牲畜用水与草原灌溉的途径；（四）进行划区轮牧、打草，合理利用草原，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轮栽制度和农、林、牧、副业综合发展结合方式的研究。通过这些调查和试验研究，制定草原土地合理利用区划，提出充分利用草原和改良草原的方向与途径。

六、大力开发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

包括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南部及台湾省全部的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共约五十七万平方公里，自然条件优越，生物资源丰富，能够种植其他地区不能种植的热带作物。除台湾未解放外，在其他地区则由于缺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合理布局规划，因而影响了这个地区综合开发利用工作的进展。因此，必须在过去调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以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为中心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综合调查研究。进一步调查分析各地区的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和土地、动植物资源的特点与经济价值，研究热带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森林、草地等合理布局，以及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结合方式，制订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规划，以充分开发利用热带资源。

七、干旱地区与沙漠的利用改造

我国干旱地区分布在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西部和新疆等地。这地区热量条件尚好，但水文条件太差，风多而强，形成了广阔的沙漠戈壁，盐碱土的分布也非常普遍，耕地面积很小，大部土地荒芜，未能利用。我们对本区的基本情况，沙漠戈壁、盐碱土的特性与成因及其地理分布规律，有了

比较全面的一般的认识。今后，应在这个基础上，着重研究：
（一）地表水与地下水以及水土平衡问题；（二）沙漠的特性、利用途径与改造措施；（三）盐碱土充分利用途径和改良措施。

八、海滨、湖滨、河滩地合理利用的调查研究

我国海岸线长达一万二千公里以上，在海滨地区有很多淤积的海涂滩地。有些地区可以发展芦苇、林业以至畜牧业，有的也可以筑堤围垦，或利用水面、海涂发展渔业及养殖业，应进行综合调查研究。我国的湖滨资源，以长江中下游较为丰富。近年来，由于较大规模的围垦湖滨，因而与防洪、防涝和发展水产等发生了矛盾。江河滩地，特别是北方河流的河床宽大，枯水期的水流很小，空地较多，但是，这些河流的洪、枯流量相差很大，含沙量高，宽大的河床，常为洪水所充满，在修建水库，整治河道后，可以适当围垦。

必须对这些地区进行综合性的调查研究，提出合理利用的规划，并进行典型试验。

九、青藏高原地区的综合调查研究

青藏高原地区是世界唯一广阔的高寒地区，约占国土的五分之一，地势高、自然条件十分独特。对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情况，至今还没有全面掌握，发挥生产潜力的方向不明，充分合理利用的途径不清；而且，大部分地区还是科学研究的空白点。因此需要进行综考调查，为今后改造和进一步利用这个地区做必要的准备。

第二章 农 业

农业增产的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就

我国条件来看，最主要的是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根据全国土壤普查资料，在现有的十六亿亩耕地中，盐碱地、低产水稻田、涝洼地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低产田共约四点六亿亩，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七；高产和在一般年景可保收成的耕地面积占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三，在这占三分之二强的耕地上也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和病害、虫害，严重地威胁着产量的稳定和提高。因此，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距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棉花的产量指标及其他各种特产的增产任务很远。就粮食的增产指标来说，四百斤地区要在一九五七年亩产水平的基础上增产百分之一百四十五，五百斤的地区要增产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百斤地区要增产百分之八十三。

解决这个严重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条件。既要着重使占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三的较好的耕地尽早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又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进行各项农田基本建设，大面积地改良利用低产田，逐步使之达到较大幅度的增产。在目前情况下，首先应针对高产地区和大量出产商品粮、棉、油的地区，抓住效果显著、容易掌握而又带有普遍性和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加强研究，并及时推广研究成果。

农牧结合是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我国畜牧业仅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而农业过关的国家大体上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或更多一点。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畜牧业上不去，农业也很难过关。今后必须从农牧结合着手研究解决当前肥料、饲料、畜力不足等问题。在农牧结合的原则下，以合理轮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中心，进行下列几个重大问题的研究。

第一节 作物合理轮栽和几个关键性的栽培技术

一、作物合理轮栽

这是解决各种作物争地问题，培养地力，充裕肥源，贯彻农牧结合，增加单位面积的作物产量和饲畜量，促进农牧业全面增产的基本措施，是在一定的耕地面积中，一定年限内，生产布局的关键。这在人多地少地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轮栽制是我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宝贵经验。要进行合理轮栽，必须研究作物生理、土壤营养、肥力增进、低产田改良以至气象资源利用、病虫杂草防除、劳动力调节等方面所提出的重要而复杂的课题。近年来过分扩大了粮食复种面积，损伤了地力，减低了产量，使农牧业单产和总产量都受严重影响。

首先应着重研究粮、棉、油与豆科、绿肥、饲料作物的合理轮作，在总结农民经验发展祖国农学的同时，积极运用和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着重研究不同地区轮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以增加粮、棉、油等作物产量为主的轮作方式。应当在不同地区选择若干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进行合理利用土地和安排茬口的规划，并作出样板。同时也要研究提出不同地区用地与养地结合的轮作栽培措施，以提高轮作周期中各项作物的总产量。

二、研究解决几个关键性的栽培技术

(1) 保墒保苗：在北方旱地或南方患旱时期，研究提出保墒保苗技术；在涝害、寒害、霜冻、盐碱等自然条件不利地区，研究提出保产栽培技术。

(2) 间、混、套作：在复种轮栽多熟制的地区，研究提出作物种类、品种组合及其相适应的栽培技术。

(3) 经济施肥和合理用水：要进一步研究提出不同地区主要土壤类型和主要农作物在不同栽培条件下适用的化肥品种、施量、时间和方法，及其增产幅度与经济效益。对化肥新品种也要及时进行研究，做好大规模生产和施用的准备。对扩种或新种绿肥地区，要着重研究因土种植和施肥管理等栽培技术以及绿肥作物的选种留种技术。

关于合理用水方面，要着重研究不同地区主要土壤类型、主要作物的合理灌水时期、灌水量、灌水技术、田间渠系布置和灌溉管理技术；在西北和华北灌区要特别注意在水利和农业技术综合治理的方针指导下，研究提出防止灌区土壤盐碱化的灌排技术；在南方和东北沼泽地区要着重研究排水技术。

(4) 机械化栽培：着重研究提出华北和东北平原以及大中城市郊区的商品粮和棉花基地的机械化栽培技术。在南方水稻区要研究机械化整地、播种、插秧、中耕、施肥、收获等的栽培技术。机械化栽培研究必须和精耕细作结合起来，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节 选育作物良种

我国已选育出了很多作物良种，对增产已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良种的数量和质量都还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需要，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对良种繁育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建立良种繁育基地网和种子田制度，曾经发生许多品种混杂和退化现象；对良种区域化研究工作也注意不够，没有充分发挥现有良种的增产作用，还有不少作物缺乏良种，对抗病虫、抗逆性以及品质方面的育种研究注意不够；对品种满足生产上多样化和今后发展的要求也注意不够。针对这些情况要加强研究下列问

题，并不断提出改进办法和新良种。

一、总结作物良种繁育经验，解决良种混杂和退化问题

有不少人民公社生产队和国营农场以及良种繁殖示范场已经积累了稻、麦、棉等作物良种的繁育经验，急需总结它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并按作物和地区特点，恢复或新建一批良种繁育基地，加速繁育良种，每年或隔若干年供应生产队和国营农场种子田用，以不断提高种子生产性能，逐步达到全国范围的良种纯化和普及。对玉米等异花授粉作物，要加强研究利用杂种优势的良种繁育技术，并扩大推广。

二、充分发挥现有良种的增产作用

一方面要总结研究现有推广良种（包括地方良种）在生产实践中的表现，适当予以调整，使它们在最适宜的地区推广；另一方面要建立良种区域化试验网，迅速确定新育成良种的区域适应性，并繁殖推广。

三、总结育种经验，选育适应新要求的新良种

要加强自国外引种的工作，有计划地组织专家小组出国考察，并积极进行引种和交换种子，充分利用国外成就来增加我国生产。也要加强系统选择，利用自然界产生的优良变异系统为增产服务。同时，也要根据工作基础、作物特点和地区要求，开展杂交育种，特别是品种间杂交育种；对玉米要特别加强自交系杂交育种工作。为了满足生产发展的要求，要注意选育高品质的棉花，高油分的油料作物以及能抵抗或避免病、虫、气象灾害的和适合于机械化栽培的粮、棉、油等作物新良种，源源不断提供良种用于生产。

四、加强作物品种资源的整理利用

我国丰富多彩的作物品种资源，已基本上收集起来，今后要着重鉴定它们的经济特性，为进一步开展育种工作提供材

料。也要加强对国外品种资源的经济特性鉴定，增加杂交用的亲本材料，促进育种工作的发展。

第三节 加强植物保护，防止主要病、虫、杂草等在田间和仓贮中所造成的损失

病虫害所引起的农作物损失是巨大的，稻螟、玉米螟、甘薯黑斑病、棉蕾铃病虫、小麦锈病、柑桔黄龙病等所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除此以外，稻瘟、油菜和白菜病毒病、马铃薯晚疫病、地下害虫、果树食心虫等重要病虫害对粮、棉、油、果、蔬的增产也有着很大的威胁。据初步估计，各种病虫害在田间所造成的损失，粮食约百分之十，棉花约百分之二十，果品、蔬菜约百分之三十，仓贮粮食所受的损失约百分之五。杂草在东北、海南等地区为害特别严重。

一、防治主要作物病害

我们对小麦锈病的传播规律已有初步了解，今后应着重研究关键地区流行规律、预测预报技术和防治措施，并加强菌种变异的研究和抗病品种的培育。对甘薯黑斑病着重研究防止窖藏中腐烂和秧苗传病。对稻瘟病着重研究提高栽培技术和化学防治，对稻白叶枯病着重研究传染途径和种子消毒。对棉黄枯萎病着重研究抗病品种和防病耕作技术。对马铃薯晚疫病着重研究种薯处理、抗病品种和化学防治。对油菜、白菜等十字花科作物病毒病以及白菜霜霉病及软腐病，着重研究传播途径和抗病品种。柑桔黄龙病的病原已肯定是病毒，应着重研究传染途径、诊断方法和栽培防病。

二、防治主要作物虫害

对稻螟，可以利用666或1605等农药防治，今后应着重研

究稻螟发生量的预测，利用轮作栽培控制螟害，并研究提高内吸药剂治螟的效果。使用滴滴涕颗粒剂可以控制玉米螟为害，今后应着重选育抗虫品种，并研究生物防治和提高化学防治技术。粘虫已被初步证实在淮河以南越冬，有迁飞习性，应进一步研究澄清主要发生地区的数量变动规律和大发生的虫源，研究提高中、长期预报和化学防治效果。使用药剂拌种或土壤处理等防治地下害虫已有成效，但应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地老虎的发生规律，提高预测预报技术和防治措施。对棉蕾铃害虫，在主要棉区现已分别明确预测方法和化学防治技术，今后应着重研究提出综合防治方案。

三、防止贮粮损失

着重研究谷象、米象、谷蠹、豌豆象、麦蛾、粉螨和霉菌的发生规律和粮食仓贮条件的关系、鼠害的种类和生物学特性，并研究杀虫、灭鼠、防霉等药剂，提高使用技术和防治效果。

四、加强化学和机械除莠技术研究

尽先在东北垦区和华南热带作物地区，结合机械化轮作耕作栽培措施，研究提出有效除莠技术，并进行除莠剂应用的研究，提出合理使用技术。为了彻底解决草害问题，应加强害草生物学特性和除莠剂的生理效应等基础研究工作。

五、提高对危险病虫害的检疫技术

为了加强对进口和调运农产品的检疫工作，杜绝危险病虫害的引入，并肃清已引入的病虫害，逐步控制检疫对象的传播为害，应首先调查清楚已有的，特别是新引入的危险病虫害种类的分布，确定其寄生范围和传播方法，研究提出防除和消灭措施，并提高种苗检疫和消毒处理技术。

第四节 加强抗拒气象灾害的研究工作

一、进一步研究气象灾害发生的规律

农业的气象灾害，包括旱、涝、冰雹、低温、大风及干旱风等。这些灾害的发生，在自然界中都有一定的规律。其中有些灾害的出现，比较有把握可以作出短期预测，如低温、霜冻、大风等。但旱、涝、冰雹等，预测比较困难。为了农业稳产丰收，必须在整理分析长期积累的气象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各种作物的栽培经验，逐渐摸清这些气象灾害发生的规律，以便作为决定各种作物栽培季节的理论根据以及抗逆育种和栽培技术措施的气象指标。

二、抗逆栽培技术的研究、推广和抗逆品种的选育

农业上的气象灾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例如早春水稻育秧中的烂秧问题，黄淮地区早春小麦晚霜为害问题，华北的春旱问题，华南热带作物的冻害问题，华南沿海及海南岛作物遭受台风为害问题等等。为了农业稳产丰收，必须讲求抗逆栽培技术，如采取温室、风障、温床育苗、培土、镇压、灌冬水等预防小麦寒害，或培植防护林，或提前或移后作物的栽种日期，或利用气候上的冷尾暖头，探求有利的小气候环境等等。同时要加强抗干旱、低温、盐碱等优良品种的选育工作。

第五节 低产土壤改造

低产土壤是指那些具有沙、粘、碱、酸、旱、涝、毒、瘦、薄等一个或几个缺点的土壤。这类土地作物不能正常生

长，产量很低，约为周围较好土地产量的一半，甚至更低。将低产土壤改造成好地，对完成农业发展纲要中粮食、棉花及其他工艺作物和特产的生产指标，有很大作用。解放以来，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上对低产土壤的改造做了大量工作，了解了一些低产原因，肯定了一些改造措施，且在某些地区改好了一部分低产土壤，但工作的开展很不平衡，有些地区由于利用土壤不善，低产土壤面积还有所扩展，例如盐碱土。

今后应该加强调查、试验和研究，提出因地制宜地改造土壤的综合措施和合理利用方案，并做出样板。

我国低产土壤类型很多，当前应着重改造几种量多面广的类型，如盐碱土、红壤和低产水稻土等。研究的办法是通过调查研究，从发生发育过程、水分动态、物理性质和结构，明确低产原因，根据它们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对盐碱土除研究以上各种共同项目外，还要着重研究盐分运动规律、临界水位和稳定水位、农业改良和土壤熟化措施。同时，水利改良措施，也占重要地位。

对红壤和低产水稻土都需要研究有机质的积累和分解以及养分转化过程。改良措施都要采取种植绿肥的办法，并研究用石灰和磷肥所起的作用。

对低产水稻土中的沷田、冷浸田，要注意研究排水和灌溉。

以上三类低产土壤，约占全部低产土壤的一半。盐碱土都分布在粮、棉集中产区，红壤和低产水稻土都在南方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低产土类的增产潜力都很大，应作为先一批研究和试验改造的对象。

第六节 水土保持

我国黄土高原和南方红壤地区发生严重水土流失，不仅使这些地区的耕地产量很低，且引起洪水灾害和淤塞河床、水库。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山坡耕地亩产只四五十斤，在南方只一二百斤。其中一部分可以修梯田，如进行适当的耕作栽培，产量可以倍增；另一部分以还林还牧为宜。解放以来，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做了大量调查、试验、研究和总结农民经验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应根据“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入手，从长远利益着想，在合理利用土地、做好水土保持的基础上，综合开发，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结合，发展多种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方针，着手治理。

水土保持是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应由农、林、水、牧各方面密切配合，同时还需要研究经济效益。关于水土保持区的资源利用、造林、治水、经济效益和综合研究等，分见于有关章节。这里仅就西北黄土高原和南方红壤地区有关农、牧方面的研究解决办法分述如次：

一、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这个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开展较早，基础较好。今后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 水土保持的典型规划：由于各个社、队所处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不同，农、林、牧的比重也不一样。今后要在过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典型规划，通过若干典型，总结出规划的一般方法。

(2) 促进水土保持地区的农、牧业增产措施：从当前生产出发，研究利用各种科研成果和工业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

如保土的耕作轮作、化肥的使用等，在保持水土的前提下使基本农田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腾出一部分不宜耕种的土地还林还牧。在现有牧坡上要研究提高产草的数量和质量；还牧的土地，要播种特别适宜而又容易繁殖的牧草品种，保证牧草品质产量，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3) 梯田修筑技术和生土熟化：保持农田水土最基本的办法，是修筑梯田和维护田埂。但这项工程的工作量大，且要有持续性，因而要研究各种省工的措施，包括工具在内。新修成的梯田，要促使土壤迅速熟化，及早发挥梯田的作用。

二、南方红壤地区

这类地区的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还未大量开展，但群众利用红壤丘陵地种植花生、苧麻、茶、水果等的先进经验，却很丰富。今后应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并结合群众先进经验，确定有效技术措施。

此外，不论西北和南方，对于土壤侵蚀原因和规律、小流域内泥沙来源和运行规律、侵蚀地貌等，也要系统研究，使今后水土保持规划和技术措施，都能不断提高。

第七节 发展园艺和特产

一、提高果树产量、品质的栽培技术和优良品种选育

我国一般成龄果树的产量很不稳定，新果园的幼树生长发育很差。应着重研究克服主要果树大小年结果现象的整套果园管理技术，并研究以土壤管理为中心的培肥土壤肥力、保持水土的管理技术，使幼树生长正常，及早结果。目前果树优良品种不多，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应先采取见效快的办法，如株选、芽变选择等，在充分利用我国丰富品种资源的基础上，大

力开展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二、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

目前蔬菜单位面积产量较低，也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品种混杂、退化严重；病虫害每年都有发生，有的年份特别严重。此外，蔬菜罐藏加工研究还未展开，温室、温床栽培开展不快，也都需要研究解决。首先，应进行大中城市蔬菜良种区域化试验研究，整理出一批良种，特别是异花授粉的蔬菜良种，并研究提出良种繁育技术，解决大面积生产的推广问题。其次，要加强自国外引种的工作并选育适合加工出口和机械化栽培的新品种。第三，在北方进一步提高温室、温床栽培技术，调节淡季供应。

三、研究提高茶叶产量、品质和制茶工艺技术

我国茶叶生产至今还未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近一二年来产量、品质又都有下降。主要原因是茶园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为老茶园，树势衰弱，品种混杂，生产性能较低，加以有些地区采摘过度，树势受到削弱，产量下降。在制茶技术上，缺乏一套科学的制茶工艺技术。为了迅速恢复发展茶叶生产，必须改造老茶园并提高制茶技术。应着重研究老茶园更新、补植、换种及更新后的管理技术及茶树经济施肥、修剪和采摘技术；提高块红茶、分级红茶、眉茶等外销茶类品质的制茶工艺技术及相应的成套机具。

四、研究提出老桑园更新技术、蚕新品种选育和病虫害防治

全国老桑园产叶量逐年下降，新桑园产量也低，应研究提出改造、补植、更新技术，以提高桑园的单位面积产量。现有蚕品种的抗病性和品质尚不够要求，蚕的脓病、软化病、寄生蝇病为害严重，使产量不稳定，应进一步研究抗病品种的选育

和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以控制其为害。同时积极研究有关推广柞蚕、蓖麻蚕的科学技术问题，制定无病蚕种和养殖技术规程。

五、研究提高蜂螨防治措施和改进中蜂的饲养方法

我国现有蜜蜂群数量少，质量低，增殖也不快，因而单位产量不高。主要原因是品种混杂、退化、病虫害严重，饲养技术落后，特别是占全国蜂群三分之二的中蜂，还沿用土窝老法饲养。应着重研究重要传染病，如寄生螨、幼虫腐烂病的防治方法；同时研究改进饲养技术，特别是中蜂的饲养技术。

第三章 畜 牧

农牧结合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农牧业又相互促进，并能把一部分农副产品，用以饲养畜禽，充分利用农业资源，提高整个农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利用我国西部、北部草原的主要途径是，以牧为主，综合发展农、林、副业，在广大的山岳、丘陵和滨海地带也有发展畜牧业的巨大潜力。但目前我国畜牧业在农业总生产中的比重太低，耕畜和畜产品都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需要。今后应从“料、水、繁、种、保、管、舍、工”八项措施着手，大力发展畜牧业。当前影响家畜发展和畜产品生产率提高的突出原因是：饲料不足，家畜营养较差，影响家畜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家畜的生产性能一般较低；家畜疫病仍广泛流行，对不少疫病尚无有效的防治方法；畜牧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劳动生产率低，特别是牧区劳动力更感不足，草原改良工作做得很差，甚至利用得很不合理，于是大量发展畜牧业还受到限制。今后十年，在畜牧兽医科学技术上，应着重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合理利用和改良草原

我国饲料不足，但草原辽阔，而且目前尚未很好开发利用，生产潜力很大，应充分利用草原的饲料发展牧业。现已利用的草原，也利用不尽合理，有的由于乱牧、乱垦、饮水点不足或分布不合理，已引起草原退化；还有大面积缺水草原未能很好利用，仅内蒙古、青海、新疆、甘肃四个省（区）的纯牧区就约有八亿四千万亩草原因缺水不能很好利用，应加强草原水利的研究，解决供水问题。此外，我国一般草原的产草量低，质量差，与国外改良草原比较相差悬殊，急需改良提高。今后十年内除开展草原调查外，主要的研究任务如下：

1. 从草原植物生物学和经济特性研究着手，研究不同类型草原的合理载畜量，放牧方法和制度，以及放牧场和割草场的合理利用方法。防止草原退化，发挥草原潜力。

2. 调查掌握草原水利资源，研究提出缺水草原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井群布置以及机井的综合利用方案，解决缺水草原的供水问题，提高草原生产力，扩大草原利用面积。

3. 改造草原，提高草原生产力。针对不同类型草原的特点，引种高产优质的牧草和饲料作物，进行地方品种的选育和新品种培育，研究牧草混播和以牧草为主的轮作制度，并进一步研究提出建立人工草场和饲料地的技术措施。

完成上述任务后，将对草原的合理利用和在草原建立人工草场和饲料地等问题提出一套技术措施，提出缺水草原开发利用的技术方案，为合理利用和改良草原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二、饲料的增产和合理利用

目前，由于农牧结合的不够好，在作物布局上，对饲料生产安排不注意，各地的饲料供应与家畜、家禽和毛皮兽的增长不相适应，普遍感到饲料不足，而且饲料的质量差，严重地

影响畜牧业的发展。另外，我国天然的饲料资源虽很丰富，但分布很不平衡，多集中于人、畜较少的山区，尚未很好开发利用；还有一些工业副产品由于含有毒和有害物质，不能充分利用起来；对于现有的饲料也利用得不尽合理，缺乏科学的配合方法，没有根据不同种类的家畜、家禽的营养需要进行配合，饲料中的营养成分未能为家畜所充分利用。主要的研究方向如下：

1. 研究提高农牧结合的轮作制度，合理配置粮食和饲料作物，在农牧结合，相互促进，既持续增产粮食又增产饲料的原则下，解决饲料问题。

2. 引种和选育适合当地条件的高产优质的饲料作物和牧草品种，特别是豆科和含淀粉、粗蛋白较多的块根茎饲料作物和牧草，增加每亩土地的饲料单位产量。

3. 研究提出山区、水塘野生饲料（如橡子、水草等）和抗菌素的菌丝体、苍耳饼、木薯渣等含有毒、有害物质，而养分较高的工业副产品的处理利用方法及利用抗菌素、尿素等工业产品促进家畜生长和饲喂家畜的方法，充分利用饲料资源，扩大饲料来源。

4. 研究制订适合我国生产特点的家畜饲养标准，根据家畜营养需要，合理搭配利用饲料，发挥饲料的最大作用，提高饲料报酬。

完成上述任务后，可因地制宜的提出基本上解决不同农区饲料问题的办法。

三、提高家畜、家禽、毛皮兽生产性能

提高家畜、家禽、毛皮兽生产性能是提高产品生产率和质量及降低成本的重要环节，不同品种的生产性能，可能相差数倍，例如我国的粗毛羊每年只生产一公斤左右的粗羊毛，而

优良品种的细毛羊每年则可生产四五公斤细羊毛，无论数量、质量都相差悬殊。我国大部分家畜、家禽、毛皮兽的生产性能较低，不仅产品生产率低，产品质量也较差，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解放后虽进行了大量的杂交改良工作，生产性能已有很大改善，但如何进一步巩固、提高，还急待研究解决。我国一些优良地方品种的个体差异很大，有的生产性能较高，有的很低，亟需整顿提高。现有的少量优良种畜也尚未充分发挥良种的作用。主要的研究任务如下：

1. 调查研究地方畜种、禽种的特性，总结家畜杂交改良效果，进一步提出杂交改良的方式方法，以迅速提高低产畜、禽的生产性能。从全国来看，对绵羊应着重研究改良为毛肉兼用的细毛羊和半细毛羊的问题；对马应着重研究改良为乘挽兼用的问题；对黄牛应着重研究改良为乳役兼用的问题。

2.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畜产品生产率是一个捷径，国外已广泛采用，而我国仅刚刚开始研究，尚未很好应用。因此，必须开展畜、禽经济杂交的研究工作，明确适应各不同地区条件的高效益的猪、禽经济杂交组合，利用杂种优势，增产畜产品。

3. 研究掌握家畜、家禽、毛皮兽生长发育和遗传规律，开展家畜、家禽、毛皮兽的良种选育和新品种培育以及獐、鹿、紫貂等毛皮兽的引种驯化工作，尽快地将现有各畜禽的优良品种群培育成新品种，不断提高生产性能。

4. 研究改进羊、牛、马、猪人工授精技术和精液稀释保存方法，扩大优良种公畜的利用率，加速畜种改良。

完成上述任务后，将可提出各地利用杂交方法迅速提高畜、禽生产性能的技术措施，并可选育出一批优良的家畜、家禽和毛皮兽的新品种。

四、控制和消灭畜禽主要疫病

畜禽疾病之中，以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危害最大，每年死亡畜禽不下数千万头（羽）。为了避免这件重大的经济损失，保障牧业发展和支援农业增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牛瘟、口蹄疫、牛肺疫、猪瘟、猪囊虫、羊痘、羊疥癣、鸡瘟等八种疫病。此外，目前广泛流行的布鲁氏菌病、猪气喘病、马鼻疽、鸭瘟等也应及早控制和消灭。十年内，兽医研究的任务主要是为消灭这些疫病提出科学根据和综合防治措施。当前应特别着重研究耕畜疾病的防治，保护耕畜的健康。同时为了大力配合人医在不长的时期内消灭人畜共患的日本血吸虫病，十年内兽医方面也应着重研究这一问题。

每一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研究，可以分为流行病学、病原、病理、诊断（检疫）、治疗、疫（菌）苗、免疫和防治措施等八个方面进行。但这两类疫病的研究重点略有不同。寄生虫病应以流行病学、诊断（检疫）、治疗方法及防治措施为重点；传染病应根据消灭牛瘟的经验，着重研究有效疫（菌）苗和诊断（检疫）方法。疫（菌）苗的研究应以弱毒苗和死苗同时并举，而以弱毒苗为重点。为了使疫（菌）苗的研究得到多快好省的效果，对于微生物的生理、生化、抗原化学和结构及变异规律的研究成为必要。大量生产疫（菌）苗的工艺规程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方法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使兽医方面最关键性问题之一，疫（菌）苗的研究从理论、生产到应用，配套成龙。

中兽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治疗牲畜疾病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宝贵的兽医知识和技术。中兽医学在理论方面有其独特体系，在治疗方面有疗效好又简易的针灸疗法，在广大农村和辽阔草原上有容易得到的多种有疗效的中药草，并有千百

年来许多民间兽医创造的多种验方。因此，必须重视中兽医研究，继承发扬祖国中兽医学。中兽医研究应以辨证论治在临床实践上的意义和脉诊、色诊的临床意义及其与生理、病理的关系，系统研究中兽医针灸技术、疗效及作用机制和整理验证民间验方、单方为重点。

在治疗畜禽疾病的各种药物中，化学药品的需要日益增加。有些化学药品不仅能治疗寄生虫病，还可以有短期预防寄生虫病的效用。兽医化学药品研究应列为重点。研究的方面有二：一为合成国外已有而我国所必需的化学药品，如治疗锥虫病的纳嘎宁、治疗焦虫病的拜尔——29493，治疗鸡球虫病的噻发啞那塞林等。一为研究创制国内外所无，而国内又必需的化学药品，如治疗马传染性贫血病的化学药品。化工部及卫生部的化学药品研究单位应承担起此种研究任务，同时兽医研究单位逐步培养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工作。

兽医仪器和医疗器械在过去无人研究，无专厂制造，许多兽医教学单位、研究单位和兽医院很缺乏必要的新的精密兽医仪器和医疗器械，今后应加强仪器和医疗器械的研究，并建立专门研究机构和制造厂。应由轻工业部指定工厂承担研究和生产的任务，大力支援兽医事业的发展。

在今后十年内，完成了上述兽医科学技术规划，不仅将显著地提高我国兽医科学技术水平，而且对主要的畜禽传染病可以提出有效预防疫（菌）苗，正确检疫方法和综合防治措施；对十种主要畜禽寄生虫病提出正确诊断方法、有效药物、治疗方法和综合防治措施；并对十几种普通病提出预防和治疗方方法。

五、加强畜牧业的机械研究

我国畜牧业生产目前主要依靠手工操作，亟需用机械来

代替，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在劳动力缺乏的广大牧区尤为重要。如绵羊剪毛季节性强，是牧区生产最紧张的时刻，许多地方由于劳力不够，不能及时剪毛，而使很多羊毛脱落，损失很大，另外以手剪剪毛留的毛茬较高，影响产量和质量，采用电机剪毛，不仅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四五倍，同时每只绵羊可多剪三两左右羊毛，还可增加羊毛长度。在饲料生产和加工方面，广大牧区由于劳力不足，很多事要做而不能做，如需要饲草但不能打贮足够的饲草，同时不少地区打草季节正是雨季，往往收贮不及被雨打湿霉坏，损失很大；农区的青饲料加工也需要很多劳动力，许多地方由于加工粗糙，影响饲料的充分利用。在缺水草原由于地下水位低，打井困难，致使大面积缺水草原尚未很好开发利用。此外，兽医生物制品的生产，目前亦多为手工操作，影响生物制品质量的提高，因此，畜牧业机械化是农业技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畜牧机械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今后十年必须大力加强。主要研究任务如下：

1. 选型、试制适合牧区综合利用的拖拉机作为各项作业的动力，还需选型和试制相应的饲料、牧草生产、加工机具，如青贮饲料联合收割机、牧草联合收捆机、悬挂式割草机（单刀、三刀）和搂草机、干草集垛机、压草饼机、青鲜饲料切碎机等机具。

2. 饲养管理和畜产品初步加工方面，在引进国外成功机具的基础上，进行选、改、创的研究，选型、试制电动剪毛机、羊毛压捆机、牛奶分离机、流动药浴设备、电牧设备、消毒车、防疫车和移动式挤奶装置等。

3. 开展草原打井和提水机具的研究，提出打深井机、打筒井机、新型深水水泵以及风力水车、风力发电设备等机具的

设计和试制品。

4. 加强农牧场畜牧机械化和兽医生物制品生产过程机械化的研究，提出乳牛场、养猪场饲料管理（饲料加工、调制、喂饲、饮水、管理，厩舍清洁等等）和兽医生物制品生产过程机械化方案，以及相应的机具。

第四章 林 业

林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担负着生产木材和其他林产品，改善自然条件、减少自然灾害、保护农田和草场的任务。我国林业的基本情况是森林少，分布不均，林产品生产水平低，特别是木材生产供需之间差距很大；同时广大缺林地区，水、旱、风、沙自然灾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对农业生产危害很大。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国地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并有广大高寒地区，树木种类丰富，生长迅速。大力发展林业生产，以保障农业丰收，满足工、农业用材的需要，同时积极营造木本粮油林及纤维林，为解决吃穿用问题，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潜力是很大的。

改变上述情况的主要科学技术途径是：

一、经营保护好现有森林，提高现有林的生长量

东北、内蒙古和东南林区森林的面积和蓄积量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林区的自然条件适于森林生长，林区基本建设基础较好，无论当前和长远都是我国供应木材的主要基地。十年内应着重研究解决这些林区森林的采伐方式、更新和抚育技术，以及永续作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掌握这些林区森林火灾和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蔓延规律，制订出经济有效的防治措施。现有森林中约计有四亿亩的次生林，这些森林生长很差，平均

每亩森林蓄积量不到四立米，经过正确的抚育改造可以大大提高森林生长量，为最近的将来提供大量木材。但是如果采伐不当，取材过度，便会使森林遭到破坏。为此，必须在五年内分别对东北、内蒙古、华北、西北地区的次生林制订以提高森林生长量为前提的抚育改造技术措施。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了解森林的生长发育规律。为了适应生产要求，十年内，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林区具体情况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制订出一套技术措施，并分别地区作出典型，制订施业案，加强技术推广，在各林场贯彻执行。要求达到大幅度提高林木生长量和森林资源利用率。

二、选育优良树种，提高速生用材林及木本粮油林的丰产培育技术

1. 提高用材林的丰产培育技术。

在全国特别是森林少木材用量大的黄河流域及华中地区，大力营造速生用材林，使其短时期内生产出大量用材。

速生树种以杨、柳、洋槐、油松、落叶松、杉木、马尾松、桉树、竹类为重点。

良种、适地、适宜密度和防治病虫害，是使林木速生丰产的四个基本环节。选育良种，首先要选择自然界优良类型，并制订出繁育良种和种子调拨、贮藏、检验的技术措施，划定优良母树林的标准和经营管理制度，以期短时期内给生产提供大量的良种，十年内使最主要的速生树种在重点造林地区所用种子基本上达到良种化。五年内通过调查研究基本掌握上述主要树种对立地条件的要求和生长发育特性，制订出各树种适地适树标准和提高造林地土壤肥力的途径和技术措施，以及各树种速生丰产的适宜密度和抚育间伐的制度。制定出杨树、油松、

落叶松、马尾松的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2. 提高木本粮油林的丰产培育技术。

增产木本粮油途径，第一是提高现有林的产量，第二是扩大新林面积。木本粮油以油茶、油桐、核桃、板栗、栎类、栲类为重点。

提高现有林的产量，应列为五年内的重点。提高现有木本粮油林产量的关键是加强土壤管理，改善树木营养（包括间作、垦复、施肥）和防治病虫害及气象灾害，五年内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地区条件制订出土壤管理制度，和防治主要病虫害和气象灾害的技术措施。

扩大木本粮油新造林面积，提高新造林产品产量和品质。关键在于选育良种和掌握树种乃至品种的生态特性，作出栽培区域规划以及改善林地特别是瘠薄山地土壤和水分条件的技术措施。五年内对油茶、油桐、核桃、板栗选出一批优良类型，使一九六七年以后重点造林地区所用种子，基本上达到良种化，初步制定出各树种的栽培区域规划和山地栽培的技术措施。

三、加速荒山造林，提高水土保持林、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的营造技术及其防护效益

以细致整地为中心的荒山造林技术，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成功，问题在于需要大量劳力、造林进度缓慢，为了加速荒山造林，必须进一步寻找省工、高效的荒山造林途径和技术。为此，五年内以黄河中游半干旱地区为重点，研究掌握荒山的立地条件特点和自然植被的发生演替规律，找出不同立地条件类型封山育林的可能性和促进成林的技术措施，以及适宜造林的树种；研究适于播种造林的立地条件和播种造林技术；对于当前不宜于造林的荒山，找出恢复森林植被的途径和现阶

段应发展的植物种以及植被建成的方法。

水土保持林、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的一般造林技术已经基本解决，今后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盐碱地、流沙地和干旱瘠薄坡地等造林困难地区的树种选择和造林技术，以及提高各种防护效益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规划设计。十年内以黄河流域、沿海和西北地区为重点，研究选育抗逆性强的树种，造林困难地区的土壤特性、土壤改良途径和造林技术；研究各种防护林的配置和经营技术与气象水文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为各种防护林的规划和制定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四、提高“四旁”植树的质量，改善农用材的供应

农用材包括薪炭材的需要量大，品种规格要求多，供应地区分散，今后主要依靠“四旁”（村旁、路旁、河旁、宅旁）植树加以解决。五年内针对农用材的不同规格要求，选出一批优良树种，对群众经验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因地制宜推广提出科学的依据。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农用各种特殊林产的培育，如薪炭林、杈子林、条子林、用材树木、棕榈和竹类培育，制订出一整套的技术措施。

五、提高营林和木材采运生产机械化的水平

当前我国营林和木材采运生产大部分为手工作业，工效低，劳动强度大，现有一些机械设备多系国外进口，型号多，不配套，因而劳动生产率很低，成本却很高。提高营林和木材采运机械化水平的捷径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就国内外现有的机械设备和先进经验，加以引进、选择和改进。一九六三——一九六七年内以“引、选、改”为主，着重解决山地整地、造林和抚育的机械化与半机械化机具，和木材采运生产机械化及生产技术问题。十年内根据采运工艺的要求，相应地研究解决伐区准备作业、辅助作业和集材作业的设备、新

型的采伐与牵引机械设备以及贮木场作业全盘机械化和部分自动化设备；同时研究林区道路的规划设计、修建、施工和养护的机械化问题；并研究木材水运生产中的高流速木材阻拦设施、木材过坝方式和设备、编排机械及机械化编排、排型结构及木材水运生产技术问题。

六、提高木材利用率、延长木材使用年限

提高木材利用率、延长木材使用年限是缩短木材供需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提高木材利用率方面，综合利用采伐加工剩余物是一个关键。前五年，着重解决纤维板的生产技术，研究试制较高吨位的热压机，解决高速磨浆机的配套设备，并相应地解决有关刨花板、厚纸板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改进小规格材的生产工艺、设备和扩大小规格材的用途，进一步提高碎料胶合技术。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木材胶合剂的研究，寻找和试制新的胶合强度高、原料来源易、成本低的胶合剂。延长木材使用年限的主要途径是木材防腐和木材干燥。木材防腐方面着重研究解决提高现有防腐剂的质量，试制适合我国资源情况的高效能复合防腐剂，进一步提高高压浸法、简易防腐的能力和浸法技术；探索用高分子单体压入木材组织后进行聚合，使产品具有坚固耐用，难燃难折，不腐不蛀的性能；木材干燥方面，前五年着重研究提高已有的简易干燥法，改进高温炉干燥技术，研究效率高、资源省的瓦斯干燥法以及各种新型干燥法。此外，通过木材改性处理以提高木材质量的技术措施，如以压缩木作锚杆代替坑木等，也须进一步加以研究。

为了使木材得到充分的和合理的利用，还必须进行各种用材规格标准的研究，此外，对于木材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连续化和新产品的创制，以及有关木材加工工业的基础理论研究等，亦须作适当安排。

七、十年内对紫胶虫的放养、繁殖和寄生植物的栽培管理，也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以提高紫胶的产量和品质。

第五章 水 产

我国渔业产量解放后迅速增加，但未持续上升，近几年来反而连续下降。主要原因是：近岸海区和江河湖泊捕捞过度，远岸和较深海区及中上层鱼类利用得极少；海水养殖仅限于极少数的种类，许多可供养殖的动、植物尚未能养殖利用；淡水养殖仅限于池塘等小型水体和少数鱼类。因此，要稳步增产，十年内在科学技术方面，必须首先解决下列问题：（一）如何避免可能破坏资源的人为措施，科学地有效利用我国内陆水域和近岸海区的渔业资源？（二）怎样才能迅速地开发利用远岸的和较深的海区以及中、上层水层的渔业资源？（三）海中许多可供养殖的高产、高营养的动植物，怎样才能很快地养殖起来？（四）中、小型湖泊、水库、河道水面，怎样才能很快地养殖利用起来？这些重大关键性的问题，应采取下列科学技术途径解决：

一、摸清我国主要捕捞对象的数量变动和游动规律，以及影响繁殖的主要因素，找出保护和增殖资源的有效措施；在保证资源永盛不衰的基础上科学地计划捕捞。同时，大力开展远海资源调查，探索新渔场

近数年来经验证明，仅仅增加渔船和提高捕捞强度，不能确保捕捞量的增加。相反，海洋和内陆水域因捕捞过度，损害了资源，产量大减的事例比比皆是。必须迅速摸清资源情况，找出有效的增殖、保护措施，并在较远较深海区大力探索新渔场，使增加渔轮后，确能取得不断增加捕捞量的效果。资源的

增殖、保护和新渔场的探索，是目前确保捕捞量增加的两条可靠技术途径，缺一不可。但在不同水域，又须依据资源及其利用程度的具体情况，斟酌轻重缓急，分别对待。

1. 黄、渤海区小黄鱼、对虾在渔汛期内的动向及集群地点，已能根据对海况的分析，进行经常性预报，有效地指导生产。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生态，提高预报的准确度。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捕捞过度和对资源的损害所引起的产量下降。所以必须着重研究小黄鱼、带鱼、对虾、毛虾等主要捕捞对象的数量变动、游动规律、种间关系、捕捞方式和强度对资源的影响，资源增殖途径及确切可行的有效保护措施。渤海是重要鱼、虾类繁殖肥育基地，尤须首先作为试点，依据鱼、虾类幼体不同发育阶段的数量变化，来估计成活率，找出有关因素和成活率的关系，并据以设计试验，提高成活率，来壮大资源的补充群体；同时，还必须研究在人工条件下培育鱼、虾类种苗，向海中放流来增殖资源。这些科研工作，虽然在国内还是空白，现有技术力量及设备条件也太差，但为确保资源的永盛不衰，必须积极开展。

黄海中沿泗渔场减产严重，大沙越冬渔场尚未充分利用，都应作为重点调查海区。

2. 东海中央区的渔业资源，我国尚未利用。所以，东海的资源调查，应着重探察新渔场和新捕捞对象（特别要注意鲐、鲹等上层鱼类）。数量变动的研究，应以大黄鱼、小黄鱼、乌鲗等为主要对象。

3. 南海富有底层及上、中层鱼类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可开展多种作业，并可常年作业。目前除北部湾外，在广阔的南海，我国尚无渔轮作业。近二十年内，这将是我国海洋渔轮捕捞增产的重要海区，急需进一步摸清资源情况。应首先

在南海北部着重进行底层鱼类资源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底层鱼类的群聚形成和数量变动的规律。南海南部的渔业资源普查，以及鲚、鲭、旗鱼等上层鱼类和海兽的探察，也要积极开展。十年内还应继续向外扩展，开始远洋渔业资源的调查，为远洋渔业提供科学根据。

4. 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衰退迹象比较普遍，极应以大、中型湖泊、水库、江河为重点，迅速进行细致的调查。着重调查水质、生产性能、经济动物和饲料生物的种类组成，及可经常维持的最高产量，以及水利工程与工业污水对资源的影响。提出有关增殖、保护和科学地经营管理提高鱼产量的有效措施。

二、广泛应用新技术，改进渔具、渔法

我国渔具改进已有初步效果，必须在此基础上，参照各国高效能的渔具优点结合我国捕捞对象和渔场的具体情况，继续对绝大部分的现有渔具及使用技术水平，积极加以改进。至于损害资源的落后渔具，更必须根据它们的实际性能，分别加以淘汰或改进。世界上最先进的船上和空中侦察鱼群的新技术，应即广泛采用，并在应用中研究改进。要利用探鱼仪器的鱼群映象和水下电视等，研究鱼群行动规律和瞄准捕捞技术，并根据捕捞对象对各种网衣和声、光、电、色、味等物理刺激的反应，和它们视距、听距、游速、冲力等进行试验，改进渔具渔法，提高渔获效能。

黄、渤海以改进定置渔具和双拖网为重点。东海和南海，应着重试验研究灯光诱捕、深水围网、中层拖网、流网及钓鱼技术，以推进远海、远洋渔业和多种作业。

植物纤维渔具材料的防腐处理方法，目前仍需继续研究改进。但化学合成纤维必须大力推广应用，及时解决应用中发现的问题，尽早实现我国渔业网具“胶丝化”，这是我国渔业技

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大力进行高产、高营养及珍贵品种生理、生态的研究，改进养殖技术，来扩大养殖种类和养殖面积

1. 我国浅海、滩涂、港湾目前只养殖利用约百万亩。产量超过一万吨的种类只有海带、蛭子和牡蛎。蛭子和牡蛎，是目前海水养殖动物增加产量的主力，应在粗养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根据它们生理和生态的需要，提高养殖技术和选择养殖地点，积极扩大养殖面积。海带养殖，已试验成功，使用物资少、成本低、能抵抗海中波浪的简易养殖方法，应在推广中继续研究改进。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研究生理、生态的基础上，研究试养更多的优良品种。紫菜、对虾的养殖，和珍珠贝的插核培珠及养殖等，必须首先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尚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技术过关。对鲰鱼、鲷鱼、泥蚶等已有了一些蓄养、粗养的经验，对遮目鱼、比目鱼类、贻贝、扇贝、西施舌、杂色蛤、鲍鱼、海参、裙带菜、鹅掌菜、羊栖菜、江篱、石花菜及单细胞藻类等，也有了一些试验研究的基础。对这些可供养殖的优良品种，都必须深入研究，找出它们生活各阶段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据以设计试验，得出人工养殖的方法，使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大进一步。

2. 我国池塘养鱼，在总结丰富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试验研究，技术及理论都日益有所提高。池塘已普遍养殖利用，单位水面产量较高。因此，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小型水面势将成为淡水养鱼增产的主要基地。所以，对不同类型的几千亩至万亩左右的中、小型湖泊、河道、水库等必须在有关生产性能和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积极研究提高鱼产量的有效方法，来扩大养殖水面。同时，还要培育并移殖驯化成长快、生活力强、繁殖力大的优良品种，来扩大鱼类养殖和放养的种

类，这对各种类型水体的增产都可起重大的作用。

四、积极提高水产品的加工质量

绝不能允许捕来不易的水产品变质、变坏。目前我国冷藏主要是采用缓慢冻结的方法，冻鱼质量不高。鲜度保持的时间往往短于渔轮航程或车、船运输的时间，部分鱼类变质现象较普遍。必须加强改进保鲜方法、延长保鲜期限的研究。主要研究快速冷冻、抗菌素等药物冰藏和冷却海水的保鲜效果和工艺条件，以及冷冰、冷藏的最适工艺条件。在保持鲜度的基础上，改进群众大量腌制、干制的技术，提高质量，并扩大熟食品的加工品种。

五、渔业机械化及半机械化

重点改进劳动量大、效率低的操作方法和手工工具，实现近岸捕捞渔船动力化，操作半机械化和养殖、加工的半机械与机械化。对远海机轮渔业及部分国营加工企业，则要求完成机械化或现代化的技术改造。我国养殖增产潜力很大，技术过关后劳动力的不足，将更是发展养殖的重要限制因素；特别需要大力研究试制机械代替繁重的手工操作（如蛭子翻埕、布种，牡蛎投石，海带干燥，各种海水养殖品的收获和淡水养鱼的一系列的繁重操作等等），逐步实现海、淡水养殖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第六章 热带作物

我国两广、云南、福建南部，热带、南亚热带地区，经初步勘察约有四千万亩以上橡胶及热带作物宜林地，适宜于发展国防及工业急需的橡胶、剑麻，高产木本油料椰子、油棕，耐旱木本粮食木薯以及热带药材、香料、饮料、香辛料、果树、

绿肥、牧草、贵重用材等。解放后，我国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生产与科学研究事业，在原来极为薄弱以至空白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但还远不能适应国家及人民的需要。当前橡胶和热带作物生产与科学研究中，尚有不少重大问题亟需解决，如热带地区综合开发和作物布局尚未做出全面规划，橡胶育种、栽培、制胶技术尚需进一步研究提高。其他热带作物的研究基础很薄弱，热带气候、土壤、植物等生物、地学基础学科，以及热带农、林、牧业等有关研究还未相应建立和发展。因此，热带作物研究应以橡胶为主，以选育良种为中心，研究抗性、速生、丰产、质优、高工效、低成本的良好培育、栽培、收割、加工技术及其有关基础理论。加强热带农、林、牧业及热带生物地学的研究，为多快好省地全面综合地开发我国热带地区服务。主要研究任务为：

一、我国热带植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

进一步调查及定位研究我国热带地区植物、土壤、气候、地形地貌等资源情况及自然条件特点，鉴定落实橡胶及热带作物宜林地，提出以海南、滇南为主的热带作物合理配置、布局方案和农、林、牧、加工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发展比例关系。制定热带森林、动植物等生物资源的保护办法及利用，改造风、寒、旱、瘠等不利自然条件的有关措施，为热带地区的综合开发提供科学根据。

二、橡胶树良种选育、栽培和加工技术及其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

继续引进国外抗性高产新品系，结合我国不同类型的植胶区及风、寒、旱、瘠等自然特点，进行适应性鉴定及推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更优良，单株产量五公斤以上的新品系。研究提出速生丰产的栽培技术及胶园抚育机械化技术

措施。

研究制定增加产量三分之一或节约劳力三分之一的割胶制度与化学刺激增产技术，以及防治白粉病、割面病和根病的经济有效措施。

初步掌握我国天然胶乳及生胶的基本性质和应用性质。改进现有烟片及浓缩胶乳生产技术，提出连续制胶的新工艺流程及设备，节约烟片干燥熏烟木材用量三分之一或不用木材干燥的技术措施，试制风干胶片、褐绉片、木素共沉胶、接枝橡胶等新品种。

三、热带木本油料及硬质纤维为主的热带经济作物引种、选种、栽培与加工技术的研究

研究提出椰子、油棕选种及其速生丰产栽培技术，椰子油、棕油及橡胶籽油，出油率高、质量好的小型加工方法。

硬质纤维着重解决剑麻高产、抗叶斑病的栽培技术和叶渣等副产品的综合利用途径。

其他热带作物亦应根据生产需要进行选种及栽培的研究，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解决我国存在的特殊的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同时，应大力加强热带作物，特别是良种的引种试种工作。

四、加强热带农、林、牧、水利等有关热带农业开发问题的研究

热带农、林、牧、水利有其地区特殊问题，是热带地区综合开发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热带粮食及畜牧业应着重研究提高水田单产、水旱轮作技术，热带旱地粮食作物与热带绿肥、牧草、农牧结合不断提高地力的栽培轮作制度，热带林业着重研究提出柚木、轻木等贵重用材林及防护林、薪炭林营造技术，热带作物防护林带、林网的合理规划，调查提出热带地

区水利资源综合利用，热带作物灌溉方法及经济效益，以及水能电力网的规划方案。

五、加强热带生物学、地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

热带生物学、地学是发展热带农林生产的理论基础。着重研究掌握热带土壤的基本性质、类型及肥力消长的规律；热带野生植物资源，特别是木本油粮（如油瓜）的调查研究栽培驯化；研究热带作物生长发育、抗寒及胶乳等次生物质生成等有关生理机制；制定热带农业气候区划，研究橡胶寒害、风害规律与地形小气候的关系，以减轻自然灾害，为改进栽培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第七章 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

农业技术改革主要是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这四个方面的既要齐头并进，又要因时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有所侧重。

它们的具体任务和方向分述于下。

第一节 农业机械化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结合我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为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提供先进的作业方法和机具，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力求以较少的机器型号系列和最齐全的品种满足最多种的需要，同时加强机器运用和修理的研究。必须既加强农业机械化作业方法的研究，又加强农业机具设计、制造的研究，并且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为农业机具的选型、改进、创

造提供科学依据。要学习和采用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努力吸取国外成熟机具和我国传统农具的优点，加强试验工作，健全研究、设计、制造、运用、修理的体制，促进我国农业机械科学技术的发展。引用国外机具必须针对我国具体的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结合机械化方法的研究，进行选型和必要的改进。为解决适应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特殊机械化问题，还有必要系统总结我国群众的生产和实行机械化的经验，探讨有关基础理论，创造所需要的具有我国特色的机具。农业机械化的科学研究，还应当特别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密切协作，在共同解决重大生产问题的过程中，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一、制定农业机械化区划，寻找不同地区实现机械化的科学途径

为了因地制宜地实现机械化，必须在总的农业区划之下，制定农业机械化区划并探寻不同地区实现机械化的途径，为有计划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制定各地区的农业机器系统，统一规划农业机械的制造、使用、修理的体制与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为此要进行不同地区有关机械化的自然条件和农业情况的调查测定，并分析现有主要农业机械的地区分布和利用状况；分区评价机械耕作、收获、排灌等主要作业和畜牧业、林业的机械化条件，制定农、林、牧业机械化的综合区划；研究国内外农具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提出分区实现机械化的步骤和途径。

二、拖拉机和配套机具

在已选定生产的八种拖拉机的基础上，集中力量解决平原旱作地区各种作物田间作业机械化及垦荒所需的拖拉机；基

本解决水稻耕作及热带重要经济作物垦殖管理所需的拖拉机；初步解决重点牧区主要作业和林业集材所需的拖拉机。并为这些拖拉机选型配齐与研究配齐东北垅作、黄淮平原、西北灌溉平原、南方水田和热带作物地区主要粮食、经济作物成套的机力田间作业农具，包括整地、播种、中耕、施肥、脱粒机具，小麦、玉米、水稻收割机和联合收获机，以及粮食、棉花、橡胶、蔬菜、果树的高效率、高射程和远射程的植保机具。进行拖拉机开荒、清理荒场、治理坡地、修筑梯田、水利施工、开沟筑渠及改良盐碱土等附加装置的选型与研究，为拖拉机配齐运输挂车和卸装工作的附机，以及机械化半机械化运输工具的研究改进。

探索山地田间作业的动力型式和对机力农具的要求，完成沅田、稻麦两熟和种双季稻地区绳索牵引机与配套农具的研究工作。

三、动力和排灌机械

根据我国资源条件，我国农用内燃机燃料以柴油为主。整顿柴油机现有产品、制定我国内燃机统一系列。同时，大力发展植保机械、自走农具、林副渔机具的配套内燃机以及农田排灌急需的小马力内燃机和利用自然能的动力机械。整顿与发展农用水泵，特别是要补齐低扬程小流量、低扬程大流量的水泵系列，解决井灌区和牧区急需的深井提水问题，研究改进水轮泵、内燃水泵、潜水泵、喷灌泵、射流泵、拖拉机悬挂水泵和传统提水工具，并完成系列设计。

四、半机械化农具和林、牧、副、渔业机械

丘陵山区田间作业应重视半机械化机具，选型和研究改良农具和新式机具，如山地犁、耙、播种机、收割机等。一般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需要依靠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对

新式步犁、水稻插秧机、甘薯植秧机、畜力收割机等予以研究改进提高。选型和研究营林、伐木和集材的动力机械；水产捕捞、养殖和加工机械；以及磨面粉、碾米和甘薯、棉花、油料、茶叶等收获物的干燥、加工机械。为牧区解决草原凿井、提水、供水机械，牧草收获、青贮机械，畜产品（毛、乳）收集、加工机械；为畜牧业选型与研究饲料加工、调制机具和设备。

五、研究农业机器的系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研究制造农业机具的材料和工艺

农业动力和作业机具种类很多，数量很大，应当将各地需用的机具型号加以整理，力求以较少的型号系列满足最广泛的生产要求，实现产品的系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以便于制造、使用和维修。这项重大的技术工作，必须在提供大量机械产品以前，就及早打下基础。首先要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出内燃机和拖拉机的系列型谱和各项有关的技术标准。

六、研究农业机器的运用和机械化农业企业的合理配备与技术管理问题

正确配备机械化生产所需的机具设备，管好、用好机器，提高机器使用效率，延长机器寿命，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国家有计划按比例组织农业机械化生产和农业机器制造的必要根据。为此要研究动力机与作业机组的配套问题和合理运用问题；研究内燃机、拖拉机和其他重要农业机器技术状态的检查和维护方法，制定技术维护制度；研究机械化农业（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人民公社等）机具设备的配备原理和方法；研究各项机械作业定额和作业计划的制定方法，以及机群运用指标、机群调度等问题。

七、研究农业机械的修理体制和修理工艺

当前排灌动力和拖拉机约有三分之一左右因故障不能使用，问题十分严重。在正常情况下，每台农业机器在全部作业寿命中用于修理的工时、资金花费也要数倍于制造的花费；同时农业机器的数量很大，使用分散，使用的季节性强，对修理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因此，无论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看，修理终是农业机械化事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为做好修理工作，要研究与机器构造特点和使用特点相适应的修理体制和修理网的设计计算方法，探讨换件修理法在我国应用的条件；研究农业机器的磨损规律、报废极限和配件消耗定额；研究制定国产内燃机、拖拉机的修理工艺规范和曲轴、缸体、行走系统等主要零件的修复工艺；研究农业机器技术故障的分析和排除方法以及有关的仪器设备。

八、关于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机械基础理论的研究

为了能够根据我国条件，解决我国所特有的精耕细作农业的机械化科学技术问题，为农业的技术改革奠定科学基础；并在十年内逐步从仿造国外机器为主，过渡到以自行设计为主，争取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别要结合我国生物学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和作物特性，研究探讨各项主要作业方法的基本原理和相应的农业机械设计理论；要研究国外农业机械化的新理论、新技术，并根据我国条件加以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要掌握田间快速试验方法和综合测试技术，以加速提供农业机器产品。

第二节 电气化

我国以排灌用电为中心的农业供电，近年来发展很快，

对农业增产起了很大作用。实践证明，电力作为农业机械的动力，具有简单、可靠、经济、便利等优点。今后除在已供电的地区内整理和改造电力网，并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生活上的用电外，还要发展新的供电区域，并推广电能农产品贮藏、禽畜饲养、种子处理、育苗、干燥等方面的应用。电力耕作将在部分农田内采用。此外，还要对农业、畜牧业等一些生产过程，进行综合电气化和自动化的试点工作。农业电气化的不断发展，为农业采用新技术，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

我国一九六二年农业总用电量达到十二至十三亿度，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十倍以上（其中排灌用电占百分之六十），但平均每个农业人口用电量仅二点四至二点六度，相当于苏联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水平。

我国几年来发展农业供电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一规划，在电源和电力网的布局、线路建设以及器材和投资的使用等方面，都有不合理现象；不安全情况严重，事故多，供电的可靠性差，电压质量低，发电和用电设备不能充分利用。

但实现农业电气化，需要解决一系列特殊的问题。因为向农业供电所需要的设备、杆线等，分布在广阔的面积上，经常受到各种气候和环境的影响，使用和维护的条件都差，运行和修理力量也较弱，因此，它们必须简单、坚固、可靠、耐用，但投资又必须适合农村经济条件。农村发电站、变电站和线路的设计及运行必须能保证适当的供电质量和较低的供电成本，使用电设备能充分发挥作用，用电的经济效益大大超过用电的代价。而且农村用电的负荷密度低、供电距离远、利用率低、供电成本一般要比城市供电高的多，这又是农村供电需要面对的困难条件。因此，在进行农业电气化的工作中，除尽量利用城市和工业区供电已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验外，还必须进

行针对农业供电特殊条件的科学技术研究。

一、研究农业电气化的技术经济问题

为了合理规划、制定各种技术政策和选择正确的技术方案，必须研究农村电源的合理布局、农村电网的电压等级和供电方式、农业电负荷特性及提高线路和设备利用率的途径等技术经济问题。

二、提高供电质量的主要内容是提高供电的连续性、减少事故和改善电压质量

提高供电安全可靠性的主要方法是：解决小型水轮机的振动、气蚀、磨损以及农村火电厂的水处理等影响安全发电的关键性技术问题，改善电气设备的电气绝缘，发展简单、可靠的电路控制和保护装置，提高发电与变电设备、线路施工和检修工艺水平。提高电压质量的主要方法是研究变电所和输、配电线路的调整电压和补偿无功功率措施，制造质量良好的静电电容器，以及发展农村发电设备自动调整速度和电压的装置。

三、节约有色金属和木材，是降低线路投资和加快电力网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

为此，应研究利用大地作为高压线的导体，采用三相和单相的混合供电制，研究代替铝线的新型导线，发展轻型钢筋混凝土电杆等。

四、以电网供电为主力，电网和农村小型电站（主要是小型水电站）并举的方针，是目前农业供电的主要方向

必须编制小型水、火电站的典型设计，合理利用已建成的水利工程发电，开发当地的特殊能源（如潮汐能、风能等）。

五、电气设备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

在电气设备的制造方面，实现产品的系列化以及部件和备品的标准化和通用化，发展成套的、工厂组合的设备，从而提

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加快安装，便利维修和备品的供应。还要研究适合于综合利用的移动式电动机，在适合条件下发展机电合一的装置（如潜水泵）等。

六、水电站的集中控制、自动化与小型火电站、线路施工的机械化、半机械化

根据农村发电站和变电所容量小、数量多以及输、配线路长的特点，应在保持投资经济、运行维护简单的前提下，发展农村水电站的集中控制和自动化，小型火电站输煤、除灰的机械化，线路施工和检修工作的机械化、半机械化，从而减少建设和运行所占用的劳动力。

七、研究耕作与其他农、牧工艺的电气化

还要适当地研究电力耕作的技术问题，脱谷场、畜牧场、养禽场等农牧业生产工艺过程的综合电气化和自动化，电能 在农业生产的特殊应用等，为农业电气化的更高阶段提供技术准备。

第三节 水利化

我国地域广大，河流众多，年迳流量总计达二万六千八百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也很丰富，水能蕴藏量为五点四亿千瓦，发展水利事业条件良好。但是，由于我国自然条件复杂，雨量的分布在地区上和季节上都相差很大，无论在湿润的南方或半湿润、半干旱的北方，都受着干旱的威胁；在西北的一些干旱地区，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在雨量不均匀的条件下，许多河流的洪枯水量悬殊，加之地形地貌条件的限制，南方或北方都容易发生洪涝灾害。自公元前二四六年（秦始皇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二千一百八十三年间，曾发生水灾一千零三十七

次，旱灾一千零三十六次。水旱灾都很严重。解放后，大力兴修水利，成绩很大，各地防洪、除涝、抗旱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水旱灾害的威胁还很严重，许多地区防洪除涝标准还低，灌溉设施还不完善，尚难保证农业稳定生产。

由于我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在同一地区，常是旱涝互现，而且又常遭受洪水的威胁，所以水利化应当包括除水害与兴水利两方面的内容。

一、防治洪水灾害

我国防洪工作有悠久的历史，近年的实践经验也极丰富。在大量兴修水库调节洪水以后，有的地区对于几千年来借以防御洪水的堤防湖泊洼地，放松了管理，应当引为教训。防洪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措施，综合治理，不可偏废。在修建了水库以后，提高了防洪标准，但是，对于堤防仍须经常维修加固；对于湖泊洼地，应当在统一规划下研究合理利用方案；不可盲目围垦。长江干支流在控制性大水库兴建以前，要积极研究利用堤防与湖泊洼地的防洪方案；研究荆江段的治理方案，并进一步研究干支流水库陆续兴建后，逐步提高防洪标准的方案。对于其他大江大河，如松花江、珠江等，也应进行相似的研究。对于许多中小河流的防洪，应因地制宜地研究各种有效的防洪措施。

泥沙问题是我国许多河流治理工作中的难题。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淤积仍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当研究黄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与运行方式，黄河下游的冲淤规律、河道治理、堤防加固及其他控制洪水措施的问题。我国许多河流有含沙量大，河床变化剧烈的特点。因此，这项研究就成为我国水利科学技术上突出的重点。

为了保证防洪工程的安全与经济合理，对于洪水计算及洪

水预报须加强研究，进一步提高其可靠性，延长其预报期。为了提高山区生产和减少河流泥沙淤积，应研究水土保持工作中的生物与工程综合措施，并积极推广。

二、减除涝灾

我国的低洼易涝面积共有三点八亿亩。过去洪涝灾害不分，统称为水灾。近年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治理以后，内涝灾害才显得突出，虽然没有洪水凶猛，但是却比较频繁。如黄淮海平原，东北大部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太湖流域、长江中游等许多商品粮食产区，都存在着严重的内涝问题。

减除内涝工作安排不当，则易引起地区间的矛盾；而且工程量大，排水又须有出路。因此，除涝工作应经过统一规划，本着上下游兼顾的精神，采用各种办法尽量排泄，并充分利用自然的低洼地带滞蓄。至于排涝措施，则应以自流排泄为主，不能自流的则采用机电排泄。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应继续研究不同类型地区的内涝成因与发生规律。除涝工程量很大，应研究经济有效的措施。

三、灌溉

灌溉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由于有的渠系配套不全，进行大水漫灌，引起不良后果；有的放松了水利管理，制度废弛，工程破坏，效益降低。

当前灌溉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完成已成水库及渠道的配套工程，及早发挥灌溉效益。研究水库的调度方案、灌溉制度及灌溉技术。

在开发农田灌溉或牧区灌溉时，对于地面水及地下水均应统筹使用。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应积极调查地下水资源（包括浅层水与深层水），摸清储量、深度及水质。对于引黄灌溉及引汉济黄等工程，应结合黄淮海地区旱涝碱淤的综合治理，

进行研究。

在平原易涝易碱地区进行灌溉，应同时研究排灌结合的方案。对于灌溉方式，则应采取自流与提水并举，因地制宜，经过经济比较后确定。提水工具应土洋并举，研究改进人力畜力提水工具。有条件发展机电排灌时，要经过统一规划。

渠道渗漏是浪费水量及抬高地下水位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渠系有效利用系数一般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应积极研究渠道防渗措施。

四、防治土壤盐碱化

在我国耕地中，程度轻重不同的新老盐碱地约有一亿亩，此外，在华北、西北、东北及滨海地区还约有二点六亿亩盐碱荒地。有些新灌区的土地发生盐碱化；有些改良后的盐碱地又重新发生盐碱化。根据改良盐碱地与防止土壤盐碱化的经验，认为应采取以防为主，防、治并重，改良与利用相结合，防治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农业、林业和水利措施的综合治理。

为此，应当继续研究土壤中的水盐特征和水盐运动规律，并总结群众经验。研究控制地下水位，保持水量平衡，减少地面蒸发，抑制盐分上升，促使土壤脱盐，以及提高土壤肥力的各种有效的农业、林业和水利措施。如合理的布置灌溉与排水工程，结合轮作、耕作与林网设施的综合措施等。

五、水工建筑

水工建筑是控制河流，兴水利，除水害的重要手段。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实践中，我国水工建筑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许多河流峡谷深、流量大、地质条件复杂，建筑大型水利工程的技术也非常复杂。必须进一步研究岩石地基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地震问题；土质地基的砂砾石

地基的防渗加固问题；高坝的型式问题，包括混凝土坝的结构型式、土石坝的填筑方法等问题；高速水流、高压阀门等重大技术问题。

六、水利施工机械化

我国幅员广大，需要兴建的水利工程很多，所以土石方与混凝土的工程量非常巨大。必须逐步提高施工机械化水平，走向综合机械化施工。

首先应研究试制一些当前急需的中小型施工机械，如土石方开挖填筑、河渠疏浚、混凝土平仓等方面的机械。其次，要抓紧解决当前施工工序衔接的机械化，组织机械联合作业，逐步向综合机械化、连续化发展。

七、水利化规划与水利管理

水利规划及其经济论证是制定水利战略部署和确定工程规模的依据。要根据我国水利资源和水旱灾害的特点，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研究各项水利建设的布局、规模和发展速度，并研究结合我国具体条件的经济效益论证方法。

水利管理是过去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管好、用好是水利建设充分发挥效益的关键。应加强研究工程的运用维修、水源的调度使用等问题。

第四节 化学化

利用化学和化学工业的最新成就为农业的全面综合发展服务，是使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化学化的主要内容是采用化学肥料与合成农药，同时农副产品的化学加工和综合利用，高分子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也是农业化学化的重要内容。

一、化肥

我国化学肥料生产的基础很薄弱，用量也少。解放后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至今仍是品种少，水平低。必须积极研究掌握以液体、气体原料制合成氨，制造新氮肥品种以及其他化肥制造的新技术，以促进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

1. 氮肥

(1) 合成氨的原料。积极掌握以重油或原油和天然气、焦炉气为原料，制廉价氢的技术。近期，无烟煤、块煤和焦炭，仍然是制合成氨的主要原料，但目前我国合成氨厂多采用固体层煤气炉，只能使用较大块煤和焦炭，不能使用碎煤碎焦。随着煤矿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碎煤比例将更增多。应即着手研究采用富氧空气连续气化小颗粒煤焦的方法，改造现有的煤气炉，便能气化十至二十五毫米粒度的碎煤和六至十六毫米的碎焦。同时也要研究粉煤气化炉，以扩大使用煤焦的范围，更经济的利用资源。液体原料方面，采用重油制合成氨用量少，生产经济，运输方便，是发展的重点。近期应首先掌握原油气化的技术。随着炼油工业的发展，逐步转向利用重油为原料。在研究掌握油气化的时候，要考虑到既能使用原油，又能使用重油。气体原料方面，天然气是制合成氨经济的原料。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应集中力量采用新技术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建起来，为利用天然气制造氮肥打下基础。利用钢铁厂的焦炉气制造合成氨，同时生产钢渣磷肥，建立钢铁化肥联合企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应安排一个钢铁化肥示范厂（如石景山钢铁厂建化肥车间），以掌握技术，为将来向这一方面发展做好准备。

(2) 氮肥品种。我国应采取多品种的发展氮肥路线，而以发展硝酸铵和尿素等高浓度氮肥为主。同时要结合资源和地区条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硫酸铵、氯化铵、碳酸氢铵、石

灰氮和液体氮肥等。硝酸铵的生产技术有把握，应为最近几年内发展的重点。尿素既是高效氮肥（含氮百分之四十六），又是饲料，也是有机化学的原料。应该在目前已经掌握的半循环法的技术基础上，着手研究全循环法的生产技术。硫酸铵采用硫酸直接中和合成氨的生产方法是不经济的，今后要靠焦化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副产回收，和有机合成工业的生产过程中的副产而得。氯化铵从联合制碱的方法生产是经济合理的。在有食盐资源的地区，结合纯碱工业的发展，应该适当地生产这个品种。碳酸氢铵的生产工艺流程是我国大跃进的产物，它是中小型合成氨厂的适当产品，在进一步研究解决干燥、贮存和施肥等问题后，可以适当地发展。石灰氮在南方酸性土壤施用很适宜，同时有杀虫、除莠等作用，在有廉价电源地区，也可以发展。液体氮肥，包括液体氨、氨水和其他氮肥的水溶液，在生产上简化了氨加工的工序，节约投资，成本较低，在解决了运输、储存和施肥机具的条件下，发展它是经济的。

（3）合成氨厂的规模。我国合成氨厂的规模应当是大型与小型相结合，而以大型为主。大型厂如用固体原料，规模以年产氨十至二十万吨为宜，在靠近煤矿的地区建厂，可以稍大一些。用液体或气体为原料，规模可以大于二十万吨/年。为了今后多快好省地建设合成氨厂，在目前已能完全自制二点五万吨/年合成氨设备机组的基础上，应既研究制造五万吨/年或更大型号的设备机组。至于建厂布点，以固体和气体为原料的合成氨厂，宜建在原料基地附近；以液体为原料的厂，由于运输量较少，除在油田附近建厂外，也可以在海边、江边及铁道沿线布点。

合成压力在目前在三百大气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制造新型的高压压缩机和副产蒸汽的高效能合成塔等。对于更高

压力的合成设备也须进行试验。关于加压气化、加压气体净化、运输高度自动化和生产控制自动化等新技术，应积极研究掌握。

2. 磷肥、钾肥

我国各地土壤性质各异，作物种类繁多，对磷肥的要求也是多品种的。我国磷矿的分布特点是大矿多偏在西南地区，各矿岩石类型不同，高品位的富矿较少，中品位和低品位的矿多。这就产生磷矿产地、加工地区和施肥地区之间的长途运输问题，以及针对各个矿区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技术路线问题。总的来说，为了节约运输，在现有生产普通过磷酸钙（简称普钙，含五氧化二磷百分之十八）的基础上，要求今后生产更多的高浓度磷肥，如重过磷酸钙（简称重钙，含五氧化二磷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四十八）和磷酸铵（含五氧化二磷百分之五十二至百分之五十四，并含氮百分之二十）。同时结合矿区情况，也适当地生产一些钙镁磷肥、脱氟磷肥、磷氮复合肥料等。

磷肥的生产要酸法和热法同时并举，但以何为主？要作技术经济研究。酸法主要用硫酸处理富矿，制萃取磷酸，再制重钙或磷酸铵。要研究萃取副产的磷石膏制造硫酸或硫酸铵的问题。酸法还包括研究以硝酸、盐酸等处理磷矿。热法主要是利用廉价水电，在矿区附近以电炉处理中品位磷矿制黄磷，再逐步制磷酸、重钙或磷酸铵，这可以节约中品位矿的运输量。热法还包括用高炉或电炉制钙镁磷肥，用转炉炼钢所产的钢渣磷肥和用天然气、重油、焦粉、煤粉等制造的脱氟磷肥。这些磷肥用于酸性土壤较为适宜。低品位磷矿在我国分布较广，可研究制成磷矿粉就地施用。

钾肥和微量元素化肥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空白点。钾肥应首先组织力量，从地质和石油钻探工作中，寻找地下可溶性的

钾矿。同时，开发青海含钾盐湖资源，并研究浙江、安徽等省的明矾石综合利用制造钾肥、硫酸和炼铝工业的原料氧化铝。微量元素（硼、铜、锰、铝、锌、钴等）化肥对农业生产很起作用，应研究综合利用有色金属和硼的生产过程中的废渣废气等制造微量元素化肥的技术。

3. 化肥肥效试验

化肥田间试验工作是推广化肥的先行。这对我国将要发展的新化肥品种更为重要。应及早安排典型示范试验，有些品种如重钙、磷酸钙、氯化钾等目前国内尚未生产，可先进口一批，在重点地区进行试验，找出对各种土壤、作物的施肥方法和经验规律。

二、农药

根据最近国际上的估计，全世界农作物由于虫、病、莠和鸟兽的危害，每年平均损失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但这是完全可以夺取回来的。夺回的程度，主要看人们采用的武器是否犀利，它的品种是否齐全，数量是否充足，使用配合是否恰当，以及其他综合措施等。

农药，最主要的有五大类：杀虫剂、杀菌剂、除莠剂、杀害鸟害兽剂和生长调节剂。杀虫剂占的比重一般最大，约为农药总量的百分之五十，除莠剂和杀菌剂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最后两类占的比重甚小，约为百分之一二。这不仅由于昆虫种类繁多，身体组织有巨大差别，需要较多品种来应付，较大数量去处理，而且因为昆虫能产生抗药现象，一种药不宜经常使用，必须有几种同样效用的药交替使用或者混合使用。

农药的主要发展方向如下：

1. 药剂品种多样化，有少数较大的骨干，辅以数目较多但吨位不大的其它品种。我国情况复杂，估计原药品种须有

一百到一百五十个，才能对各种需要应付裕如。

2. 发展高效低毒的农药是一个重要方向。新药和旧药相比，在效能上有重大差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保护一亩作物需要的药量常为数公斤至数十公斤，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机磷和其它高效药剂陆续出现，一公斤原药可供数十亩、数百亩甚至上千亩之用。强调低毒的必要性，是由于国际上近年来所采用的品种绝大多数是高效高毒的，推广后人畜伤亡事故非常严重，迫切需要改变，这种情况可以改变，也正在改变。

3. 发展具有内吸性的药剂为主兼及其他，如防治钻蛀性害虫、地下害虫的药剂等。内吸性药剂，是指那些与作物（包括动物）接触或者内服后散布到全身，杀死体内外的害物而自身安全无恙，并且维持药效在一定期间。这种药剂比触杀性的好得很多，因为有些虫钻到根内、果心、核中、树皮或叶子里，或者那些生长在牛的脊皮下，羊的肺部、其他牲畜禽鱼的肠胃中，普通药剂无法达到的，都可以用内吸剂杀死。内吸剂很快地被作物吸进体内，维持有效日期可以是三五天，也可以是几个月。在这期间内，新来的害物仍然被消灭，所以作物的保护就更全面了。在雨季亦避免了药物的损失和保证了防治效果。

4. 着重发展具有选择性的药剂，和适当发展广谱性和多种用途的药剂。广谱性药剂，是指一种药剂（如杀虫剂）可以杀死多种的虫，有选择性的药剂，只能杀死一类的虫甚至一种虫，而对其它的虫则没有毒害。多种用途药剂，是指既能杀虫又能杀菌，或者既能杀死害鸟害兽，又能杀虫，还能除莠等等。广谱性和多种用途，可以少生产几种药。但虫类有害虫亦有益虫，菌类当中有致病之菌和为人服务之菌，不应一概斩尽杀绝。如滴滴涕和六六六都是广谱性杀虫剂，近年来广泛使用

之后，红蜘蛛就变得十分猖獗。它们不能杀死红蜘蛛，而将红蜘蛛不少的天敌消灭掉了。在除莠和杀菌方面，广谱的危险性就更大，如果作物亦受伤害，就失去农药的意义了。

据此，农药的主要研究任务是：

1. 杀虫剂应以有机磷、有机氯（特别是高效低毒的）作为骨干，配以其他合成类型和植物来源的药剂作为辅助和补充。牲畜用药剂，过去重视不够，需要加强。并注意探索诱引剂、不育剂、增效剂等新型辅助剂。

2. 杀菌剂原有基础甚差，应积极增加国外已著成效的品种和创制新药。铜汞制剂近期还不能放弃，它们的代用品要进行研究，对内吸而又具持久性的杀菌剂和高效的保护剂（或称化学免疫剂）应努力研究。

3. 除莠剂在国内若干地区，如东北、西北、华南的热带，都有迫切需要。过去对大量六六六无毒体和焦炉煤气副产的原料，未加利用进行生产，现在又有石油炼制工业的废气残渣，扩大了多种原料的供应，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应生产若干标准品种。重点研究则应放在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和向下传导深入根系的药剂。

4. 植物刺激剂、抗生素、赤霉酸、激动素、石油废料的环烷酸衍生物，以及近来一系列人工合成的生长调节剂，可调节作物的成长（加速或延缓），改变它们的生长形态及适应环境的性能（如抗旱、耐盐碱等），改进质量，增加收率；促进家禽家畜的生产，或使多长肉、多生蛋、多泌乳。它们的出现为农药开辟了新的途径，提出了新的前景。以前农药只是植物保护的一个部分，后来逐渐成为农、林、牧、副、渔综合农业的化学保护部门，现又超越了这一领域，进入了人类控制和掌握生物生长进程的理想王国。目前虽已取得了不少的初步成

就，并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但总的说来仍然是东鳞西爪。应进一步组织植物生理、动物生理、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农、林、牧、副、渔科学工作者联合作战，深入问题的核心，取得成果。

三、农产品和副产品的化学加工与高分子化合物的应用

1. 使易腐败的物质得到保存，特别是保存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旺季来到时的大量蔬菜。

2. 将副产品和废料经过加工制成有用之材，包括将不适宜作饲料的秸秆加工改制成饲料。

3. 利用聚合物改良土壤的结构，防止养分的流失。

4. 利用高分子化合物保温、保湿、协助幼苗提前发育成长，有助于提高复种指数；应用塑料薄膜，对防止水稻烂秧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些方面，都应加强研究和推广应用。

第八章 加强农业技术经济研究

农业生产，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的实施和试验研究成果的应用，都需要研究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过程中，农业经济科学研究的任务，除了要继续加强对所有制、收入分配、消费积累、财务、成本、价格等方面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研究任务，列入社会科学规划）外，必须大力开展农业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的研究，应该为党和国家在采取和制定既有技术上的合理性，又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的各种农业措施和农业政策方面，提供有科学的经济分析和数据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农业技术经济刚刚开始，今后十年，从以下十二方面

开展研究工作：

- 一、农业生产合理配置的技术经济研究；
- 二、农业四化的技术经济研究；
- 三、农业八字宪法的技术经济研究；
- 四、粮食和棉花、油料及其他经济作物合理布局的技术经济研究；
- 五、农区和城市郊区农牧结合的技术经济研究；
- 六、牧区草原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牧农结合的技术经济研究；
- 七、山区农林牧结合的技术经济研究；
- 八、森林采伐更新的技术经济研究；
- 九、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水产养殖业的技术经济研究；
- 十、橡胶等热带特产作物的生产及热带地区开发的技术经济研究；
- 十一、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十二、典型地区、典型场、社的综合技术经济研究。

第九章 加强有关农业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一个多世纪以来，农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由于生物学等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和渗透，不断地促进和提高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水平，引起了农业生产重大的技术革新。近几十年来，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渗透，对推动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这方面的新成就很可能深刻地引起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变化。因此，我们除着重研究当前农业生产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外，

对于基础农学、生物学、地学等重要分支学科和领域（如动植物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生物统计学等）和现代物理学、化学及技术科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在农业上的应用等方面，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之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促进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的理论基础。不仅对于近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是需要的，而且对于今后开辟新的农业增产途径更为必要。

目前基础农学的许多重要分支和领域还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如农业动植物的遗传、生理、生态以及生物统计、草原学、免疫学等等。在基础较好的学科方面，如作物育种、植物保护、兽医等，目前也只是在应用技术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而在系统资料的积累，如亲本原始材料的系统研究，寄生虫、真菌、病毒等系统调查研究，还是残缺不全。基础理论工作做得更少。其他学科更为落后，如目前正在大力发展化肥，但各种化肥在不同地区、不同土类、不同作物的增产效果，也还提不出系统资料。农药农机虽有较大的进展，但目前也还停留在仿制阶段。总的说来，基础农学的底子很薄，工作开展很少，研究方法一般比较陈旧，新技术新方法的掌握运用还没有很好开始，至于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和技术科学，一方面较落后，一方面还没有很好发挥支援农业的潜力。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我们对生产中很多复杂问题的解决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在科学队伍方面，老科学家的人数就不多，更少有人能够集中精力在基础理论工作方面，同时，他们对于新技术新方法的掌握都迫切要求提高。青年科学技术人员不少人基础较差，又没有及时专业化，成长不够快。农业科学研究条件一般的较差，现代装备甚为缺乏。初步估计，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我国农业

科学在应用技术方面大体相当于四十至五十年代水平，而基础理论工作一般还要落后，只相当于三十至四十年代水平。因此必须作重大的努力，才能缩小差距，在十年内打好巩固的基础，赶上发展的需要。

第一节 加强有关农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农业动植物育种方法的革新，建立在不断地深入了解动植物遗传变异的规律上。必须开展主要农作物和牲畜家禽等遗传规律的研究，研究杂种优势的理论基础，研究细胞染色体和遗传物质基础的特性，研究农业动植物的起源和演变等问题。

二、提高栽培技术和开辟新的增产途径。应当研究作物生长发育的生理生化过程与其产量及品质的构成；作物抗旱性、抗寒性、抗盐性的适应过程和生理指标；作物与温度、光线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光合作用及其与提高产量的关系。

三、为提高土壤肥力和合理施肥提供理论依据。必须研究：土壤的结构和矿物质、腐殖质等的特性；研究土壤水分和土壤溶液的基本特性及其运动规律；土壤中主要营养元素的转化和养分供应状况；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分解与转化；作物根系代谢和矿质营养；生态条件与微生物和藻类增加土壤肥力的关系；固氮机制等。

四、为提高饲养动物的体质和生产性能，提供理论指导。必须研究：畜、禽、鱼、蚕的生长、发育、营养、消化、生殖或泌乳等作用的生理生化过程；生态特性；合理配制饲料和利用饲料补充剂（包括激素、维生素、抗菌素等）的理论依据。

五、为提高病虫杂草防治水平和农药的创制与合理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必须研究：主要植物病原物的分类、生理、遗传变异和寄主的免疫机制；主要害虫和啮齿动物的生理生态和种群变化规律；杀虫、杀菌、杀草剂和抗菌素的作用机制、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农药的内吸机制，害虫的抗药性。

六、为提高饲养动物医疗技术提供科学依据。必须研究：畜、禽、蚕、鱼主要病原物的生物学特性，遗传变异和寄主的免疫机制，主要寄生虫的形状和分类；有效化学药物和抗菌素对防治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作用机制。

七、为提高植树造林和森林经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必须研究：森林土壤及土壤微生物；森林与水文、气象的相互关系；树木的生长发育和环境条件的关系；树木遗传；木材构造及木材性质等基础理论。

八、为了深入地地了解我国自然条件和土壤、生物资源，必须进行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积累更多的基本资料。调查研究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分类区系；寻找新的有用的野生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种类；调查研究植被的类型、分布和分区评价；调查研究土壤的类型、分布和分区评价；加强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农业气象学等学科的研究。

第二节 大力研究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一、研究掌握新的育种方法和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包括利用植物雄性不孕培育杂交种，利用染色体转位的方法培育新品种，利用辐射引变创造新品种等等。研究赤霉素和光敏感色素等对植物的刺激控制作用；研究各种选择性的化学除莠剂的作用机制和应用范围；研究改良土壤物理结构的塑料土壤改良剂；研究防止水面蒸发的聚合物；研究农业动植物及其产品保

护和保鲜、保藏用的新的化学药物和抗菌素，以及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防治害虫的方法等等。

二、大力开展新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的研究。研究同位素、超声波、红外线、电子技术、水声学技术等农业上的应用。包括刺激农业动植物生长，粮食及其他产品的贮藏，应用放射性同位素研究水域生产力，利用电子技术、水声学技术进行捕捞等等；研究应用物理原理和电子技术，为测量农业动植物生理过程和生长环境提供简易的和精密的仪器和测量方法，包括各种观测仪和自动记录仪等等；应用雷达等新技术，探索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的途径；研究高度人工控制下作物生长发育的理论和技術。

第十章 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与研究中心的建立

为了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力争农业早日过关，并奠定亿万人民吃、穿、用的百年大计，必须由国家直接抓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集中力量，做出成绩，以便推广应用。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主要是：（1）探寻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与措施，充分发挥商品粮集中产区的增产潜力；（2）克服限制农业发展的因素，大幅度提高产量，例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处中原，是对全国农业过关举足轻重的地区，但水土流失，旱、涝、盐碱危害，生产水平低的局面，长期以来未获解决，必须尽一切可能迅速扭转，使农业产量提高，使世世代代免受其害；（3）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充分利用我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例如，草原、森林、山地、热带、江湖海洋的合理利用。这些地区如果利用得当，可以促进农业早日过关，大大增加吃、穿、用的物质财富；反之，违反

自然规律，不仅当前生产遭到破坏，而贻患无穷。

针对这些问题，解放以来，也曾进行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尚未根本解决。问题在于过去工作常常是各县区、各部门、各学科单独进行，力量既不集中，认识又不一致，甚至彼此牵制，相互矛盾。而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应该从一个区域的整体着眼，依靠多种学科共同研究，通盘筹划才能完善解决。因此，必须由国家统一领导，组织各有关学科的科学家，并建立专业科学技术队伍，通过综合的考察、研究、定位试验和典型示范等工作，切实做出成绩，以便国家根据科学成果拟定发展生产和改造自然的全面规划，逐年推行，按期完成，以便在一定时期内根本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从科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这也是一条把科学家最适当地组织起来，最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和推动农业科学发展的正确途径。

根据上述精神，十年内应该进行以下十个方面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综合研究，并分别建立研究中心：

一、建立现代化农业试验基地

首先在北京郊区建立现代化农业试验基地，并建设相当规模的人工气候室，把生物科学、物理学、化学、力学、电机、机械、水利、土壤等科学的成就，充分应用，来一个高度现代化农业生产。通过这个试验基地来创造我国自然条件下的农业现代化措施，找出农业现代化的技术途径。这主要利用北京各部门比较充裕的科技力量与现有试验研究基础来筹办。

二、建立高产的试验中心

为我国高产地区树立旗帜，指示方向，以太湖流域选点较为适当。应组织江苏以及上海、杭州的科学研究力量组成这一研究试验中心。

三、充分发挥商品粮集中产区的增产潜力

松辽平原、四川盆地与珠江三角洲向来是商品粮的集中产地，近年来产量虽有减少，但潜力仍然很大。松辽平原不少国营农场已有十多年机械化垦殖的丰富经验，应进一步发挥机械化的综合作用，提高生产率，并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大力克服春旱秋涝，土壤肥力降低等不利因素，逐步提高单产，有条件地区还可继续开垦，扩大耕地。四川盆地与珠江三角洲，气候优越，土壤肥沃，提高单产潜力巨大。应迅速实现适合当地特点的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改革，充分利用与培养地力。为此，应在上述三个地区选定一二个农场，集中当地科学技术力量，做出样板，逐步推广。

四、综合治理黄淮海平原的旱、涝、盐碱灾害

黄淮海平原目前虽受旱、涝、盐碱威胁，农业单产水平不高，但灾害一经根治，农业生产必将大幅度增长。由于平原耕地辽阔，人口密集，这个地区粮食、棉花生产的发展必然对全国农业过关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造平原的自然面貌，事关六个省市，必须由国家统筹安排，远近兼顾，从整个区域全面改造出发，从旱、涝、盐碱根本治理着眼，拟出整体改造规划，采用根本性的治理措施，修建永久性的灌溉工程。并先在黄河下游灾害威胁最重的地区，建立试验基地，首先组织京津地区及冀鲁豫三省的科学技术力量进行综合试验研究，并应尽早在该地区建成科学研究中心。

五、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问题是根治黄河和发展陕、甘、晋、内蒙古南部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这个地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恢复坡地植被，结合工程措施增加保持水土的能力，并总体规划农、林、牧业的综合发展。这一问题涉及本区国民经济的安排，必须首先研究，做出结论。为了全面推行水土保持措施，

应从现有一条沟，一个村的试验研究，扩大到以县或专区为单位，较大范围的典型试验规划。在陕西武功建立研究中心，由国家给予大力支援，在黄土丘陵区进行大面积的示范试验。

六、草原的改良与利用

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增加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为大家所公认。而发展畜牧业应该充分利用我国北部与西部的牧区，这里草场广阔，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发展牧业大有可为。因此，应集中力量，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充分利用与改良草场，以提高载畜量。同时，逐步建立人工饲料基地，发展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促进草原畜牧业的科学经营。目前内蒙已决定以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为基地进行重点试验研究，应进一步调动国内各有关方面科学研究力量予以加强充实。

七、亚热带山地、丘陵的综合利用

我国广阔的亚热带山地、丘陵，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植被生长迅速，是山地综合利用的重点。但如不合理的开发，不仅不能发挥自然潜力，反而会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威胁邻近地区及广大河湖平原的肥沃农田。因此，应通过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因地制宜地拟定山地、丘陵合理利用规划，以便逐步实施。只要利用得当，几年之后便可见效。应首先在江西建立试验基地，建成研究中心，打下基础，再在南方其它各省开展工作。

八、热带资源的综合开发

我国热带地区资源富饶，是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唯一产区。但面积狭小，应当十分珍惜。这个地区的开发利用，必须由国家统一掌握，全面规划，合理经营。在优先发展橡胶的前提下，结合南亚热带山地丘陵的综合利用，因地制宜地配置其

它作物和农林牧业，使之各得其所，相互促进，以加速橡胶等热带作物的发展。应以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为基地，组织国内有关科学技术力量，进行综合研究。

九、合理利用现有森林资源与有计划地建立新的森林资源基地

为了根本扭转由于森林资源不足、分布不均所造成的少林地区四料俱缺、沙区风沙为害和山区水土流失的局面，必须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多、快、好、省地营造用材林、木本粮油林、特种经济林和各种防护林，研究其规划布局以及树种选择、选育良种和速生丰产培育技术，以迅速扩大森林资源。对现有林（包括原始林及次生林）和新造幼林，应加强保护及扶育技术的研究，以减少林木损失，大幅度地提高森林生长率。同时还应积极研究提高营林及森工各项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为此，应在东北建立以现有林为对象，以研究森林资源合理利用和森林采伐、更新和扶育技术为主的试验基地；在长江流域、亚热带地区，建立提高人工林的经营和造林技术为主的试验基地，利用南方优越自然条件，迅速扩大森林资源。

同时，应结合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草原改良试验、黄淮平原防治旱、涝、碱的试验以及开发热带、南亚热带的综合研究试验，积极进行各该地区造林的研究试验，并在有关的研究试验基地附近，建立必要的林业研究试验基地。

十、水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为了迅速增加水产产量，必须抓住增产的关键问题，首先应当进一步调查资源，以东海、南海为重点，探索新渔场，并为发展远洋渔业奠定基础；同时着重进行有关扩大养殖水面和增加养殖种类的研究。

以上十个方面，是保证农业过关必须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

问题，有的目前已有基础，有的正在酝酿，可分期分批进行。

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实现，建议按照这十个问题分期分批地组织几支由国家综合主管部门领导，以某几门学科为主的科学队伍。这些科学队伍的作用应该是：

1. 统一制定综合研究计划。
2. 组织各学科的科学力量围绕中心问题进行研究，根据需要组织综合考察、典型试验、定期观测、地区规划等等。
3. 建立现代化综合试验基地，既是试验研究场所，又是大面积生产示范的样板。
4. 逐步建成学术中心，进行重大的基本理论研究。
5. 根据科学成果，拟定改造的整体规划，提请国家决定后，逐年实施。至于有关增产的技术措施，可及时提供生产部门参考推行。

这些科学队伍的组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1. 特邀科学家。由国家综合主管部门从科学家中委任一批学术委员，组成学术委员会，负责科学队伍的学术领导工作。
2. 协作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
3. 基本的科学技术与工程施工队伍。科学家可以从基本科学队伍中，选拔一些优秀干部做为长期的助手。

这些科学队伍的仪器装备、基建设备、经费预算、人员编制等由国家综合主管部门直接拨给。

参加起草本纲要的科学家：

丁 颖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竺可桢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 刘春安 广西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朱济凡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所长
朱树屏 水产部海洋水产研究所所长
过兴先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
何 康 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
沈其益 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吕 炯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金善宝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郑万钧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季 良 河北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罗 新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副主任
赵九章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俞启葆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
张含英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马溶之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所长
陶鼎来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唐 川 吉林农业科学院院长
陈凌风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所长
席承藩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顾复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院长
陆钦侃 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
康 迪 西北农学院副院长
曾德超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制造系主任
杨石先 南开大学校长
杨允奎 四川农学院院长、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鲍国宝 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谢为杰 化工部生产司副司长

戴松恩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附件《关于六个专题的工作方案和建议》（即《山地利用与水土保持问题工作方案》、《关于发展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开发我国热带南亚热带地区几个问题的建议》、《草原利用问题工作方案》、《土壤盐碱化防治工作方案》、《海滨、湖滨、河滩地利用问题工作方案》、《对我国沙漠改造利用的意见》），《人口·营养·农业》，《关于二十至二十五年农业技术改革的远景设想》，《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見》，《关于我国今后二十年氮、磷、钾化肥发展比例的意见》，本书从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

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现在将这个纪要发给你们研究执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接到会议纪要之后，应当组织有关方面认真加以讨论，并提出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于今年年底以前报告中央和国务院。

全国大中城市是现代工业的基地，也是商业和文化教育等事业最集中的地方。只有认真地做好城市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继续努力做好农村工作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不断改进工作，把城市管理好，充分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要定期讨论大中城市的工作；大中城市较多的省、自治区，每年应当至少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系统地研究和解决城市工作中的问题。

在大中城市建设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这次会议议定拨给各大中城市自己支配使用的经费，数量是不小的，各大中城市必须精打细

算，节约开支，使用得当，充分发挥这些资金的作用。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对于这次城市工作会议上议定的若干事项，要及早做出具体安排；需要修改的规章制度，应当迅速加以修订，或者重新拟定，经过批准手续下达，以利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到十月十二日，召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现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意见，纪要如下：

一、当前形势和主要任务

从一九六二年九月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城市的工业生产稳步上升，支援农业的工作继续加强，市场景况日趋繁荣，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城乡关系逐步协调，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已经开始被打下去，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前城市的形势，同农村的形势一样，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地提出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全会以后，各城市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全会公报的精神，对职工群众广泛地进行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各城市都按照规定的步骤，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五月，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工作的进行，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

经过这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抗拒改造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活动，组织“黑厂”、“黑店”、“黑队”和放高利贷的活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以及地富反坏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受到有力的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观点，更加明确了，革命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大为高涨。社会风尚有了显著进步，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很多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地密切起来。所有这些，极其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极其有利于我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的好形势，由于工业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由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业出现了新的气象。今年前九个月，全国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二。支援农业、供应市场和国防需要的产品，都有较多的增长。大部分主要产品的质量，继续提高。产品的品种、规格，不断增加。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有所降低。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二十八。今年一月到八月，成本比去年降低百分之九点二。亏损大大减少。预计今年全国工业企业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包括税金），将有可能比原定计划增加三十亿元，达到一百二十亿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九。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商品货源不断扩大，特别是蔬菜、水果、副食品的上市量显著增加，城乡物资交流日趋活跃。今年九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六点一；其中，平价商品价格下降百分之一点一，高价商品价格下降百分之四十五点二，集市贸易价格下降百分之四十。

居民储蓄有所增加。货币继续有所回笼。由于商品增多，物价下落，城市人民吃的、用的都有改善，体质普遍增强。

城市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市政建设等项事业，也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当前城市的好形势，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

形势越好，越应当戒骄戒躁，越应当注意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兢兢业业，抓紧工作，做好工作。去年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许多已经解决或者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有的还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

现在，“五反”运动，特别是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还没有全面展开，整个运动远没有取得全胜。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也有早有迟，有好有差，浪费还相当多，潜力还相当大。工业的调整还没有完成，工业要完全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须要继续做许多工作。粮、油、布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仍然很不足。市政建设，还落后于生产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太高，城市人口还是过多，需要安置就学、就业的人，逐年增加。在城市管理上，如何贯彻执行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心关键，是把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扎扎实实地搞好，也就是说，把阶级斗争搞好，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搞好。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

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 and 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个非常重要的指示，是指导我们全部工作的总的纲领。

所有城市，都要把“五反”运动深入地开展起来。要继续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分批分期，搞深搞透，边整边改，讲求实效。整个“五反”运动，要力争在明年以内，获得全胜。在运动中，要注意划清政策界限，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自始至终地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重新教育人。通过回忆对比，激发广大职工的阶级感情，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这个基础上，整顿和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资本主义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并且争取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逐步改造成成为新人。同时，要坚决地克服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影响，克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要使广大干部不断改进作风，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并且要健全各级领导核心，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所有城市，都要继续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增加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妥善安排劳力，协调比例关系，继续进行调整，奠定发展基础。在运动中，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都应当大力提倡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广泛开展“五好”企业、“五好”职工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动工业、交通、商业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要积极增产国家需要的产品，尤其是支援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产品，市场急需的产品，为国防服务的产品。要加强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要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节约物资消耗，减少流通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

本。一切工业产品，都应当力求物美价廉，精巧耐用。所有企业，都要向先进水平看齐，凡是实际技术经济指标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都要力争在明年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应当向国内最先进的水平努力；已经是国内最先进水平的，应当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各城市郊区的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都要努力增加农业、副业生产，为城市提供更多的蔬菜和其他副食品。

工业生产，始终是城市工作的中心。商业、市政建设、文教卫生、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只有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相应地逐步得到解决；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反过来也必将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

中央已经决定，从今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会议认为，今明两年是这一过渡阶段最重要的时期。各城市的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必须抓紧时机，切实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努力做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努力做好城市的各项工作，为争取“五反”运动的全胜而斗争，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和明年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而斗争，为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涨而斗争！

二、进一步做好工业的调整工作

工业的调整，总的来说，应当适应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和加强国防的需要，适应加强基础工业和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

使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的协调，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围绕着这个总的要求，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城市工业调整工作中的以下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地确定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和协作关系。

经过两年多来的调整工作，大部分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已经大体确定，一部分企业的协作关系，也已经固定下来。但是，还有一部分企业，主要是机械工业企业和轻工业、化学工业企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没有确定；也有少数企业保留得不恰当，或者关并得不恰当；不少企业的协作关系，还没有确定。应当在三年调整期间，把所有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确定下来，把企业的协作关系基本上固定下来。

在确定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各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工业的合理布局，实行统一规划，全面安排。这项工作，要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拟定各个城市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进行。

企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的确定，要遵守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的原则。在适当发展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合理、照顾全局的要求，组织好大、中、小型企业的协作，组织好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的协作。主要的备品、配件要固定生产、供应关系；原料、材料、燃料要尽可能就地、就近定点供应和综合利用。

确定企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的工作，按行业、按产品归口，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凡是主要生产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和部管产品的企业，由中央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提出调整方案，其余的由地方负责，中央各工业主管部门予以协助。对于

那些机械工业、轻工业、化学工业企业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城市，应当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工作组，协助大区和省、市计委、经委进行这一工作。

（二）继续加强设备和厂房的维修工作。

力争在三年调整期间，经过统一规划，把应当修复的绝大部分失修的设备 and 厂房修理好，并且建立起一套保证设备、厂房经常完好的维修制度。

进一步加强设备修理力量。各个城市应当不拘行业界限，对设备修理力量，进行统一安排和合理调剂。大型的、精密的设备的修理，由中央机械工业部门，统一加以安排。

为了加强厂房、设备的维修，应当适应提高工业企业大修理基金提存率，由目前全国平均的百分之一一点八五，提高到百分之二点二左右。企业的主管部门可以按隶属关系，把某些企业暂时积存的大修理费，借给维修费用不足的企业使用，以后由使用单位，从自己的大修理基金中逐年偿还。

（三）逐步充实生产技术后方。

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变目前大部分企业生产技术后方力量薄弱的状况。各个城市应当统一组织地区性的，主要是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计量、检验、化验中心和工卡模具的专业制造力量。大型企业的生产技术后方，有余力的，应当积极地为中小型企业服务。

（四）充分发挥老企业的作用，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充分发挥老企业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挖掘老企业、老设备现有的生产潜力，另一方面，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老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必须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

况出发，根据财力、设备、材料和技术力量的可能，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进行。凡是能够将就使用的设备和厂房，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不要过早地更新、翻修或者改建。目前，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应当先在生产国家迫切需要的产品的企业进行；对于那些应当逐步淘汰而不宜于改造的企业，就不要进行。确定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企业，要把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更新确实无法修复使用的设备，翻修和改建严重威胁生产安全的厂房；（2）改造那些严重妨碍产品质量提高和品种增加的关键设备；（3）解决迫切需要的劳动保护措施；（4）改进严重落后的生产加工工艺。

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需要的资金，要积极地加以解决。企业在采取技术措施的时候，结合进行的一些必要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所需要的费用，可以在技术措施费中开支。某些设备的修理费用，如果相当于或者超过购买新设备的费用，也可以用大修理费购置新设备。

今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需要的资金，应当在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单独列出。

厂房和设备维修、更新需要的材料、设备，应当在国家的物资分配计划中单独列出，保证供应。

（五）很好地发挥新企业的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新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

在充分发挥老企业作用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新企业的作用。那些担负重要生产任务的新企业所必需的填平补齐工作，应当抓紧进行。这项工作，要根据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批准的工业调整方案的要求，纳入国家的基本建设计划，按照基本建设的程序办事。所有新企业，都要努力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迅速地把新技术、新设备熟练地掌握起来。新老企业之

间，应当加强全面协作，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六）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根据当前生产的需要和发展新技术的要求，有重点地充实和加强产品设计和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组织企业的技术力量，积极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广泛组织企业之间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在生产技术工作中的协作，并且有计划地组织企业、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之间，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的协作。

（七）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

所有企业，都应当根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要求，针对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建立起良好的生产秩序和管理秩序。当前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应当放在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

三、努力做好商业工作，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当前市场情况是好的。若干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显著增加，供应情况有了改善。但是，粮食、棉布、食油等主要商品还很不足。应当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改善供应，争取市场情况的进一步好转。

城市商业工作，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要求出发，继续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要努力做好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努力做好城市供应工作，努力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和出口进口工作，千方百计地支援农业，支援工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计划用粮、节约粮食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各个城市，都要继续坚持执行这个方针，既要保证必不可少的需要，又要使销量不突破计划指标。必须继续严格控制粮食销量，防止和杜绝浪费粮食的现象。绝不能因为农业情况有所好转而放松粮食的管理。

应当根据市场的需要，把商业部门的收购计划和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很好地衔接起来，不但要衔接产量计划，而且要衔接品种、规格、质量、花色计划。工商部门要紧密协作，做到商品对路，适用适销。工业部门要努力降低产品成本，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许出厂。商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产品，要按照国家计划和购销合同，积极收购，积极推销，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要坚持按质论价的原则，好货好价，次货次价，要避免收购无法销售的产品，给国家造成损失。工业部门有亏损的产品，需要补贴的，由国家财政按照批准的计划给以补贴，不采取由商业部门补贴的办法。有些手工业品，习惯上由商业部门补贴，今后又确实需要补贴的，可以继续由商业部门补贴。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应当互相支援，互相监督。某些争议问题，首先由有关工商企业直接协商解决。同时，各市党委、人民委员会和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召集工商协作会议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解决工商企业之间不能直接解决的重要问题。

会议认为，在商业工作中必须坚决克服环节过多、机构重叠、迂回运输、商品倒流，以及地区之间互相封锁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一定要按照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保证全国市场的统一性。不按商品流转的客观规律办事，保持不必要的机构，增加不必要的环节，这是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表现，必须坚决纠正。

一年多来，商业的经营管理有所改善，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要结合“五反”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提高服务质量，做好人民生活用品的供应工作，做好劳动保护用品的供应工作。要在正确执行方针、政策的条件下，切实加强经济核算，加强资金管理，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改进商品的保管维护工作，减少霉烂损失，从各方面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增加赢利，扭转亏损。要力争做到肉、禽、蛋和蔬菜不赔钱。不少城市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验，例如，南京市和无锡市，经过江苏省批准，在保证完成出口任务的前提下，由市的食品公司，同附近的若干县的食品收购单位，直接挂钩，实行猪、禽、蛋直接调拨、直接进城的办法，效果很好，是值得推广的。商业部门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掌握商品流通规律，加强商品流通的计划性，使商业干部真正精通业务，学会做生意的本领。

要把城市的代替私商、改造私商、取缔投机倒把、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工作，进行到底。对郊区的农村集市贸易，要实行严格管理，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认真执行中央关于继续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政策。凡是中央已经决定降价或者决定提价的，必须按照中央规定的调整幅度和调整时间严格执行。属于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在调整的时候，也必须慎重从事，不仅要考虑到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而且要考虑到生产的发展和建设资金的积累，避免盲目降价和盲目提价。

城市商业网点，应当根据城市工业布局和居民的分布状况，合理设置。设置得不合理的，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网点过少的，要适当增设。商业、服务业必要的营业场所、商品仓库和职工宿舍，要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

各地应当通过“五反”运动，分批分期地继续整顿和加强商业队伍。淘汰一批不适合做商业工作的人，培养和补充“接班人”。积极对新老从业人员进行政治、业务的教育和训练工作。特别是要有计划地给基层企业调配、选拔一批领导骨干，在一两年内，把所有基层企业的领导核心都健全起来。

这次会议上，在商业体制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复杂，建议主管部门在会后加以研究。

商业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城市的党委和人民委员会，一定要抓好商业工作，把商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讨论、经常检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商业工作中正确地贯彻执行。

四、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业生产

积极发展郊区农业生产，建立稳定高产的蔬菜和猪、禽、蛋、奶、水果等主要副食品生产基地，是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安排好城市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措施。北京、上海、衡阳等大、中城市的郊区，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们的经验证明，只要认真抓紧做好，把郊区农业生产放到应有的地位，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郊区是能够成为城市一个可靠的副食品供应基地的。

城市的郊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很多，潜力也不小。根据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调查，郊区有耕地四千六百多万亩，郊区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农业“四化”的水平和支援农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都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城市主副食品加工的下脚料、糠、麸、糟、渣等等，就是郊区发展猪、禽的良好饲料。城市的粪便、污水和垃圾等，是很好的肥料来

源。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例如，根据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材料推算，一年排泄的污水，含氮量大体相当于五十万吨硫酸，而目前只利用了百分之十四。郊区农业生产的水平还不高。蔬菜的亩产量，在同一地区的各城市郊区之间很不平衡。猪、禽、蛋等副食品的供应量还不多。粮食亩产量一般比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还差的远。

城市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加强对郊区农业生产的领导，在做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利用城乡资源，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蔬菜和猪、禽、蛋等主要副食品的生产，并且尽可能地提高郊区农民粮食的自给程度。郊区的农业生产，应当在提高农作物的亩产量方面起带头作用，先一步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亩产量的指标。城市应当有计划地从各方面，特别是从技术装备和技术力量方面，支援农业生产，尽可能使郊区先一步实现农业的“四化”，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副食品生产基地，更好地为城市服务。

五、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 维修，逐步进行填平补齐

去年城市工作会议以后，许多城市加强了市政设施的维修和管理工作，市政设施的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过去几年“欠账”过多，市政建设不能适应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住宅、中小学校舍以及其他市政设施破漏、不足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城市的废水、废气、废渣，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用较长的时间，并且要适当照顾城乡关系，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

精神，采取较低的标准。在最近两三年内，应当以加强现有设施的维修和经营管理为主，根据可能条件，有计划地有重点地进行补缺配套、填平补齐。

为了进一步地加强住宅、中小学校舍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必须确定和增辟经常的、固定的资金来源；同时，也要适当地增拨一些城市维修和建设费用。会议议定，采取以下的措施：（1）房地产税划归市财政的规定，今年已有六十六个大、中城市实行，明年扩大到全国所有设市的城市实行；（2）把公用事业大修理基金的提取率，由今年全国平均的百分之二点四，提高到百分之三；（3）公用事业附加税，某些城市，开征项目过少，可以增开一些项目；个别项目附加率过低的，可以适当提高。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另行规定；（4）贯彻实行“以租养房”的原则，调整住宅的租金标准，在有条件的城市，试行机关、学校等公用房屋收租的办法；（5）城市在完成国家规定的地方预算收入任务以后，对于超收的部分，除按原定的收入分成比例提成以外，再增加提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6）为了解决某些城市房屋、市政设施的维护和防洪供水、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迫切需要，经有关方面批准，这次会议还安排了七千二百万元的城市建设费用。以上各项资金，均应当规定使用范围，由市掌握，专款专用。

对于市政设施补缺配套、填平补齐的大中型项目，应当在国家年度的或者长期的基本建设计划中，加以安排。过去几年，在基本建设投资当中，市政建设的投资，特别是建设住宅和中小学校舍的投资，占的比重低了，今后要适当地加以调整。

今后新建、扩建的企业、事业单位，在编制设计任务书的时候，就要把住宅、校舍以及生活服务和有关的市政设施，包

括进去。

各个城市对于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和合理利用，应当经过调查研究，订出具体规划，由国家计委同有关部门，有重点地分期分批地安排解决。新建的工业企业，在工厂设计和建设中，就要解决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和利用问题。

住宅、中小学校舍和其他市政设施维修和建设所需要的材料、设备，应当列入国家的物资分配计划，由物资部门按计划供应；维修所需要的建筑施工力量，在劳动计划以内，适当调整。

市政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利用现有设施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目前，不少单位的经营管理工作，漏洞很多，浪费很大，有的还有亏损，必须切实改进。

城市的公有住宅、中小学校舍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房屋，应当逐步由市人民委员会统一经营管理。第一步，可以先把市属的公用房屋，由市人民委员会统一经营管理起来，统一规章制度，统一租金标准，统一调剂和分配，统一组织维修，统一建设。考虑到房屋统一经营管理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经过试点，逐步推广。目前，城市公有房屋，不少是由使用单位分散经营管理的，这些单位，应当执行市人民委员会有关房屋管理的规定，并且在房屋管理的业务上接受市房产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所有城市都要继续抓紧进行房屋调剂的工作，尽可能调剂出一些房屋改作中小学校舍。

城市私有房屋的管理，亟须改进。应当督促房主维修房屋。在已经进行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要认真处理改造工作中遗留的问题。改造起点定得不合理的，应当加以调整。对于改造起点以下的小量出租房屋，可以宣布属于个人所有，

允许出租和买卖，以调动房主维修房屋的积极性。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建设，各大、中城市，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编制城市的近期建设规划，并且修改现有的总体规划。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時候，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防止和克服把城市规模搞得过大、占地过多、建设标准定得过高、不合勤俭建国方针的偏向。

六、积极开展计划生育

我国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出生率过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九六二年，城市人口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六，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已经达到千分之二十二点七，估计全年可能达到千分之四十左右。城市人口出生率过高，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不利的。积极开展计划生育，降低人口的出生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化；有利于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减轻农业的负担，和缓城市的生活供应以及住宅、校舍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紧张状况；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积累和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有利于职工的生产、工作、生活和学习；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第二代的教养。

城市的文化、医疗水平比较高，物资设备条件也比较好，在计划生育方面，有可能比农村做出更大的成绩。会议认为，所有城市都应当努力降低人口出生率，争取在三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在第三个五

年计划期间，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降到千分之十以下。

为了实现上述要求，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一，一年抓几次。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二）在全国形成一个计划生育的群众运动。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把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讲深讲透，使计划生育成为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切忌一哄而起，发生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的偏向。党员、团员，特别是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加强经常工作，使计划生育长期坚持下去。

（三）加强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各级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都应当迅速建立和切实加强避孕指导门诊，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承担节育和结扎手术，并且保证手术的质量，严防发生事故。卫生部门应当会同科学研究部门和医药院校，努力研究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的避孕方法，经过试验取得可靠的效果以后，积极加以推广。

（四）有关部门要积极安排节育药品、用具和器械的生产，保证原料、材料的供应。产品要力求质量好，规格全，价钱便宜。

（五）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规定，凡是不利于计划生育的，应当由有关部门适当修改。今后，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且给以短期休养时间，工资照发。居民做节育和结扎手术的费用，可以酌情减免。

(六)大力提倡晚婚。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工会、妇联、共青团,都应当在未婚男女青年中,加强晚婚的教育。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于限制早婚应当做出全国统一的规定。

七、妥善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

全国大中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截至今年六月底止,有一百一十二万人,预计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一年,还要新增加一百二十八万人。这些劳动力必须妥善地加以安置。

当前,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下乡上山的主要办法,是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根据浙江省嘉兴专区、杭州市、辽宁省开原县和上海市、重庆市的经验,只要对下乡上山人员,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且取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公社的切实支持和帮助,城乡两头做好工作,共同负责到底,下乡上山人员就能够在农村安家立业,长期巩固下来。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除了绝大多数用下乡插队的办法安置以外,国营农、林、牧、渔场也要积极加以安置。城市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自办的农场,经过批准停办的,应当交给当地政府或者农垦部门,作为安置城市下乡上山人员的场所。

对于城市中不能下乡上山的人员,应当尽可能地组织他们参加工业生产、城市建设、商业和服务业等方面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在严格执行劳动工资计划的条件下,某些临时的、零散的工作,可以使用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这些人员可以不计算在职工人数以内。具体办法,由国家计委、劳动部规定。

城市需要的壮工，应当在城市中招收。考虑到城市需要就业的人员中，有些人暂时不能胜任较重的体力劳动，不能顶壮劳动力使用，企业、事业单位在需要壮工的时候，可以给较低的工资使用他们做临时工。对于使用这类临时工的单位，可以不控制临时工的人数，只控制临时工的工资总额。

考虑到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中，妇女占的比重很大，凡是可以用男工、也可以用女工的工作，应当尽量用女工。今后使用女工较多的单位，可以设置适当比例的预备工。各行业使用女工的比例，以及预备工的比例，由劳动部协同各部门、各地区研究确定。

为了便于安排应当退休、退職的老、弱、残职工，为了便于安置城市新成长的劳动力，今后退休、退職职工由子女顶替的条件，要适当放宽。凡是应当退休、退職的老、弱、残职工，可以在定员人数以内，由他们家居城市的、身体健康的子女或者其他赡养亲属，顶替工作。矿山井下工人，林业采伐工人，盐场工人，以及能够回乡居住的职工，在退休、退職以后，他们家居农村的子女或者其他赡养亲属，也可以顶替工作。

继续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一般不要从农村招工。来自农村的职工及其家属，凡是能够回乡的，应当继续动员他们回乡。居住在农村的职工家属，应当说服他们不要迁入城市，同时，在户口管理上，严格加以限制。要坚持实行多从城市合格青年中征兵的办法，这些军人复员以后，尽量安置在农村。家住在城市的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的分子，应当尽可能把他们安置在劳动改造场所，参加生产劳动。

八、试办职业教育

为了使城市的青年在劳动就业以前，受到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除了继续办好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以外，各个城市还需要积极试办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应当主要面向农村，积极培养为农业服务的农艺、林业、畜牧、渔业、农机、医药卫生、会计、统计、供销等方面的人材，为城市青年学生下乡上山创造条件。同时，要有计划地为工业、交通、财贸和其他行业培养劳动和技术后备力量，以解决某些行业“后继无人”的问题。办学形式，应当灵活多样，长期培养和短期训练同时并举，可以办全日的，也可以办半日的，或者办半工半读的。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业务部门，根据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举办职业教育，进行统筹安排，并且纳入教育事业计划。

目前，有些城市，普通初级中学办得过多，职业学校办得很少，可以适当调整出一部分普通初级中学，逐步改为职业学校，或者加设职业教育班。具体调整计划，由各市提出，经省汇总审查，报中央教育部批准。

有条件的城市，应当继续积极举办夜校、广播、电视、函授教育，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吸收城市中未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在职职工和农村青年参加学习。教学内容，除了讲授一般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外，应当增加职业教育的内容。

普通高中、初中和高小，应当分别增设生产知识课和生产常识课，使学生学习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同时，要对教学、课外活动和校内外劳动，全面安排，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

种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可以在校内劳动；可以到附近的工厂、商店或者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一些辅助性的劳动；也可以到附近的街道，参加清扫、绿化和其它服务性劳动。工业、交通、农业、商业、城市建设等部门和街道组织，要协同中、小学校，对于学生参加劳动，进行妥善安排。

九、加强城市的管理工作

我们的城市，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面向农村的、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城市。它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重要阵地。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使城市工作更好地为工业生产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村人民生活服务，各城市的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地加强城市工业、交通、商业、郊区农业、文化教育、市政建设和生活服务事业等方面工作的领导，逐步做到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同时，要不断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

在工业管理方面，目前大中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一般都存在中央直属、省属和市属三种不同的隶属关系。而且财贸、文教、卫生、公安等非工业部门，也管理一部分工业企业。这种多级、多头的管理办法，不利于工业企业实行生产专业化和协作，不利于人力、物力的统一调度和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

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工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业管理，主要的提出了两种改进办法。一种是：大中城市的工业企业，除了中央直属企业以外，一般都交给市管理。另一种是：

凡是生产国家统一分配产品和部管产品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不论企业的大小，全部改为中央直属企业，按行业组织专业公司，分属中央有关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其余的工业企业，由市管理。

会议认为，实行上述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少机构和层次，克服多级、多头管理现象，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的领导，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前一种办法，有的省、市已经实行多年，效果较好。实行这种办法，并不削弱省对工业的领导，省级领导机关不但要管理大中城市以外的矿山和其他工业企业，而且对全省的地方工业，在计划安排、综合平衡、组织协作、技术指导、交流经验、督促检查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在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上，也变动较小。因此，建议各中央局商同各省、区，在大区范围内，选定几个具备条件的城市，明年先行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逐步推行。后一种办法，对于发展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密切大、中、小企业的结合，可能更有利一些，但是，现在还没有经验，而且牵涉方面很多，在管理体制上变动很大，目前不宜在较多城市推行，建议中央在全国先选择一两个城市进行试点。

至于非工业部门所管的工业企业，除了同本部门的业务分不开的、经济上又比较合理的以外，其余的，原则上都应当逐步移交给工业部门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同有关部门加以规定。

目前，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自办的普通中学、小学、托儿所以及其他服务性事业，除了工厂生产区内的哺乳室、浴室、食堂、俱乐部、保健室等生活福利设施，仍由企业自办以外，其余的都应当逐步移交给市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在步骤上，条件成熟的先移交，条件还不成熟的，

可以先进行试点，创造条件，逐步移交。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在把这些服务事业移交给市管理的时候，房屋、设备、人员编制等应当同时移交，这些事业所需要的费用，仍然由原单位照旧拨付。市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接管以后，应当在不增加职工负担的原则下，把这些事业认真办好，提高工作质量，使这些事业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为职工生活服务。北京市正在石景山地区建立相当于区一级政权的办事处，对于区内各工厂的生活福利事业，试行统一管理。这种做法，在其他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试行。

今后，在大中城市新建和扩建的企业、事业单位，要把住宅、校舍以及其他生活服务和有关市政设施方面的投资，拨交所在城市，实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或者在统一规划下，实行分建统管。

为了便于各城市机动地解决一些急迫的问题，会议议定，分配给各城市的预备费，由各市自行支配使用，可以不报上级审批；各城市上年财政的结余，在上级批准动用的限额以内，可以自行安排使用，不必逐项报请上级机关审批。至于当年预算超收分成的部分，应当等到下半年确实有超收把握的时候，再安排使用。安排的比例，一般不要超过全年预计超收分成数的百分之五十。

鉴于明年拨给城市的维修建设等各项费用，比今年增长较多，会议要求各城市在使用这些资金的时候，都必须精打细算，控制使用，只能用在有利于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急需方面，不准用来盖“楼、堂、馆、所”和高级住宅，也不准用于与城市维护、城市建设无关的其他项目。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天津、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六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物资调拨、主要

商品分配、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财政预算等项指标，在省的计划中单列出来，同时上报中央，由中央和省共同安排。这项决定，对于城市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应当继续贯彻执行。考虑到哈尔滨市是一个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会议议定，这个市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也实行上述规定。

城市管理方面现行的一些规章制度，凡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不符合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的，都应当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进行适当的修改。需要由国家统一制定或者修改的规章制度和办法，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征求各城市的意见，尽早做出规定或者加以修订。

目前，城市街道居民的阶级成份一般比较复杂，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加强区、街基层政权的工作，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各城市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把这方面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五反”运动中，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对街道居民进行一次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摸清居民的政治情况，整顿和纯洁街道组织，调整和充实区、街的干部力量。应当尽可能从退休的老职工中选拔一部分人，担任义务职的街道干部。区的干部，应当尽可能从各生产单位的工人中选拔。无论区、街干部，都要选拔政治觉悟高、品质好、办事能力较强、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优秀职工担任。从工人中选拔的区、街干部，应当有一定的任期，期满以后，仍然回到原来的生产岗位参加劳动，逐步做到干部能上能下，使我们的基层政权同劳动人民群众建立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切实加强商业各部门财务 和管理工作的决定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社会主义商业各部门，必须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积极地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同时，还必须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为国家提供合理的积累。勤俭办企业，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减少商品损耗，减少财产损失，是执行勤俭建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的基础上，合理地增加商业积累，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不积极促进生产发展、不遵守国家政策的单纯盈利观点是错误的。不重视商业的合理利润，甚至认为商业部门不应当取得利润，这样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最近，商业的财务管理虽然比过去一个时期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总的说来，商业财务仍然是经济和财政工作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商业的经营管理仍然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特作如下决定：

（一）必须坚持市场物价的集中统一，坚持全国物价一盘棋。凡是中央已经决定降价或者决定提价的，必须按照中央规定的调整幅度和开始实行的时间严格执行。不能该提的拖延不提，该降的任意多降。凡是属于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在调整价格的时候，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考虑到群众的生活消费，又

要考虑到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并且尽可能地同中央有关部门和毗邻地区密切联系，共同协商，争取做到步调一致。残次商品和滞销积压商品的削价处理，应当以既能卖得出去、又能尽量减少国家损失为原则，并且要由职工讨论，经过试销，严格按照主管部门规定的批准程序办事。削价的处理权限，应当继续按照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商业部“关于修订颁发残损变质商品处理办法的通知”办理。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对物价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凡是不符合规定的，必须切实纠正过来。

（二）必须按照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积极进行购销，合理使用资金。商业各部门应当认真执行国家计划和购销合同，积极促进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既要防止该收购不收购，该推销不推销；也要防止因收购无法销售的商品，给国家造成损失。在收购产品和供应原料过程中，都必须按照国家、主管部门和购销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商品检验工作，坚持按质论价，好货好价，次货次价。对于某些确实无法销售的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村副业产品，必须调整生产或者停止生产，不合格的产品，不要出厂。为了密切工商关系，及时解决工商之间的某些争议问题，各地区应当按照中央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批转的《财贸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办法，由各有关部门共同组成仲裁委员会，经常地或者定期地进行工作。工业部门有亏损的产品，如果需要补贴，一律由国家财政按照批准的计划，直接对工业进行补贴，不要采取由商业部门给予补贴的办法。

在受灾地区，商业部门应当通过购销活动，积极支持灾民的生产自救。但是，不要组织灾民去生产那些没有用的、毫无销路的产品，硬要商业部门收购。必须把商业购销同对灾民的

救济严格区别开来。商业部门在灾区收购和出售商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不得因为救灾让商业部门提高收购价格，或者降低销售价格。

（三）坚决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坚决精简商品流转环节。目前商业部门经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很多，必须结合“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深入发动群众，继续大抓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一步减掉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重叠机构。要采取最经济最合理的运输路线，避免迂回运输和相向运输。要切实改进商品的保管维护工作，减少霉烂损失。要按照制度定期盘点商品，查实库存，做到账目与实物相符并且积极推销和处理积压商品。在商品流转的环节和路线上，不按照商品流转的客观规律办事，保持不必要的机构，增加不必要的环节，这是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表现，必须坚决反对。中央和国务院责成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领导商业部门彻底纠正这种现象。

（四）在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的基础上，认真加强经济核算，增加合理利润。商业部门必须进一步健全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的各项制度，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开展劳动竞赛，发扬“一厘钱”的精神，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反对“经商不理财”的片面思想。盈利企业，必须在服从国家政策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合理利润。亏损企业，除了政策性的亏损以外，必须坚决消除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发生的亏损。定量供应的赔钱商品，各地不要随意扩大定量，以免增加亏损。商业企业的财务工作，必须正确地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营成果，不准夸大损失，虚报冒领；也不准掩盖问题，虚报盈利。

（五）坚持资金的统一管理，提高资金的管理水平。国

家分配给商业部门的资金，是专门用于商品流通的资金。各级商业企业必须保证商业资金的完整无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许挪用和抽调商业部门的资金，不许挪用和抽调商业部门的商品，不许向商业部门进行摊派，增加商业部门的费用开支。商业部门在业务经营中必须坚持钱出去、货进来、货出去、钱进来、钱货两清的原则。非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不准赊销商品，不准预付货款，不准在国家计划以外发放预购定金。

（六）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商业财务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管好商业各部门的财务，改善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商业工作的方针政策，当作一个重要问题，切实地认真地加强领导和检查。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级计划部门、财政部门 and 银行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商业财务的监督。各级商业部门应当把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经常向党政领导机关和上级主管部门反映，请求指示，并且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曾发出《关于迅速充实银行、财政和企业事业部门计划、统计、财务、会计、信贷、税务人员的通知》。商业部门执行的情况如何，各地应当进行一次检查。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步建立一支有必要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商业财务队伍，管好商业财务，这是学会做社会主义生意的一个重要条件。

各级党委和政府接到本决定以后，应当专门讨论一次加强商业各部门财务工作和改善商业经营管理的问题，定出具体实施方案，以便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生意做好做活，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 and 人民生活服务。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

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

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

钟约四千万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

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

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

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是，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

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

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

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

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

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页。）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

“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

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

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

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

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

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

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页。）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〇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

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

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

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

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党组《关于当前市场方面资本主义 势力活动情况和加强旺季 市场管理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在把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当前市场方面资本主义势力活动情况和加强旺季市场管理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报告中关于旺季市场管理的意见，请各地党委研究执行。

最近一个时期，市场进入旺季，资本主义势力和投机倒把活动又开始抬头，已经在某些地区影响到市场秩序和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完成。如果让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于明年市场的安排，对于轻工业生产和国家积累，对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当前农村工作中和市场工作中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对当前市场管理状况，普遍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要求各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其他有关的规定，严格进行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灾区的党委，应当领导群众积极开展正当的生

产救灾活动，切实细致地安排群众生活，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积极做好收购和供应工作，支持生产救灾。但是，决不能违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在目前农产品收购旺季，市场管理的工作，必须把保证完成国家农产品收购计划，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决不允许把应当统购、派购的主要农产品拿到集市出售，决不允许生产队和社员私分、盗卖这些物资。特别是在当前穿的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必须保证国家对棉花、麻类的统一掌握和合理分配，必须坚决把棉花、土纱、土布市场管死，无论非灾区和灾区，都不能有任何例外。

中 央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关于当前市场方面资本主义势力 活动情况和加强旺季市场管理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中央：

进入旺季以来，城乡市场更加繁荣活跃。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开展打击投机倒把和大中城市代替私商的工作，市场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了一定的打击，社会主义商业阵地更加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情况，促进了市场物价的继续稳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从近两个月来的情况看，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投机倒把活动又开始抬头，不利于当前的农产品收购工作、不利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情况值得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主要的情况是：

第一，许多不应当进入集市贸易的重要农产品，大量流入集市，影响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安徽省的合肥、芜湖、安庆三个市，最近平均每日上市的新粮达九万余斤。四川省资阳县八月中旬的五天时间，上市的新粮就有四万五千斤。湖南省桂阳县流渡桥现在是新烟收购旺季，平均每日流入集市的烟叶达三千多斤。山东省肥城县边院镇每集上市大麻三千斤以上，范镇每集成交大麻五千斤左右。浙江省兰溪县游埠镇每集上市籽棉五百斤左右。搞粮食长途贩运和投机倒把的也增加了，芜湖

市每天通过火车外运的粮食有一万四千余斤，由水路外运的有五万斤。以上这些情况还在发展。

第二，商品性的土纺、土织和手工卷烟又有发展。据浙江、河南、山东、内蒙等十五个省、区的二十个集市九月份统计，上市的土布有十五万尺，土线三百斤。山东省郓城县土纺土织的现象很普遍，许多生产队几乎每家都有一两架纺车。上市的土布很多，一个大老人集，一至九月就上市土布五十九万尺，估棉十七万斤。当地的供销社不顾国家政策，鼓励和组织农民进行土纺土织，组织土布的产销挂钩，进行土布的收购和运销。安徽省淮南市朱町公社三个生产队有一百五十多户制售手工卷烟，陶王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十七户，有十六户搞手工卷烟。倒卖土布的投机活动显著增加。河北石家庄市九月中旬查获倒卖土布的案件有二十六起，比上旬增加四倍。最近某些地区土纺土织和土布运销所以大量发展，是由于这些地区片面地从解决本地区群众穿衣问题出发，或者错误地把土纺土织和运输土布作为生产救灾的一个门路。

第三，不少地区商贩私设粮油加工厂、作坊。有些非粮食部门的机关、企业单位，为了扭转企业亏损，解决职工福利问题，也乱搞粮油加工厂。芜湖、蚌埠两市，个体经营的粮油加工厂有五十多个。芜湖专区和蚌埠、芜湖、马鞍山三市，没有经过批准私自开业的机关企业办的粮油加工厂就有七百三十七处。据黑龙江省两市、十县统计，机关企业和商贩私设的粮油加工厂有七百零五处。有些加工厂不但用高工资和高口粮标准挖雇国营粮油加工厂的工人，而且与投机分子勾结，大搞粮油黑市买卖。

第四，有些地区，特别是一些灾区的农民，搞商业活动的增多。河北省藁城县南孟公社，社员申请经商的有六十多户。

保定市九月十二日调查，干鲜行业三百六十户中，灾民从事贩卖的有一百二十户，占三分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太平公社的三个生产队，六十一户中做买卖的就有五十四户。安徽受灾地区一些灾民成群结队不买车票，私扒货车到合肥、巢县等地贩运大米，一般每次带三五十斤，多的二百斤。河北获鹿县辛庄生产队由于劳动力跑往外地搞买卖，生产队派不出工来，严重地影响了集体生产。

第五，不少地区的商贩增加。根据一百二十个城市的统计，九月底共有商贩二十一万人，比七月底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辽宁省七月份约有无证商贩六千人（这些商贩本来是不合法的，应当清理整顿），九月份又增加到六千六百余人。受灾地区无证商贩增加更多，安徽淮南市古沟市场，原来只有三十户无证商贩，现在发展到三百多户。济南市市中区西青龙街，有四十一户羊肉商贩，最近又重操旧业。山东济宁专区十二个县八月份查获的投机案件比七月份增加百分之三十，博兴县八月份共查获投机案件三百九十多起，较七月份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

上面这些情况证明，在市场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是时起时伏的，抓得紧，情况就好，放松了，它就抬头。这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绝不能因为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市场供应已经有所缓和，而对资本主义势力放松警惕、麻痹大意。目前正值农产品收购旺季，为了贯彻国家的统购、派购政策，继续稳定城乡市场，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必须根据中央历次的指示，坚决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切实加强旺季市场管理。我们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历次规定的有关方针政策，提出以下几条意见：

一、严格管理集市贸易的商品范围，保证国家农产品收购

任务的顺利完成。

粮食、油料，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前，一般不准进入集市。

棉花、土纱、土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严格禁止进入集市。社员的自留棉和自留地、小片开荒地上生产的棉花，如果出售，必须卖给国家。

烤烟和集中产区的晒烟，在任何时候，都不准进入集市。没有派购任务的晒烟非集中产区，如果当地出产烤烟，或者毗邻地区是烤烟产区或晒烟集中产区，则要等到当地烤烟派购任务或者毗邻地区烤烟、晒烟派购任务完成以后，才可以允许这些非集中产区的晒烟进入当地集市，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调剂余缺，不许转手买卖。

麻，在完成派购任务以前，不许进入集市。

二、加强对粮油加工和土纺、土织、手工卷烟的管理。

粮油加工，应当由粮食部门或轻工业部门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对于非粮食部门设立粮油加工厂，必须加以清理整顿，应当办的交给粮食部门或轻工业部门，多余的一律停办。私商经营的，坚决取缔。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经营的粮油加工厂（坊），应当限于接受社员委托加工自食的粮油，不准经营粮油购销业务。国营粮油加工厂要积极开展代客加工业务，方便群众，不给私商以可乘之机。

土纺土织，应当严格限制发展。对商品性的土纺土织，不管是非灾区还是灾区，都要严格禁止。有的灾区，以搞商品性土纺土织作为一种生产救灾的办法，这是错误的。

手工卷烟，要一律取缔。

三、对于市场上的无证商贩，要不断地进行清理整顿，一年至少要清理二三次。同时，要更好地把清理无证商贩同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当前，应当根据加强旺季市

场管理的要求，对无证商贩集中地进行一次清理。

四、城市和农村都要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和政策宣传工作。在农村，更要结合农产品收购，加强对干部和社员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积极地完成各种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支援国家建设。对于弃农经商的活动，一定要加以教育，坚决制止。在受灾地区，主要应当由生产队集体采取生产自救的办法来渡荒，绝对不允许进行商业活动。目前冬闲季节即将到来，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会有大批的农民，特别是灾民，出来经商，严重影响市场秩序，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各地要密切注意这个问题，积极加以防止。

五、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取缔私商长途贩运。在做好对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罚款、补税工作的同时，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坚决打击现行的投机倒把活动。对于那些长途贩运和投机倒卖粮、棉、油、烟、麻等重要农产品的投机倒把分子，必须严肃处理，除去可以根据情节处以没收、罚款以外，严重的应当法办。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税务、交通、粮食、商业、供销等有关部门，要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把打击投机倒把作为一项共同的政治任务。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拟请批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研究执行。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周 扬

总结和研究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斗争，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和国际斗争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科学研究工作中应当摆在首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其他一系列文献，从根本上指明了我们党的理论工作所应当遵循的方向，至今仍然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纲领。刘少奇同志不久以前在越南阮爱国党校的讲话中阐述了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必须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注重理论的应用，也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实际斗

* 这是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第三、第四部分。

争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用来指导革命的行动，使理论变成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每一个新发展，都是由于研究了、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则从不同的两极背弃了这个基本原则。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则脱离实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停滞不前，不能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倒退。

列宁在他理论活动的初期，就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一方面反对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革新”，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也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研究实际生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具体地应用于英国就不同于法国，应用于法国就不同于德国，应用于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在一九〇〇年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又说道：“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他指出，“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在中国，这个过程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始终坚持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

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命的苏共领导，只许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准别人真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准别人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谁要这样做了，他们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个人迷信”的帽子。他们一方面放手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要别国的共产党把他们的篡改当作“圣旨”，亦步亦趋，照抄照办。所以那些挥舞指挥棒的和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团团转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现代教条主义者。

我们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也反对现代教条主义，同他们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努力研究当代革命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学习问题就这样说过：“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实际问题当然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掌握大量的现实的材料，需要善于掌握当前斗争的形势，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研究实际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困难而在研究工作中绕开实际问题走，把兴

趣和主要精力都转移到研究古代事物的方面去，那末，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走上厚古薄今的错误道路。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必须反对的。我们应当从各方面来鼓励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且为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

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指导我们的实践，教育我们的后代，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经验中，有不少东西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以兄弟般的关怀和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经验。从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农村政策、工商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一直到许多具体经验和工作方法，特别是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及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所十分关心的题目。对这些经验和问题，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已经从根本上作出了概括。我们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指导，对这些经验和问题分门别类地作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发挥，写成革命的科学的著作。

在加强对我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世界各国现状的研究和对国际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的研究。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对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力量，进行全面的、仔细的分析。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显得薄弱的，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决不能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论先进还是落后，每一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可能在革命经验、革

命理论、科学文化等方面作出不同的贡献。我们应当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决不能有丝毫大国主义的情绪。

我们需要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现象、新问题，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成果，并且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批判，只有研究和批判了它们，才可能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需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新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研究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表现。

我们需要研究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特别需要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

我们强调研究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要重视研究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前天。研究本国的历史，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我们的一些同志对本国历史一无所知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当研究我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而将重点放在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上面。马克思透彻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就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正如他所比喻的，人体解剖，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二年前就向我们提出了写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任务，我们至今没有交卷。现在应当是交卷的时候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世界历史，也是我国历史工作者应当担当的任务。我们不能满足于袭用外国学者所编写的世界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歪曲

世界历史，我们应当给以严正的实事求是的批判。

研究我国历史遗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指出继承历史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中说：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列宁在这里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两点注意：一、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需要。

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一些优秀成果。我们应当把这个工作摆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适当的位置上，继续做出成绩。

要不要继承祖国历史遗产，这是早已不成为问题的了。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是我们祖国一切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保卫者和继承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清理历史遗产。近年来，随着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运用新的观点去研究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好现象。但同时也还有人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去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历史观的斗争的问题，历史科学领域内要不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旗帜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从历史遗产中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便于我们去存取舍。遗产中的精华，也只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才能成为科学的东西，才能成为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扫清长期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各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我们能够比古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能够从我们祖先为争取祖国的统一、繁荣和进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中，从他们世世代代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财富中，吸取于我们有益的经验 and 智慧。我们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对于祖国优秀遗产，我们不只是保存者，更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者。我们尊重前代学者在整理历史资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视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作出的某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却是根本不同于前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为今天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我们研究死人，不是为了让死人支配活人，而是为了使活人摆脱死人的传统力量的束缚。

由此可见，要在学术界树立一种批判精神是何等地需要。从五四运动算起，对于我国古代遗产的重新估价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回忆起当年那些敢于向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它的偶像挑战的勇猛的先驱者，虽然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式主义地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但是，他们那种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却是永远值得称赞的。现在有些人

已经丧失这种精神和勇气了，他们似乎倒退到了五四运动以前的状态。某些人又把孔子当作偶像抬出来，在他的面前重新跪拜，不过这一回，孔子穿上了现代服装，跪拜也换成了脱帽鞠躬的新仪式。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够相容呢？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复古的倾向，并且反对这种倾向。孔子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有他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他的学说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阐发，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五四运动对孔子的大胆批判，是一大功劳，是我国人民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前人，更应该鼓励那些敢于跳出前人的窠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提出新命题、新观点的人，鼓励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在科学工作中，没有这种革命的标新立异的勇气，永远不可能取得新的成就，科学工作永远不可能得到发展。

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有特点。我们在重新评价历史，研究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历史，清理遗产，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一再告诫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占有详细的材料，要做周密的调查，从客观事

物中引出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表面上似乎是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阶级观点，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这是为我们所不取的。

对于外国历史遗产的研究，我们应当采取同样认真的态度，经过分析批判，吸取其中于我们有益的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古代的唐朝，或现代的“五四”，都注意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使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化先后地放出了异彩。我们今天当然更需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吸收全人类的智慧，用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吸收外国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也一定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根据自己民族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需要，加以鉴别取舍。外来的东西，要加以消化改造，使之具有我们民族的风格和特点，变成自己的东西。盲目崇拜西方，轻视祖国，一切都是外国的好，那是一种丑恶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种最没有出息的学术教条主义，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无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理论问题，或者研究历史遗产，都要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哲学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非常强烈的科学。在这个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离开了这个指导的方向，百家争鸣就会变成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希望、所实行的自由化的方针。反之，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不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鼓励自由探讨、互相辩论，不鼓励独立思考，而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那末，学术界的思想就会陷于僵化。正如马克思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中所说的，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放出同样的芳香，怎么可以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

形式，一种色彩呢？一方面要反对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和防止思想僵化。这就是我们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必须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需要对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难道可以因为怕犯错误，就放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职责吗？

在科学探索上，错误认识往往是正确认识的先导。正是从错误中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才能逐渐获得正确的认识。所以只有不怕犯错误而又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才能在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同时改造自己。列宁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列宁对那些“以不犯错误而自夸”的“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表示了多么蔑视的嘲笑的态度。我国学术界的任何人，只要不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有寻求真理的愿望和热情，在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上陷入某些错误，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讨论和实践来改正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勇气去开拓前人所没有开拓过的境地，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序）

建立和壮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形成一支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而又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任务。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总结当代革命斗争的经验，清理历史遗产，通过这些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要担负起这个任务，人少了是不成的，停留在现有水平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努力扩大理论队伍，不断提高这个队伍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阶级的思想代言人，是制造精神产品，影响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由于立场不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完全相反。因此，如何去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应当按照什么方向、采取什么方法来培养我们的理论队伍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来培养，使理论工作者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参加劳动，成为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能造就出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人才。另一条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即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的方向来培养，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成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是一条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就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者，培养出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或者使原来革命的专家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庸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反面经验，就是我们的殷鉴。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我国知识界“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这就是说，知

识分子需要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而关键就在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士兵打成一片，这个道理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以后，经过二十一年，现在已经为比较多的同志所接受，所实行了。这个道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根本问题。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形式，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工具。艺术家以艺术的形式来概括人民斗争的经验，社会科学家则以理论的形式来总结人民斗争的经验。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也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研究工农群众的斗争经验，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寻找规律性，发现新问题，给以理论上的解答。这是我们的应有职责，这也是保证我们不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致思想枯竭，从而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唯一途径。反之，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轻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关门从书本上研究，要想对革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是不可能的。一个想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而又同工农群众格格不入，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不仅在从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而且在实践中提出各种理论问题，探求解答，很多创造性的见解经常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来。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书本知识和理论修养，而现在我们许多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这一点，他在一九四二年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要求有书

本知识的人和有工作经验的人互相结合。他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人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不只对于理论工作，而且对于整个革命事业，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进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在社会斗争中，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样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将由于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而被更自觉地掌握，在革命事业中取得更辉煌的成果。实际工作者中间将会出现大有希望的理论家。这样，以专业队伍为中心的、有广大实际工作者参加的强大的理论队伍，就有可能比较快地成长壮大起来。

我们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接触和了解实际，丝毫不贬低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精通自己本行的业务，广泛地猎取各种知识，成为博览群书的人。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就在它不但敢于彻底批判旧世界，而且敢于用批判的态度去吸取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财富，用来丰富自己，变成自己手中的武器。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过：“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

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青年团的任务》）列宁自己就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讲到哲学的党性的同时又指出：“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有极大的启示。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和非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坚强骨干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帮助他们自觉地逐渐地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学习问题上，丝毫的自满和骄傲，都是有害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人民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术上也应当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不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者封建社会，都出现过学术上的繁荣昌盛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方面出了康德和黑格尔，文学方面出了莱辛和歌德。列宁以前的俄国，出了像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一批卓越的革命思想家和语言艺术家。我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龚定庵、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章太

炎、李大钊这样一些人物，出现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伟大作家鲁迅。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都把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推上历史舞台。这些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和高度的成就，至今还使我们感到钦佩。恩格斯曾经这样称赞文艺复兴，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

我们今天处在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正是需要一个需要产生新的巨人——不是以十数计而是以千百计的巨人的时代。解放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以他们英雄般的劳动、斗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启发我们的智慧和思想，鼓舞我们前进。我们又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的伟大榜样。我们难道不应当在学术上做出远远超过前人的成绩吗？毛泽东同志在解放之初就说道：“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个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不当辜负我们的时代，我们一定要以新的努力、新的建树、新的创造来迎接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吧！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发明奖励条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国务院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发明和推广应用发明,以促进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条例⁽¹⁾。

第二条 本条例所说的发明,是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它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 (一) 前人所没有或国外虽有而未公布的;
- (二) 经过实践证明可以应用的;
- (三) 比现有的先进的。

第三条 全国各有关单位都应对群众的发明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并积极推广应用发明。

第二章 主管机构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统一领导全国发明工作,并监督全国对发明的推广应用。

第五条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学院负责领导本部门有关发明的申报、审查、鉴定等工作。

第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负责领导本地区有关发明的申报、

审查、鉴定等工作，并监督本地区对发明的推广应用。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有关厅、局负责领导本厅、局主管范围内有关发明的申报、审查、鉴定等工作。

第八条 全国一切国防专用的发明，都由国防部核准。一切非国防专用的发明，都由国家科委核准。奖励办法都按本条例办理。

第三章 申报和审查

第九条 发明人（包括个人和集体，以下同）申报发明，应提出发明报告，按下列规定申报：

（一）发明人属于中央直属单位的，两份报主管部门审查，一份抄报国家科委（国防专用的抄报国防部）。

（二）发明人属于地方单位的，两份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审查，一份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

（三）发明人属于国防部门的，凡是国防专用的发明，两份报军种、兵种或总部的有关业务部门审查，一份抄报国防部；非国防专用的发明，两份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厅、局审查，一份抄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一份抄报军种、兵种或总部的有关业务部门。

（四）发明人是一般居民的，两份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厅、局审查，一份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

第十条 发明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一）发明的名称；

（二）发明人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和通讯地址；

（三）发明的完成日期；

（四）列为发明的理由；

(五) 发明的详细内容;

(六) 申报发明的日期。

第十一条 编写发明报告要实事求是, 报告的内容要简要、明了、准确、完整。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有关厅、局对申报的发明, 负责组织审查、鉴定, 认为合格的, 签注意见一式三份, 两份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审核后转报国家科委核准(国防专用的报国防部核准), 一份抄报国务院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对直属单位的发明人申报的发明, 负责组织审查、鉴定, 认为合格的, 签注意见, 报国家科委(国防专用的报国防部)核准。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审查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厅、局抄报的发明项目, 并签注意见, 报国家科委(国防专用的报国防部)。

第十四条 各主管单位接到申报的发明后, 必须及时作出处理, 并将审查、鉴定的结果通知申报人或申报单位。如在半年以上仍不予处理时, 申报人或申报单位得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或国家科委(国防专用的向国防部)提出申诉。

第十五条 发明人和审查单位之间发生争议时, 或其他单位、个人对已核准的发明项目有不同意见时, 可向国家科委(国防专用的向国防部)申请作最后的决定。

第四章 奖 励

第十六条 对发明的奖励采用荣誉奖和物质奖相结合的方式。每项发明奖励一次。

奖励共分五等, 规定如下:

| 奖励等级 | 荣誉奖 | 资金 |
|------|-----------|-----|
| 一 | 发明证书及一等奖章 | 一万元 |
| 二 | 发明证书及二等奖章 | 五千元 |
| 三 | 发明证书及三等奖章 | 二千元 |
| 四 | 发明证书 | 一千元 |
| 五 | 发明证书 | 五百元 |

第十七条 特殊重大的发明列为特等奖，由国家科委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另行奖励。

第十八条 国家科委组织发明评奖委员会，负责发明的评奖工作。

第十九条 发明的评奖办法由国家科委另定。

第二十条 发明评奖委员会的评定结果，经国家科委批准后，由国家科委统一授奖。

第二十一条 经核准的发明，可由国家科委通报表扬。

第二十二条 以发明人的姓名命名发明，须经国家科委批准。

第五章 应用和保密

第二十三条 发明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垄断，全国各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利用它所必需的发明。

第二十四条 每项发明应否保密、应列密级及其保密措施，都按有关保密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由于对外贸易或其他原因，需要将发明出售给国外时，经国家科委批准后，统一由对外贸易部办理。

第六章 华侨和外国人申报的发明

第二十六条 旅居外国的华侨和外国的单位或个人，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申报发明，经审查批准之后，按本条例规定给予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明局负责接受前款规定的申报。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国务院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刊印

注 释

〔1〕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国务院关于发布〈发明奖励条例〉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的通知》，本条例发布施行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布的《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公布的《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即行废止。

技术改进奖励条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国务院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群众改进技术的积极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条例^{〔1〕}。

第二条 凡是群众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经过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使某一单位的生产或工作更加多、快、好、省的，都是技术改进。

第三条 技术改进的内容包括以下各类：

(一) 工业产品、建筑结构的改进，生物品种的改良和发展。

(二) 工艺方法，试验、化验、检验方法，栽培技术，植物保护技术，养殖技术，安全技术，医疗、卫生、劳动保护技术及物资储藏、养护、运输技术等的改进。

(三) 工具、设备、仪器、装置的改进。

(四) 更有效地利用原料、材料、燃料、动力、设备及自然条件的技术措施。

(五) 统计、计算技术及其他技术的改进。

第四条 各有关单位都应充分发动群众，努力改进技术，鼓励和支持群众改进技术的积极性，采用领导、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办法，有目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技术改进。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

可参照本条例自行规定。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负责监督本条例在全国的执行，并指导全国的技术改进工作。

第七条 国家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委）负责领导全国有关工业交通方面的技术改进工作。

第八条 国务院各部门和中国科学院负责管理本部门的技术改进工作，并应指定适当的技术行政单位，办理技术改进的日常业务工作。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负责监督本条例在本地区的执行，并指导本地区的技术改进工作。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委）负责领导本地区有关工业交通方面的技术改进工作。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厅、局负责管理本地区有关单位的技术改进工作，并应指定适当的技术行政单位，办理技术改进的日常业务工作。

第三章 审查和处理

第十二条 群众提出技术改进建议后，接受建议的单位应及时进行审查，作出结论，并通知建议人。

第十三条 建议人和审查单位之间发生争议时，可提请上

级领导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经过审查认为有进行实验价值的技术改进建议，由接受建议单位领导批准后，列入本单位的研究试制计划或技术措施计划，给予人力和物力的保证。

第十五条 技术改进的研究试验费用由接受建议单位支付，属于生产单位的计入生产成本费，非生产单位的在事业费中列报。

第十六条 重大的和本单位无法处理的技术改进建议，应报请上级领导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技术改进措施必须经过试验和科学鉴定，成功之后才能采用。

第十八条 对于具有推广意义的技术改进，采用单位应及时进行总结、鉴定，写出系统的技术资料，按下列规定报有关单位推广应用：

（一）国务院各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直属单位，报主管部门，抄报国家科委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有关工业交通方面的并抄报国家经委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委。

（二）地方单位，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有关工业交通方面的并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委。在全国有推广意义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转报国务院主管部门。

第四章 奖 励

第十九条 无论是集体或个人（包括外国侨民）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采用后都按本条例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条 对技术改进的奖励采用荣誉奖和物质奖相结合

的方式。每项技术改进奖励一次。

奖励共分五等，规定如下：

| 奖励等级 | 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 | 荣誉奖 | 资金 |
|------|-----------|-------------|--------|
| 一 | 一百万元以上 | 批准单位表扬，并发奖状 | 五百至一千元 |
| 二 | 十万元以上 | 批准单位表扬，并发奖状 | 二百至五百元 |
| 三 | 一万元以上 | 采用单位表扬 | 一百至二百元 |
| 四 | 一千元以上 | 采用单位表扬 | 一百元以下 |
| 五 | 不满一千元 | 采用单位表扬 | |

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是采用单位扣除生产成本费和实施技术改进开支后，一年中实际创造的价值。

第二十一条 在评奖时，除按年实际增产节约价值计算外，必须同时考虑技术改进的作用大小和技术复杂程度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 技术安全、劳动保护等不能以增产节约价值计算的技术改进，由采用单位按其作用大小和技术复杂程度等情况评定奖励等级。

第二十三条 奖励的审批权限：

(一) 国务院各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直属单位，一、二等奖由主管部门批准，三、四、五等奖由采用单位批准。

(二) 地方单位，一等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转报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二、三等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批准，四、五等奖由采用单位批准。

(三) 各单位的领导人所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在本单位采用后也应按本条例规定给予奖励，但必须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

第二十四条 奖金由采用单位支付，生产单位支付的奖金计入生产成本费，非生产单位支付的奖金在事业费中列报。

第二十五条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技术改进，凡是在一个地区或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应分别由所在地区主管部门或国务院

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按其作用大小和技术复杂程度等情况给予适当奖励，奖金由给奖部门支付。

第二十六条 重大的技术改进，可由国务院各部门、中国科学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厅、局另行奖励，其奖金数额和荣誉奖的方式，不受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限制。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各部门、中国科学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施行细则，报国家科委备案。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国务院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刊印

注 释

〔1〕参见本册第319页注释。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1〕}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七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七）总之，要使全国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 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九月）

今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项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各地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从今年六月以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准备工作：一方面，召开了各种干部会议，训练了干部；一方面，进行试点。现在，各地的试点，一部分已经结束，大部分即将结束。各地试点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各地的试点工作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些都是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必须解决的问题。下面就是关于这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 and 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抓住五个要点，即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五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

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下列十二项工作。

(1) 组织和训练工作队。这项工作必须认真做好。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它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凡是在“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有严重问题而没有认真交代和认真检查的人，都不能参加。工作队的成员都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以及中央其他有关文件。

(2) 召开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干部会议，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宣读若干别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材料，结合着对本地阶级斗争情况的揭露，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这些会议可以吸收贫、下中农的代表参加。通过这些会议，使大多数犯有一般性错误或者错误比较严重的干部，主动地“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以便初步形成领导队伍。在这些会议上，还要检查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凡是违反了六十条规定的，都要检讨。

(3) 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工作队的成员，要尽可能地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4) 召开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包括公社党委会议、支部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党员中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党员认识和改正错误。

(5) 发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各种会议，在做好思想工作、启发干部觉悟

的基础上，进行“四清”工作。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

(6) 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积极完成生产计划和农副产品的交售任务。对于群众中那些有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热心做生意、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的人，经过说服教育，提高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错误。对于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社员，进行适当的批评。对于一些一贯热爱集体、积极劳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员，给以表扬。

(7) 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正确处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

(8) 成立贫、下中农组织。

(9) 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

(10) 改选或者调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

(11) 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

(12) 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改进公社企业和大队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制订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发展生产的规划。

以上十二项工作，包括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各地情况不同，试点的经验也不完全相同，这些工作的进行可前可后，有些工作还可以互相穿插、结合进行。但是，

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能胜利完成：这是共同的经验。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运动的进行，必须分期分批，在一个地区内应当容许有先有后，参差不齐。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对本地区的运动作了具体部署。一般来说，这次运动在全国农村中彻底完成，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顺利进行，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地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暂时还没有进行“五反”运动的县级机关，必须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使科局长以上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二、领导负责，亲自动手。省、地、县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员，都必须亲自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做出样子，指导和带动全盘运动。只号召、不动手，或者虽然亲自“挂帅”但不亲

自“出马”，是不正确的。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领导人员必须随时注意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满足于听汇报、看书面材料，不深入下层，不实地考察，也是不正确的。在整个运动的进程中，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总结经验。这样，才能统筹全局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才能不断地提高干部，不断地加强对运动的指导。

三、进行细致的工作，深入地发动群众。这次运动，必须达到中央决定草案所提出的要求：“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衍衍‘走过场’”。运动一开始，就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直接同干部和群众见面，向他们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使中央的政策，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成他们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不论是组织阶级队伍，进行“四清”，或者开展对敌斗争，都要充分发动群众，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的革命斗争。工作要做得细致，不能草率从事。必须把时间安排得充裕些。一般的经验，在一个点，完成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大约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企图在十天半月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难免不出乱子。

四、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队如果只在基层干部的圈子里打转，不去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把基层组织和原有的干部抛在一边，不依靠他们进行工作，也是不对的。这样做，会造成基层干部同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的对立，不利于运动的顺利开展。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至于个别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和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着领导的

社、队，则是另一回事。对于这样的社、队，在调查确实，并且经过县委批准以后，应当派得力的工作队下去，撇开那些坏的干部，直接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进行组织整顿，培养积极分子，逐渐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当然，对于这种社、队中的一些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党员和干部，还是应当注意团结他们，一道进行工作。

五、在运动中进一步贯彻“六十条”。一切同“六十条”有关的问题，都必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决不能把“六十条”丢开，另搞一套。“六十条”贯彻得好坏，应当作为检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得如何的标准之一。

六、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以前，在干部的认识上，往往可能注重生产而忽略阶级斗争。在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容易忽略生产工作。这两种偏向都应当避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在整个运动中间，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包括集体副业）生产上去。

七、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其所以必须点面结合的理由，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而且由于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然引起很大的震动，如果我们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

损失。

面上除了抓紧日常工作以外，还应当做好下列几项工作：

(1) 以区或者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吸收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开会时间十天左右，了解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目的，提高觉悟，消除顾虑。然后依靠他们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在群众中造成声势。(2) 教育基层干部认识依靠贫、下中农的重大意义。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可以通过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去推动各项工作。对于生产生活中存在困难的贫、下中农，要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3) 鼓励干部主动改正缺点和错误，以便轻装上阵，团结对敌。要求干部结合分配工作，清理工分和账目，建立必要的制度，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4) 号召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种好试验田，改进思想作风，实行民主办社，密切同群众的联系。(5) 继续宣传贯彻“六十条”，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副业生产。(6) 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召开地、富、反、坏分子训话会，交代政策，只许他们守法，不准破坏。对于现行犯要坚决打击，需要组织群众斗争的，必须经过县委批准。

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也不要求做得像点上那样细致，但是，由于地区广大，又没有工作队的指导、帮助，如果不注意领导，容易出乱子。地方的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必须大力抓紧面的工作，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动，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可以预计，经过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以后，在面上，可能发现一些情况特别严重、阶级斗

争特别尖锐、问题非及时解决不可的社、队。对于这种社、队，应当及时地派工作队下去，把它作为一个点，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是我们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归根到底，在于我们是不是坚定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贫农和下中农占了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依靠贫、下中农的工作做好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还要在具体执行政策的时候，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说来，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分清界限，妥善处理。

（一）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在农民群众中，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极少数的贫农和下中农，思想落后，阶级界限不清，在敌人的欺骗之下，或者做了损害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坏事，或者参与了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对于这种人，不可以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给以打击，而是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醒悟过来，同阶级敌人坚决决裂。

（二）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在农民中间，有一些人，一心想个人发财致富，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对于这种思想和行为，必须进

行教育和批评。但是，他们是劳动者。一切教育和批评，都是为了坚定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要打击的，决不是这种人，而是为数极少的、经常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牟取暴利、过着寄生生活的严重的投机倒把分子。对这类人，应当根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依照政策和法律，该补税的补税，该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该法办的法办。

（三）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中，还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集体经济单位生产的农副产品，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产品，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以后，应当允许在规定的集市上出售。有一些为国家政策所准许的正当的肩挑运销，便于群众生活，不能当做投机倒把。有一些人，历来是附带做点小生意，只要他们不贩卖国家禁止上市的物资，不从事长途贩运，不破坏市场，也不应当看做是投机倒把。

（四）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对待社员家庭副业，包括自留地和小片开荒地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办事，不得违反。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决不能侵犯或者限制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随意没收在“六十条”规定范围以内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超过了规定的数量，对于超过部分，如果数量很少，不影响集体经济，一般地可以不动；如果数量较多，应当对农民说服教育，采取适当的方法，收归集体所有。

上面四个问题，都是在运动中容易混淆界限的重要问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具体的政策界限，例如，贪污盗窃同小偷小摸的界限，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恢复封建宗族统治、进行反革命活动同群众的落后习惯和迷信行为的界限，敲诈勒

索、重利剥削同互助互济、亲朋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的界限，等等，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谨慎对待，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破坏了政策，伤害了群众，给运动带来损害。

农民群众有了缺点和错误，应当耐心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地改正。对于某些有比较严重错误的人，应当进行适当的批评，但是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有一些人，占有了集体的农具和其他财物，或者私拿了国家的物资，应当通过教育，由他们自动地交出来。有一些人，占用了集体的耕地，应当通过教育，要他们退出来，但是，做法要合情合理，不要糟蹋庄稼，不要荒了土地。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有极少数的人，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对这些人应当进行细致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认真改过，经过群众同意，他们仍然可以作为依靠对象，参加贫、下中农组织。总之，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只能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容许开大会斗争，不准乱戴帽子，更不准动手打人。有些地方，曾经发生过乱抓、乱斗、使用刑罚的违法乱纪事件。这种事件，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干部、学生、复员退伍军人等人员，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一个重要力量，不可忽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在部队、工厂、机关或者学校中受过相当的革命教育，政治觉悟比较高，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知识。一定要注意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官兵的家属，绝大部分住在农村。

做好军属工作，对于巩固军队，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深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拥军优属政策，认真检查这个政策执行的情况。要教育军人家属珍惜自己的荣誉，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军人家属的光荣，对一些生活有困难的军人家属给以适当照顾。现役军人的婚姻，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加以保护。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要采取上述的方针和做法，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至于那一部分不到百分之五的人，也不能统统列为打击对象。他们犯有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些还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但是，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多数人同阶级敌人还有一些区别，应当尽力争取。在这一部分人当中，真正需要打击的，只是那些极少数的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人。

四、关于贫、下中农组织

一、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之后，再分批吸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是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贫、下中农群众，又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段基础工作。各地的经验证明，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贫、下中农组织。必定会是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在前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曾经

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二、贫、下中农的组织，必须如中央决定草案所指出的，既要保持它的纯洁性，又要保持它的群众性。在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例如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小组的组长）中间，必须保证老雇农和贫农占绝对的优势，但是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新、老下中农。贫、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分子，还应当包括一定数量的青年和妇女，这对加强农村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很有作用。在贫、下中农组织最后形成的时候，应当努力争取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群众参加，不能参加的，只是那些同四类分子关系密切、犯有严重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在民族杂居地区，应当注意吸收各民族中的贫农和下中农参加。

三、要注意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经常工作。贫、下中农组织，不仅要在政治运动中起作用，而且也要在经常的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要从工作制度上，保证贫、下中农组织能够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工作和这三级的干部，进行协助和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必须邀请贫、下中农的代表列席会议。要教育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使他们学会依靠贫、下中农组织来办好集体经济。

四、贫、下中农组织能不能有经常工作，能不能经常发挥作用，决定于党的领导。党支部应当经常关心和帮助贫、下中农组织的工作。一切同社、队有关的重大事情，在党内讨论之前，应当征求贫、下中农组织的意见；在党内讨论之后，应当先在贫、下中农组织内进行传达，同他们商量讨论。一切农村

中的党支部，都必须真正懂得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并且真正学会依靠这条阶级路线来进行工作。

五、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充分。在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中间，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例如，贫、下中农组织的名称，这个组织有哪些任务和权力，这个组织的基层单位应当放在大队还是生产队，公社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和管理委员会的干部能否又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这个组织同党组织和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县一级是否需要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省、地两级是否需要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各省、市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草拟出一个贫、下中农组织章程。

五、中农问题

中农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正确对待。在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是党在农村中长期执行的阶级政策。

在对待中农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待上中农的问题。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划分上中农，一方面是如何团结上中农。上中农是农民中间一个比较复杂的阶层，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发生偏差的，往往是在对待这一部分人的政策上。对上中农处理不当，又往往影响到同其他中农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正确处理上中农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能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用什么标准划分上中农，这个问题，在一些同志中间，

还不是很清楚的。有的同志单纯以生活富裕的程度作为划分的标准。结果把一些贫农和其他中农错划为上中农，甚至把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人也划为上中农。这样做，对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十分不利。这是一种阻碍生产而不是推进生产的做法，因而是很错误的。我们所积极鼓励的，正是要广大农民依靠集体，发展生产，共同富裕。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破产的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的同志以政治态度作为划分上中农的标准。这是不科学的。而且这个标准，很难于一致，也很难于掌握，结果往往把一些思想落后或者有较多缺点的贫农和其他中农划为上中农，造成农村阶级队伍的混乱。

以上两种划分上中农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划分上中农的根本标准是，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 and 进行轻微剥削。上中农的生活状况，一般地比其他中农以上，这正是由于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 and 进行轻微剥削的结果。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只要没有轻微剥削，都不能划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而生活上升的贫农和其他中农，他们既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又没有任何剥削，都不应当划为新上中农。至于一些在合作化以后依靠不正当收入而富裕起来的贫农和下中农，一般地也不要改变他们的成分。

老中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一般地只划分过上中农（当时叫做富裕中农）和一般的中农。现在，在组织农村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确定那些人是老下中农。所谓老下中农，就是老中农中间占有生产资料较少、需要出卖少量的劳动力或者借少量的债、因而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一部分人。在一般的老中农中间，除开老下中农以外的另一部分人，普通就称为中农。这

一部分人，和老上中农有区别，他们不剥削别人，因此，不当把他们归入上中农。同时，这一部分人，和老下中农也有区别，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一般地不出卖劳动力、不受债利剥削，因此，不能把他们作为依靠的力量，只能作为团结的力量。

鉴于目前在区分农民各阶层的成分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很有必要在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中间，重新学习一九三三年发布的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五〇年政务院的补充决定以及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以便统一认识，统一分析阶级的标准。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要在农村中重新划分阶级。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以外，都不重划阶级。农村的阶级成分，应当以土地改革时期划分的成分并且参照合作化以前变化了的成分，作为依据。如果有一些人过去划错了成分，在组织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改正，可以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改正过来。

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同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济。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必须团结他们，也要使他们在生产中正确地发挥作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大多数的上中农是可以跟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不能笼统地反对上中农。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上中农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利益的思

想和行为。不要因为在上中农中间，有一些人带头闹单干，有一些人进行投机倒把，就对所有的上中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打击。

我们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上中农之间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谨慎处理。当着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以后，这个问题，尤其要注意。反对少数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不能剥夺他们的社员权利，也不要给被批评的人戴上资本主义分子的帽子，更不能侵犯他们依靠集体劳动、多劳多得的正当利益。有少数地方，曾经发生过像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那样斗争一些上中农，这类的事应当坚决防止。把上中农推到地主、富农那一边去，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

在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情况是很好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地方，有些领导运动的同志，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当着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往往容易对于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教育和批评不够严肃，有迁就姑息、马虎了事的情绪；但是，在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往往不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情，把基层干部看得黑漆一团，甚至把他们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后一种情况，是十分有害的，应当改

正和防止。

各地试点的经验表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干部的问题处理得当，团结群众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实际上，教育干部的过程，也是教育群众的过程。教育干部的工作做好了，使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检讨了错误，改进了作风，也就给群众的自我教育树立了榜样。

为了团结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

（一）对广大的基层干部怎么看法。要有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应当看到，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还比较严重，此外，还有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这是一方面。但是，重要的，还必须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好的，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能够逐步改正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能够逐步提高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和下中农，其中大部分又是土地改革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在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所犯的错误，大量的还是属于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等一般性质的错误，犯严重错误的只是少数。这是另一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估计，然后才有可能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至于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于他们也要作分析。根据一些地方的调查，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过占百分之一左右。其他百分之二、三、

四的人，错误很严重，而且往往同阶级敌人有牵连，有些人已经被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拉下水，群众意见也很大，但是，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

（二）对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在具体做法上，要抓住四个环节。

第一，划清政策界限。应当划清的政策界限，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以外，还应当特别把以下两个界限问题，区别清楚，即：贪污盗窃同超支挪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的界限；腐化堕落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般性错误的界限。

第二，做好教育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满腔热忱地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即使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应当以最大努力，在经过批评斗争以后，把他们当中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人，尽量争取、改造过来。我们的基层干部，有许多人在旧社会里吃过苦，受过压迫，引导他们回忆旧社会，对比新社会，极容易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许多地方的试点，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各地可以普遍采用。

第三，做好经济退赔工作。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不论多少，必须彻底退赔。对于犯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必须按照法律和政策，或者要他们补税，或者罚他们的款，或者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总之，不能使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以便使他们得到教训，不敢再犯。但是，计算要实事求是，退赔、补税和罚款要合情合理，做到既使群众满意，又使犯错误的人过得去。时间不要算得太远，除

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惯犯以外，一般地可以从六十条第一次修正草案下达农村以后，即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算起。贪污盗窃的财物，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一般地可以按照现在的国家牌价或者现行的市场价格，折价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分批退赔。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只要坦白得好，退赔得好，而民愤又不太大，可以不戴贪污分子帽子，但是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要调动工作，不能继续担任负责干部和经手财物的职务。

对于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都要严格批评。数量大、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原则上必须退赔，一次退不起，可以分期退；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酌情少退。数量较少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检查多吃多占的时候，时间也不要计算得太远，一般地可以从一九六二年算起。

第四，做好组织处理工作。组织处理应当放宽一些。凡是自动交代，检讨得好，退赔得好，并且决心洗手不干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免于处分。只是那些错误情节严重，不好好交代，不好好退赔，群众认为非处分不可的，才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处分要实事求是，该受什么处分，给什么处分。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除开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外（这类人，有多少清洗多少），以县为单位，把受处分干部的人数，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二以内，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具体的比例，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加以控制。

总之，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要谨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必须订正核实，搞得确确凿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分清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以后，才作处理。问题一时

弄不清的，可以列为专案，待调查清楚以后，再去处理。凡是不容易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先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个别案件非及时处理不可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放在运动的后期，也就是在领导和群众比较冷静的时候，进行处理。

（三）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还要表扬好人好事。对于那些立场坚定、积极工作、热爱集体、办事公道、遵守制度、廉洁奉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应当给以表扬，以便在广大干部中树立学习的榜样。

（四）如何对待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在保证贫、下中农成分的干部在领导机构中占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妥善处理。

新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只要他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决心同贫、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应当继续信任他们，不改变他们的领导职务。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歧视和排斥贫、下中农，或者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群众不信任他们，可以采取适当办法，进行调整。

老上中农，一般地不宜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其中个别人，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社会主义觉悟比较高，一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公道能干，群众拥护，各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继续让他们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

老上中农成分的党员，应当以党员的标准衡量他们。能不能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不是根据他们的成分，而是根据他们的“德”、“才”的情况。

（五）地主、富农的子女，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人，能不能担任基层干部。

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但是，一些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还乡职工、复员军人，可以根据需要，分配他们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教育和改造他们。

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做党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的表现，不能单纯拿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这一条，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依据。对这一部分党员、干部，要抓紧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教育对方，并且不受对方的坏影响。至于同地主分子或者富农分子结婚的人，则当别论，一般地不要让他们做党员或者当干部。

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尚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有些地方也已经在宣传和推广。现在，干部不劳动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各地农村干部都认真地参加集体劳动，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还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目前，在一些干部中，对于参加集体劳动的伟大的革命意义仍然认识不足，不愿意劳动和轻视劳动的思想，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一些领导机关，特别是一些县、社领导机关，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会议多、报表多等现象，

仍然严重地存在。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干部参加劳动以后产生的实际困难注意得不够。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个制度巩固地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做好三件事情，这就是：作宣传，订制度，改进领导机关的领导作风。

必须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对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影响，不是轻易可以扫除的。应当继续向基层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他们继续认真地、深入地学习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针对着他们的思想情况，具体地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提高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

为了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劳动经常化，还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包括规定他们全年的基本劳动日数，规定干部补贴的标准，合理安排工作和劳动，等等。每一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应当完成多少基本劳动日，应当补贴多少工分，都要经过社员群众讨论通过，确定下来。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工分补贴总数，一定要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以内。

改进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县、社两级机关的领导作风，是基层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个重要保证。县、社两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县、社领导干部参加农村的集体劳动，对于了解实际、联系群众、改进作风，都会有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的这种以身作则，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无疑会起很大的带动和督促作用。

中央曾经一再指示，三令五申，要求中央的各专业部门，省、地、县、社的领导机关，大力精简会议，严格控制统计报

表。但是，这个问题，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至今没有认真解决。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县、社两级领导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六十条”的规定，不许乱开电话会议，不许乱召集基层干部开会。各种会议，凡是可开可不开的，坚决不开；能够在下面开的，不到上面开；可以合并开的，不必单独开；能够分片开的，不要集中开；可以在农闲期间开的，不到农忙期间开。县级各专业部门召集公社各级干部开会，都必须经过县委批准。公社一级召开两天以上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议，也必须经过县委批准。统计报表，只能由县的统计部门根据上级规定，统一制发，其他单位，一律不得自行制定。县统计部门必须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四月十五日通知，对报表的情况进行清理。需要保留的报表，开出清单，发给人民公社。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一律停止填报。省、地两级党委，要指定一名书记负责，对本地区内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中央各业务部门的党组负责人，也要对本部门执行精简会议和精简报表的情况，每半年检查一次，保证把各种会议和统计报表减少到最少限度。

八、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各地试点的经验证明，凡是党内问题严重的地方，也就是党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都很紧张，阶级敌人活动猖狂的地方，如果不整顿党的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不能顺利进行。试点的经验又证明，这次运动不仅能够使每一个党员很好地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也能够对每一个党员进行一

次很好的考查。这些经验都说明，在这次运动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整顿。

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在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安排整党工作，并且对这个工作加强领导。在组织工作队的时候，应当注意抽调一些有党的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训练工作队，要有一些有关整党的内容。

这一次农村整党工作，是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密切地结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就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过程。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达到下面的几个要求：（1）使所有的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每一个党员用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把党组织中间的问题，揭发出来。有重点地对党员的社会成分、阶级立场、政治历史和思想作风，进行一次审查。（3）把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地、富、反、坏分子，清除出去。（4）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和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而且屡教不改的党员，进行适当的处理。（5）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6）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充实和健全起来。（7）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些要求达到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就基本上整顿好了。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个关于党内斗争的原则，应当是农村整党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整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采取党内批评和党外批评互相相结合的方法。先要在党内召开会议，然后再召开有贫、下中农群众的积极分子列席的党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进行批评

和自我批评。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的处理，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处分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要容许受处分的人说明和申辩，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对于一些一贯消极落后的党员，要反复教育，并且给他们以充分的学习和考虑的时间，然后再作适当处理，有一些人还可以留到登记党员的时候，再去处理。

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是不是就在这次运动中进行，现在还不确定。各地可以进行试验，或者只把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登记党员的工作暂不进行；或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党的基础上，紧接着就进行党员登记。这个问题，可以经过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行确定。

九、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坚决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且经过斗争，把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同时，又必须把斗争的锋芒，准确地、集中地指向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要扩大打击面。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复辟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要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他们。斗争以后，放到群众监督之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把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改造成为新人。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

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少数必须逮捕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要先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借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到运动的后期，经过审查、批准，再依法逮捕。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悔改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杀人，必须严格按照过去的规定，经过中央批准。

有倒算行为、投机倒把行为或者盗窃行为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应当严肃处理。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以至没收；盗窃，必须如数退赃；倒算，必须如数退还。总之，经济上的处理要严格，但是算账要实事求是。

在这次运动中，应当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评审，切实加强对他们的经常的监督和改造工作。已经摘掉帽子但又有破坏活动、需要重新戴帽子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重新给他戴上；个别确实表现好的四类分子，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也可以摘掉帽子。现在，有些农村，存在着对专政对象情况不清的现象，例如，有的地、富、反、坏分子，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

农村跑到城市，逃避了人民的监督。在这次运动中，各地对于专政对象的实际情况，应当进行一次清理。

在过去土地改革中，有一些地方漏划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区多些，有的地区少些，也有的地区没有。从全国来说，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在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但是，对于有破坏活动的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一定要清查出来，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给他们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

根据一些试点的调查，近两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地主、富农家庭，在经济上比中农和贫农的家庭上升得更快。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今后，在经济上，除了严格禁止他们进行任何非法活动以外，还应当规定他们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必须完成的民工建勤任务。由于他们的子弟不参军、不参加民兵训练，他们本人又很少参加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应当让他们的家庭合理地多负担一些义务劳动。当然，对于他们依靠劳动得来的正当利益，还是应当给予保障，在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然对生产不利，对改造他们也不利。

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在农村青年中，地主、富农子女约占百分之十左右。目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亲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参与封建复辟和反革命活动。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少，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大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政治上表现一般，这些人正站在十字路口，

是敌对阶级同我们争取青年的一部分主要对象。我们应当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争取他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当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问题上，要防止和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对少数地主、富农子女的反动言行不作必要的斗争。一种是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上面的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党的政策。

地主、富农子女，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但是，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年纪较轻，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不是剥削分子，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一样看待。地主、富农子女，在土地改革时候没有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现在就不应当再给他们戴上这类帽子。除了少数坚持反动地主阶级立场的，或者因为有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根据他们的表现，经过社员同意，接收他们为人民公社社员。召集四类分子开会，不应当要他们的子女参加，也不应当由他们的子女代替他们本人参加。

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当加强对地主、富农子女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教育；

也可以召集他们开会，请老贫农、下中农向他们揭露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进行阶级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识。对于少数有反动行为和有破坏行为的地主、富农子女，在这次运动中，应当进行必要的斗争和适当的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照法律给以制裁。

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教育贫、下中农青年，特别是党员和团员，提高警惕，防备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对于已经结了婚的，更要教育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受对方的坏影响，但是，不应当作出硬性的规定，加以限制。

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地主、富农子女，应当表示欢迎。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合理安排他们的劳动和工作，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弟，凡是在这些干部或者军人直接抚养下长大的，他们的出身应当是革命干部家庭或者革命军人家庭，而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地主、富农子女看待。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指《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已收入本书第16册。

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 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 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李 先 念

各位代表：

目前，我国人民已经赢得了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胜利。在经济好转的基础上，也赢得了财政的好转。我们的财政收入是稳步上升的，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市场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诬蔑相反，我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伟大的紧密团结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怀着百倍的信心，沿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道路，奋勇前进。

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国家决算，国务院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次会议作了报告，并且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批准。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财政概

* 这是李先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

况、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的初步安排，请予审查。

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财政概况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财政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个五年国家资金积累的规模，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国家的财政工作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支持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个五年，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收入总数为二千一百九十二亿六千三百万元，支出总数为二千一百九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元。同第一个五年比较，收入总数比第一个五年的一千三百六十五亿六千二百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六；支出总数比第一个五年的一千三百六十四亿零九百万元，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七。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国营企业的缴款。这五年国营工商企业缴纳的利润和工商税收，共计一千九百二十二亿五千四百万元，占第二个五年财政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七，比第一个五年的九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九十八点二。这五年，农民所缴纳的农业税没有增加，而且由于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还降低了农业税的征收数额，五年农业税收入总数是减少的。第二个五年农业税收入总数为一百三十八亿一千二百万元，比第一个五年的一百四十九亿七千五百万元，减少十一亿

六千三百万元，即减少百分之七点八。第二个五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生产的增长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而不是直接增加人民的负担。这里体现了社会主义财政的巨大优越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

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财政支出，也比第一个五年有了巨大的增长。各项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增长最多，社会文教科学费次之，行政管理费增长很少，国防费则略有下降。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费一千二百四十四亿零四百万元，比第一个五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九点七；社会文教科学费二百九十二亿零三百万元，比第一个五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一点七；行政管理费一百三十亿一千八百万元，比第一个五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国防费二百六十八亿六千八百万元，比第一个五年下降百分之九点三。从各项支出在预算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科学费，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二，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七点一；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百分之十八点二。把国家财政资金首先用来增加经济和文教支出，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这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预算以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计九百二十四亿九千万元，比第一个五年的四百九十二亿七千万元，增加四百三十二亿二千万元，增长百分之八十八。正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许多基本工业部门的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长，并且建立了像制造拖拉机、制造石油化工设备、生产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这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直接用于农业方面的投资和用于为农业服务的工业方面的投资，也有了大量的增加。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

机械、化学肥料等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国家，经过两个五年的努力，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集中地反映着国家的政策。第二个五年，我们把百分之七十的支出，用来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体现了我国人民从事和平劳动、加速国家建设的愿望，表明了我国的财政是建设的财政，和平的财政。这同美帝国主义把将近百分之六十的支出，直接用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力图把美帝国主义打扮成爱好和平的天使，把我们说成好战的凶神恶煞，这种谎言不仅是卑鄙的，而且是笨拙的。

各位代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复杂曲折的情况下执行的。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大幅度减产，影响了粮食的供应，影响了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苏联领导竟背信弃义地撤退了在我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名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就扰乱了我国原定的建设计划。同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总路线的精神体会不深，由于缺乏经验，发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所有以上这些情况，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表现在财政金融方面，一时出现了财政支出大于收入、货币投放大于回笼、集市贸易价格上涨、市场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妄图窜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加强了骚扰活动；印度反动政府向我国西南边境，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挑起了中印边境的冲突。他们企图趁火打劫，他们

预言我们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采取什么办法来克服当时的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这是当时我们面临着的重大问题。是不是采取依靠外援、举借外债的办法呢？是不是采取增加税收、加重人民负担的办法呢？不，我们没有也不应当采取这些办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指示给我们的办法是：认真地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有计划地调整国民经济；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力支援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尽可能地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整顿企业，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踏踏实实地增产节约，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克勤克俭，一致努力。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克服困难的道路，是一条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共同克服困难的道路。它所获得的显著成效，是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的。

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外债收入，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五十二亿九千四百万元，只占同一时期财政收入总数一千七百三十六亿元的百分之三点零五。这就是说，百分之九十六点九五的资金，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第二个五年期间，我国的财政，已经没有新的外债收入，而只有偿还外债的支出。自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五十七亿四千三百万元。到一九六二年底，我们已经偿还了五十二亿八千九百万元，只剩

下四亿五千四百万元，将按照协定在一九六五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内债方面，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国家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应付利息共为四十八亿二千亿元，到一九六二年底，已经偿还了二十七亿零二百万元，还有二十一亿一千八百万元，将按照原来的规定，到一九六八年分年还完。

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直接增加人民的负担，并且根据农业受灾后的实际情况，还降低了农民的税收负担。国家决定，一九六一年农业税征收任务，包括正税和附加在内，折合细粮计算，降低为二百三十六亿斤，并且按照这个水平，实行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的政策，三年期满以后，再根据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适当调整农民负担。这个征收任务比第一个五年每年平均的三百七十三亿斤，减少一百三十七亿斤。在实际执行中，扣除了因灾减免的税额，一九六一年实际征收二百一十亿斤，一九六二年实际征收二百二十二亿斤，都比原定的二百三十六亿斤的征收任务还低。在减少农业税征收额的同时，国家又减少了粮食统购的数量。这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还要说到，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保证粮食、棉布、蔬菜、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零售价格的稳定，同时，适当提高粮食、油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的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比一九六〇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点三；油料的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九。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民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增加的收益，共约六十四亿元左右。尽管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粮食销售价格仍然保持不动，因此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两年共达五十三亿五千万元。这实际上是国家对城市职工、经济作物区的农民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的一种生活补贴。这样的事，在旧中

国、在旧社会是根本不能设想的。广大劳动人民亲眼看到，国家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可能地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保证了计划价格的基本稳定。

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十三亿七千三百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二十三亿六千二百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十八亿六千六百万元；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四亿九千六百万元。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正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这种国际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支援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也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援。

对于克服暂时的财政困难、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物价、促进经济好转来说，以下几条措施，是收到了显著效果的。（一）提高了国家预算中支援农业拨款的比重，增加了农业贷款的数额，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二）根据国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调整职工的计划，减少了基本建设投资，减少了一部分多余的职工，努力提高投资效果和劳动生产率。（三）大力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大量减少了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企业单位向市场购买消费品的资金。（四）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银行工作和加强财政工作的两个决定，严格了财政金融的管理，加强了财政金融的集中统一，扭转了一度发生的资金分散和浪费现象。

(五)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努力减少亏损,增加盈利,增加财政收入。(六)在保证主要消费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在保证平价定量供应的前提下,对少数几种商品暂时实行了高价出售的办法。但这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现在一部分高价商品已经降低了价格,一部分高价商品已经改为平价供应。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财政支出大于收入、货币投放大于回笼的情况,做到了财政收入大于支出、货币回笼大于投放。我们已经基本上改变了市场供应紧张、集市贸易价格上涨的情况,市场供应日趋缓和,集市贸易价格逐步回落。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经过第二个五年的努力,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加强大了。自力更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主席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着我国大片神圣领土的时候,就曾经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革命斗争中,我们遵循着这个方针,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遵循着这个方针,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胜利。不论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封锁禁运,不论是现代修正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压力,这些都只能更加激发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决心,决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能够以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最伟大的保证。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前三年的大发展,后两年的经济调整,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这几年的实

践，总路线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实现这条总路线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具体政策，逐步制定出来了。农村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了。只要我们兢兢业业，继续努力，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的道路前进，一定可以争取在一个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

二、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

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是在国民经济逐步好转的情况下编制和执行的，是在各地区各部门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下编制和执行的。国家预算的顺利执行，又促进了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

一九六三年的国家预算，是根据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精神编制的。预算执行的结果，收入和支出都将有所超过，并且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市场货币流通量也可以进一步有所减少。

一九六三年预算同一九六二年决算比较，收入和支出都有相当的增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国营企业收入增加了，农民负担仍然是稳定的；支出的增长，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和支援农业资金等生产性开支增加了，非生产性开支是增加得很少的。这些情况表明：前几年由于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财政收入和生产性开支暂时下降的局面，已经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扭转过来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和生产性开支的增长，是财政情况好转的两个重要标志，也是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在财政上的反映。

由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十一月份召开，因此，这次会议上，我们把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情况，一并向大会报告。

关于预算收入：一九六三年预算收入三百二十七亿元，预计完成三百四十亿元左右，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四左右，比上年决算增长百分之八点五左右。其中：企业收入一百七十二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八；各项税收一百六十三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其他收入三亿九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点三。

一九六三年预算收入同一九六二年决算比较，国营企业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七。其中：工业企业收入，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商业企业收入，由于高价商品收入下降和部分物价降低，比上年减少百分之三十点六。物价的降低，使国家减少了收入，但却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好处。一九六三年的农业税负担，仍然稳定在一九六一年的征收水平上，没有增加。

关于预算支出：一九六三年预算支出三百二十七亿元，预计完成三百三十八亿元左右，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三点四左右，比上年决算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经济建设费一百五十二亿八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一；社会文教科学费五十七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三；国防费六十四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四；行政管理费二十三亿二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四；偿还债务支出六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百；对外援助支出九亿六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增拨银行信贷资金二十亿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百；其他支出三亿九千万万元，相当于预算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点

一。在以上预计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计八十二亿元，相当于预算数七十七亿一千万元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四。

一九六三年预算支出同一九六二年决算比较，各项生产性的支出都有了较多的增长。支援农业的资金增长百分之四十三，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企业的“四项费用”（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增长百分之九点三。其他各项支出，有的稍有增长，有的基本保持上年的水平。

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收入可以超过原定预算，我们有计划地陆续追加了一部分生产建设支出。以后，由于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追加了一部分救灾支出；又由于社会主义古巴遭受了飓风的袭击，追加了一部分对外援助支出。一九六三年预计超收的十三亿元，连同年初所列的预备费十亿五千五百万元，合计二十三亿五千五百万元，用来追加了下列支出：基本建设投资七亿五千万元，企业流动资金七亿五千万元，企业“四项费用”一亿元，农林水利和其他经济部门事业费二亿五千五百万元，救灾费四亿元，对外援助支出一亿元。

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收支相抵，收入大于支出，预计可以结余二亿元左右。

一九六三年，除了财政拨款以外，国家通过银行对农业、工业和商业发放的贷款，也比上年有了较大的增加。根据预计执行数字，按年底余额计算，农业贷款增加十亿元，工业贷款增加二亿元，商业贷款增加十三亿元。这些贷款的发放，有力地支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一九六三年工商企业的库存比上年有所增加，过去几年减少了的若干商品库存有所补充。尽管各项贷款比上年有了较多的增加，但是由

于年初预算中列有一笔增拨给银行的信贷资金，由于预算执行的结果收入大于支出，也由于人民储蓄有了相当的增加，一九六三年信贷收入仍然大于信贷支出，可以做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总起来说，一九六三年国家财政金融的情况是良好的，情况的好转，比人们的预料，还来得快一些，好一些。

一九六三年的市场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今年以来，商品供应是增加的，商品价格是下降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肉、禽、蛋、蔬菜、水果的供应比以前多起来了；许多日用工业品的品种和数量也有了不小的增加，许多商品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居民购买商品，凭票凭证的部分减少了，自由选购的部分增加了。当然，为了合理地进行分配，对粮食、棉布等少数商品继续实行凭票凭证、按计划供应的办法，还是必要的。由于生产发展、收入增加、货币回笼，今年以来集市贸易价格是节节下落的，若干商品的计划价格也陆续调整降低。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今年九月份的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十二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六左右。蔬菜、水产品、蛋品、干鲜果、罐头、酒类、收音机、塑料制品、若干西药，以及若干农业机械和中小农具，价格都降低了。国家还决定，从今年八月份起，由国家拿出十一亿元，主要用于职工升级转正、改进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由于物价的降低和工资的调整，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今年以来，城镇人民在人民银行的储蓄，预计大约比上年增加三亿多元，农村人民在信用合作社的储蓄也有所增加。当然，目前我们的生产水平，特别是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水平还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还有相当距离。我们还需要集中力量，采取措施，作进一步的努力。

一九六三年财政金融工作的胜利，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和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五反”运动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在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的基础上取得的。

一九六三年春季以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广大农村，逐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以及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四清”工作。在县级以上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中，广泛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是一场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猖狂进攻的斗争，是一次全民的深刻的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包括阶级斗争的问题，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还包括进一步学会管理企业和事业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的胜利进行，不仅对于实现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后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三年国营企业的“五反”运动，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根据预计数字，一九六三年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将比上年降低百分之七点九，商业企业的商品流通费用将比上年降低百分之十点九。在工厂、矿山、农场、商店中，经济核算的观念加强了，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了。应当说，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工业部门、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在减少商品流转环节、

降低商品损耗、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都是下了功夫，收到了成效的。各部门在学会管理企业、学会做生意方面又前进了一步，这是一九六三年财政收入超过原定预算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六三年财政金融工作的胜利，归根到底，来自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六三年的工业生产是稳步上升的。工业生产预计可以超额完成今年的计划，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九。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大部分产品的品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今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局部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国家的大力支援，全国总的说来还是增产的。预计农业总产值可以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点八。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棉花、烤烟、麻类、糖料、茶叶、蚕茧等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的产量增加得更多一些，家畜和家禽发展得很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充裕了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来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近年来国民经济各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促进了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发展了，农业为工业和城市提供的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增多了，农业对工业品和其他方面的需求提高了，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市场的好转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完全正确的方针，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必须继续遵循和执行这条方针。

所有以上事实说明：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的领导下，已经赢得了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胜利。目前，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还低，基础工业还比较薄弱，许多企业的设备需要配套、维修和更新，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各方面还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在经济生活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为了使我国国民经济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我国人民应当进一步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增加积累，增加收入，为争取国民经济进一步的全面好转，为给第三个五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而奋斗。

三、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的初步安排

根据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预计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一九六四年国家财政情况的趋势肯定是：财政收入将比一九六三年继续上升，国家投入生产建设的资金将比一九六三年有较多的增加，财政收支将继续保持平衡。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好转，国家财政将进一步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

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各项指标刚刚下达，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草案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编成。目前只能向大会简要地报告一九六四年预算收支的大体轮廓和一些主要指标。建议大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编成以后，对正式编成的预算草案，

连同一九六三年国家决算，一并审查批准。

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的要求，以及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要求，一九六四年的国家财政，应当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增加收入，扩大积累；有计划地支援农业，巩固集体经济，加强基础工业，巩固国防；同时，必须继续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有重点地节约地使用资金，坚持当年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保持市场物价的继续稳定，争取国民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全面好转。

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根据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和挖掘潜力的可能，初步估算，收入和支出将达到三百八十亿元左右，或者略多一点，收支是平衡的。这个预算指标同一九六三年的预算数三百二十七亿元比较，收入和支出各增加五十三亿元左右，即增长百分之十六左右；同一九六三年预计执行数三百四十亿元比较，收入和支出各增加四十亿元左右，即增长百分之十二左右。

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收入指标是打得积极的，经过艰苦的工作是能够实现的。

一九六四年预算收入指标所以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因为一九六四年有以下增加收入的有利条件：第一，按照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安排，农业总产值将比上年计划数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计划数增长百分之十二左右。这个计划指标在执行中，经过努力是可能超过的。第二，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的潜力还很大。一九六四年计划要求，工业生产成本降低百分之七左右，商品流通费用

降低百分之六点五左右。根据计算，工业生产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就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五亿多元；商品流通费用每降低百分之一，就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一亿多元。这方面加强工作，挖掘潜力，是大有可为的。第三，更重要的是，一九六四年将进一步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五反”运动。政治是经济工作的统帅和灵魂。这些运动的开展，将进一步提高城乡人民的阶级觉悟和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将进一步改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将进一步巩固，各行各业的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将进一步蓬勃发展。这是实现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最重要的条件。应当说，如果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一九六四年的预算收入指标是可以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的。

一九六四年预算收入指标，所以说要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预算收入比上年预算数增长百分之十六，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幅度，这个幅度比农业增长百分之十和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二的幅度都要大一些；而且因为一九六四年还有以下三个减少收入的因素，需要更多地挖掘潜力，增加收入，来加以弥补。这三个因素是：第一，一九六三年调整工资是从八月份算起的，增加的工资只支付了五个月，而一九六四年，这部分增加的工资要全年支付。一九六四年工资总额将比一九六三年增加十六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增加的部分是十三亿元。企业职工工资的增加，将提高企业的成本，减少企业的利润。第二，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国家降低的某些商品的零售价格，在当年只影响几个月的收入，到一九六四年将影响全年的收入。在市场继续好转的情况下，高价商品收入也要继续减少。初步估计，一九六四年因为价格因素要减少财政收入近十

亿元。第三，为了加强机器设备的维修，国家决定，一九六四年适当提高国营工业、铁道、交通企业的大修理基金的提取数额，一九六四年提取的大修理基金将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五亿多元。增加这部分大修理基金，将要相应地减少企业的利润。以上三笔共计减少收入二十八亿元左右，需要另外增加收入来弥补。因此，一九六四年要达到三百八十亿元的收入指标，从对实际工作的要求来说，不是增加五十三亿元，而是增加八十一亿元。应当说，完成这样的增加收入的任务，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一九六四年的预算支出将怎样分配呢？一九六四年预算资金增加的部分，打算用来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支出：（一）经济建设费增加五十亿元左右，比上年预算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左右；（二）社会文教科学费增加八亿元左右，比上年预算增长百分之十四左右；（三）国防费增加八亿元左右，比上年预算增长百分之十三左右。用来增加支出的资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比上年预算增加五十三亿元；二是由于市场货币流通日趋正常，增拨银行信贷资金的数额，可以比上年减少十多亿元，这笔钱可以腾出来增加其他方面的支出。

一九六四年增加的各项预算支出中，用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的部分是三十亿元左右，比上年预算数增长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数，一九六四年将增加到一百零八亿元左右。

一九六四年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初步安排为六十六亿元左右。国家财政拨款总数是增加的。在资金分配上，打算增加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和化肥工业建设的投资，减少一些分散使用、效果不大的投资。考虑到一九六四年农业增产、生产队收入增加的情况，农业贷款增加的数额将比今年增加的数额有所减少。

上述一九六四年预算支出的初步安排，是符合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的，是力求照顾了各方面的需要的。当然，收入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资金的使用上，我们仍然需要实行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需要着重解决那些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问题，而不能百事俱举、分散资金。不能认为，形势好转了，收入增加了，就可以不必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了，就可以不必厉行节约、加强管理了。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这里还要说到，我国欠苏联的借款和应付利息，到一九六二年年底，还剩下四亿五千四百万元，一九六三年又偿还了二亿八千七百万元，一九六四年计划再偿还九千六百万元。剩下的只有七千一百万元，将按照协定在一九六五年全部还完。国内公债和应付利息，到一九六二年年底，还剩下二十一亿一千八百万元，一九六三年又偿还了三亿六千三百万元，一九六四年计划再偿还四亿零四百万元。剩下十三亿五千一百万元，将按照原来的规定分年归还。

以上是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的一个大体轮廓。预算草案正式编成以后，收支数字还会有某些调整。但是总的趋势是可以肯定的。一九六四年的国家预算，将是一个积极挖掘潜力，增加积累，收入和支出都继续增长的预算；是一个积极支援农业，扩大基本建设，全力支持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好转的预算；也是一个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建国，既积极又可靠的预算。

四、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 圆满地实现国家预算而奋斗

各位代表！圆满地实现国家预算是全国人民一项重大的

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实现国家预算，这就是要按照国家的政策，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积累建设资金，并且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这些资金。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没有大量的建设资金是不可能的。资金的合理积累是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我国积累资金的根本道路，是增产节约，自力更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也根本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依靠对外的掠夺和对内的剥削来积累资金。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我们从来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支援，共同发展；我们从来没有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施舍和恩赐。我们有广大富饶的国土，有将近七亿具有勤劳节约传统的人民，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双手进行辛勤的劳动，积累资金，建设祖国。我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志气。

全国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各单位，要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实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毛泽东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社会主义企业的积累，是国家资金积累的基本源泉。勤俭办企业，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一个单纯的经营管理问题；而是一个方针问题，一个政治方向问题。铺张浪费，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是一切没落的腐朽的剥削阶级的特点。而克勤克俭，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则是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是无产阶级的美德，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兴盛繁荣的重要保证，

是革命和建设前途的希望所在。执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要广泛地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落后”的劳动竞赛，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把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本领学到手。执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要把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结合起来，把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同严格的经济核算结合起来，把解决重大关键问题同点滴节约聚少成多结合起来。北京墨水厂，从每件包装材料节约一厘钱入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全厂由亏损转为赢利。这种节约一厘钱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千千万万企业的积极响应。上海打包工人彭昌宗，从节约几厘米麻布入手，坚持不懈地提出建议，经过采纳和推广，仅仅两个月就节约了上万米麻布。这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责任感，这种为了挖掘潜力、反对浪费而坚持斗争的高贵品质，引起了全国劳动人民的赞赏和学习。我们要在一切企业、一切单位中，大大推广这样一些群众自己创造的光辉范例，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在一切基本建设单位中，在一切农林水利、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事业单位中，在一切国防和行政管理部门中，都必须继续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注意节约，在经济好转的情况下也要注意节约；增加收入要依靠节约，减少支出也要依靠节约。我们的事业规模大了，单位多了，可以节约的方面很多。节约是我们的长期方针。要贯彻到各个方面，长期坚持下去。

增产节约运动必须紧紧地围绕着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一目标来进行。社会主义企业既要完成和超额完成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计划，又要完成成本、资金和利润计划。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利润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社会主义利润是劳动者为社会公共需

要而创造的财富，这部分财富以利润的形式上交国家，用来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用来发展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用来保卫人民的革命果实和劳动果实，用来维持人民民主专政的行政开支。所有这些，都是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资本主义是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下，通过市场的盲目竞争，通过加深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来取得利润。社会主义则要求企业在严格服从国家政策和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服从国家调拨分配和按照计划价格出售产品的条件下，通过改善经营管理、革新技术、降低成本、降低费用等办法来取得利润。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者明确地认识到：只要我们遵循正当的途径，采取正当的方法，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创造更多的利润，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增加更多的积累，这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经营思想，而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

合理地增加积累必须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我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解放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已经永远摆脱了旧中国那种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地。将来我国人民的生活肯定还会更好。但是，目前我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而且生活改善的速度应当低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以便增加积累，建设祖国。在规定工资政策、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和有关措施的时候，既要考虑到人民的消费，又要考虑到国家的积累，既要考虑到眼前的局部利益，又要考虑到长远的根本利益。

进一步做好财政银行工作，加强财政和信贷管理，是推动增产节约运动，防止浪费资金的一个重要条件。近两年来，财政信贷管理工作是不断加强的。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加强银行工作和加强财政工作的两个决定，应当继续坚持执行。同时，应当根据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精神，根据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健全财政金融的各项规章制度，使财政银行工作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

各级财政部门要协同企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合理加速资金周转，积极提高赢利水平，消除一切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发生的亏损，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切实做好国营企业利润监缴和税款征收工作。适应明年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较多的情况，财政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监督，坚持按计划、按程序、按预算、按工程进度拨款，防止不按计划和不按制度办事的现象。财务会计人员要认真执行国务院颁发的《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财政部门要严格财政纪律，同一切铺张浪费现象作斗争。

各级银行要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和信贷监督。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资金活动的中心和枢纽。通过银行，可以全面地反映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和现金收支状况，可以及时地看出这些单位是否按计划办事、按制度办事，从而加强对他们的监督。近两年来，银行在促进经济调整和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方面的作用，在调节市场货币流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银行是国家手中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今后还要继续向各方面说明银行的重要作用，继续加强银行的工作。

大大加强农业资金的管理，是当前财政信贷管理上的一个迫切的课题。国家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资金为数很大。这些资金，有国家直接兴办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和拖拉机站的投资；有国家用于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的研究推广等事业方面的

资金；有国家对人民公社的投资和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支援农业资金的门类复杂、渠道较多、地区分散，需要花很大的力量，进行细致的管理工作。为了加强农业资金的管理，最近已经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专门负责农业资金的拨款监督和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各级政府要很好地运用农业银行这个机构，结合有关部门的力量，切实把农业资金管好用好，务使国家拨出的这一项巨大的资金，每一元钱都能够用得合理，用得恰当。要努力做到统筹安排，重点使用，合理分配，不误农时，并且使资金和物资很好地结合起来，防止分配不合理、发放不及时和资金同物资脱节等不合理的现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有力助手，应当切实整顿和加强，以便有效地帮助农民解决生活和副业生产上资金周转的困难，防止和打击高利贷活动。

在加强国家财政支援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人民公社本身的潜力。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所需要的资金，主要应当依靠社队自己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增加积累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要很好地帮助人民公社生产队精打细算，勤俭经营，自己积累资金。

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是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强大动力，也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要全面地认真地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在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同时，决不能忽视阶级斗争。必须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劳动人民，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今年以来，通过工厂史、公社史、劳动人民家史的回

忆和新旧社会对比等方式，提高了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中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一部分农村和大部分城市，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开始成为制度。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生产战线和思想战线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各种反革命势力的复辟活动被粉碎了，各种歪风邪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们还须要继续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这一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下去。这是一次重新教育干部、教育人民的伟大运动，它对于巩固党和政府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保证我们的国家现在和将来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意义。

各位代表！我们为在近七亿人口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伟大的任务。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依靠全世界人民的团结，我们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必将继续克服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取得更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必兴，帝国主义必亡，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决定了的。不管经过怎样的曲折和困难，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我们深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侨胞，团结一致，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旗帜，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实现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全

面好转，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大的胜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二辑
《国家预算决算》（一九五〇——一九八一）刊印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

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1〕。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2〕。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

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3〕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4〕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5〕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6〕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7〕。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8〕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9〕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10〕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11〕。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12〕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

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13〕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14〕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15〕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16〕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17〕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18〕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19〕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

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技。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

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〇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做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

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

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20〕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21〕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22〕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

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至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

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23〕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24〕。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25〕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

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26〕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27〕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28〕。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什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 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

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鲁晓夫说过，“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

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

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

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做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

事。”〔29〕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30〕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31〕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

“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32〕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33〕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34〕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35〕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36〕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37〕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但是，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

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

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0页。

〔2〕《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8页。

〔3〕《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

〔4〕考茨基：《民族问题》。

〔5〕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6〕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7〕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2卷。

〔8〕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9〕《社会党国际一九一九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10〕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11〕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12〕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13〕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2卷。

〔14〕考茨基：《再论裁军》。

〔15〕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16〕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17〕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18〕《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7页。

〔19〕《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

〔20〕《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页。

〔21〕《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22〕《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五页。

〔2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3版，第27页。

〔24〕《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4—75页。

〔25〕《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26〕《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8页。

〔27〕《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页。

〔28〕《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5页。

〔29〕《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

〔30〕《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

1126页。

〔31〕《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

〔32〕《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33〕《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3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35〕《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3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37〕见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加强基本建设的拨款监督，是多快好省地完成基本建设计划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贯彻执行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两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加强了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建设银行也加强了拨款监督，投资的效果有所提高。但是，目前基本建设的工程造价，仍然偏高。基本建设单位积压着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尚须积极地进行处理。在一些建设单位中，仍然不断发生乱搞计划外工程、擅自提高建筑标准等不执行计划和制度的情况，分散和浪费了国家资金。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随着生产的发展，今后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将逐年有所增加。为了使基本建设严格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效果，防止分散和浪费资金的现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在继续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设计管理和施工管理的同时，有必要切实加强建设银行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基本建设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现在特作如下指示：

一、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程序监督拨款。各部门和各建设单位，必须在国家确定的投资指标范围内和批准的设计，合理安排投资，不准分散使用资金，不准故意留投资缺口，不准进行计划外工程。建设银行必须督促建设单位落实

投资，加强监督。要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计划拨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拨款，严格按照国家批准的预算拨款，严格按照工程进度拨款。建设银行发现有不执行国家计划、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突破预算指标、虚报工程进度的，应当随时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加以劝阻。劝阻无效的，建设银行有权拒绝拨款。如果因此而影响工程的进行，概由建设单位自行负责。

二、必须认真审查基本建设预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各个设计部门必须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在设计任务书批准的投资总额范围内，正确地编制基本建设预算。建设银行必须协同建设单位、建筑安装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人工、材料的消耗定额和费用标准，审查基本建设预算，核实工程造价，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建设工程的全部造价，不得超过国家批准的投资总额。民用建筑的造价，不得超过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一切不必要的装饰，必须坚决核减；一切铺张浪费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对于任意提高工程造价的，建设银行有权拒绝拨款。

为了便于正确地编制基本建设预算，计划部门和建设部门必须对现行的预算定额、费用标准、材料预算价格等，切实进行审查修订。建设银行应当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三、必须加强基本建设储备资金的管理，充分动员内部资源。对建设部门和建设单位储备材料、设备所需要的资金，要实行定额管理。超过定额的部分，必须积极动员处理。库存的设备和材料，凡是可以利用的，要设法组织利用。国家规定的动员内部资源指标，各地区、各部门和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动员出来的资金，一律抵充预算拨款，不准挪作计划外工程和其他开支。

建设单位需要储备的设备，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计划和

设计文件，编制设备定货计划，签订订货合同。在设计文件没有批准以前，建设单位不准订货，计划部门不准安排生产，物资供应部门不准供应设备，建设银行不准拨付资金。个别工程紧急，需要在设计文件批准以前进行准备工作的，经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根据设计部门提出的设备清单，办理设备订货，拨付到货款项。建设银行必须审查建设单位的设备定货计划和订货合同，制止盲目订货，防止积压浪费。对于建设单位在计划以外订购的设备，建设银行不得拨款。

四、必须进一步加强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严格执行财政制度。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必须结合改善经营管理和建立责任制，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加强经济核算，降低工程成本，节约使用资金。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必须健全财会机构，充实财会人员，保证有人记账、算账、对账、报账，做到按月报送会计报表和统计报表，反映工程进度情况和资金运用情况。建设银行对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提交的这些报表，必须认真进行审查，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意见，督促他们纠正。建设单位在年度终了以后，必须向建设银行提交财务决算；工程竣工以后，必须及时验收，及时办理竣工决算。建设银行要严格审查财务决算和竣工决算。如果发现违反计划、违反制度、超过标准的开支，应当签具意见，报告财政部门处理。

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应当上缴的利润、折旧和其他收入，必须通过建设银行及时上缴国家财政，不准欠缴或者挪用。建设银行必须切实做好监缴工作。

五、必须严格执行结算纪律。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的一切经济往来，都必须通过建设银行办理结算。建筑安装工程，必须根据包工合同，按月验工结算。结算的工程数量，不

得超过实际完成的数量；结算的价值，不得超过基本建设预算。设备和材料到货，应当根据订货合同，及时结算付款，不准拖欠。建设单位和建筑安装企业无故拒绝付款的，建设银行有权从他们的存款中扣款清偿。建设单位订购设备，除了按照规定可以分次付款的以外，一律不准预付定金。过去已经预付的，必须限期清理收回。

六、必须加强建设银行机构。目前建设银行的机构，同加强拨款监督的要求很不适应。有不少大中型建设项目的所在地，至今还没有设立建设银行机构，以致拨款监督工作无人负责。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现在决定，建设银行的人员编制增加五千人。新增加的这部分编制，首先在一九六二年中央批准财政系统增加的编制总数内调剂解决，所需干部由地方负责配备。今后建设银行的机构设置，必须服从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哪里有建设任务，就在哪里设立机构，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所有的大中型项目所在地和建设任务集中的地点，都必须设立建设银行。对于跨省、跨专区施工的铁道、森工、水利等工程，应当设立专业分（支）行，以便跨省、跨专区办理拨款监督。为了使建设银行的机构设置同建设项目的分布相适应，今后建设银行的人员划为专业编制，随着大中型建设项目完成和增减情况，由建设银行总行统一管理和调配。各级建设银行应当实行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在业务上受上级行的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设银行，还应当同时受当地财政厅、局的领导。

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很重。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要切实加强领导，督促建设银行做好工作。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同建设银行密切协作，共同管好基本建设资金。各级建设银行要经常向党政领导反映情

况，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工作。为了健全基本建设拨款工作的基本制度，责成财政部迅速制定基本建设拨款办法，报国务院批准颁发。

本指示发到县级党委和县级人民委员会，传达到建设单位、建筑安装企业、设计部门的一切有关人员和财政银行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中国科学院：

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报告中所提出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方针、做法和对实现规划的意见，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要求的。各部门、各地方应该认真贯彻执行。

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中农业科学技术部分，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中央和国务院批转谭震林、聂荣臻同志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时，已经下达。其他各专业、各学科的十年规划，责成国家科委下达。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规划及所需人力物力条件，则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科委审查平衡后，在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逐年予以安排。国家科委应会同有关部、委，组织实现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各项问题。

现在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的报告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纲要和规划由国家科委下达。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 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主席、中央：

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现已编制完毕。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的情况，加以发展而制订的。规划的制订，实行了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直接参与制订规划的科学技术专家约一万多人，许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的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了材料和意见，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分别主持了各专业规划的编制工作。

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分为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等部分（不包括国防科学技术系统的规划），同时还编了重点项目的规划。这些规划已经分别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审议同意。在此基础上，综合编制了规划纲要和事业发展规划。整个规划的方针、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和措施，都已综合写在这两个文件上面，特报请审查。

一、执行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成绩显著

在这次制订规划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检查了我国科学技

术工作的现况。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到一九六二年底，已经执行了七年。检查结果，在十二年规划的五十四项任务中（另有三项是国防科学技术、喷气技术和原子能利用，不计在内），有四十六项任务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原规划一九六二年的目标；有一项任务，是规定基础科学主要发展方向的，不能按具体目标检查，但是这方面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其余还有七项任务进行了大量工作，但尚未达到原定目标。

应当说明，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随着国家建设需要和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在执行规划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因此，按整个研究工作的规模来说，和原规划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底以前应做的工作比较，不是做得更少，而是更多。这在发展某些现代工业技术和尖端技术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为着配合原子能、喷气技术和若干工业新技术的发展，在新型材料、精密与重型设备、计算技术的研究试制等方面，工作的规模与工作的质量都超出了原规划的要求。为工农业生产建设，特别是为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提供依据的我国边沿地区的综合考察工作，成绩也比较显著。

七年来，科学技术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六二年底，全国科学研究机构由三百八十一一个增加到一千二百九十六个，在主要的学科和技术领域内，几乎都已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从一万八千人增加到六万八千人，其中大学毕业程度的五万五千人。

一九五六年主席和中央提出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宏伟目标，一九五八年又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根据这些指示，我们用大跃进的精神来办科学技术，现在看来，这的确使我们争取了几年的时间，初步打下了自力更生

地发展我国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基础。这样，在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时，我们才能够比较快地运用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把许多本来要依靠苏联帮助才能进行的经济和国防的生产建设工作，独立地继续做下去。经过最近一段时期的调整、巩固，科学技术事业走上了更加健全发展的轨道。

二、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与国家建设需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差距尚大

现在我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呢？经过反复讨论，各方面的专家和各部门的同志大多数认为：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已经大体上达到世界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四十年代的水平。但是，应该看到，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经历了巨大的飞跃，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国科学技术的现有水平，同我国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需要相比，同国际上六十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例如：

（一）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差距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工作的现况，还远不能适应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许多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也还没有掌握。几年来，为了改变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广阔国土没有充分合理利用的情况，虽然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是还缺乏综合性的研究。全面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对发展畜牧业、改良草原，研究得尤其不够。对南方红壤丘陵地区的土壤改良、黄淮海平原盐碱化治理以及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等，也未研究出一套综合技术措施。农业区划、区域性耕作制度、区域性综合治理方案等工作，还远不能适应生产

建设的要求。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方面，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在有关支援农业的工业生产中，还有不少技术没有过关。现在，真正过了关的拖拉机，只有东方红五十四一种。现有的机引农具品种，还不能满足需要的十分之一。化肥品种不齐，肥效不高，而成本却相当高。农药的基本品种，国外常见的约一百种，我国经常生产的不到二十种。

（二）工业科学技术方面，总的说来，还处于工业先进国家四十年代前后的水平（也有些工业技术处于五十年代的水平，有些则仍是三十年代的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大体落后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出现了大量的新技术，包括新装备、新工艺、新原料、新材料。这些新兴技术，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像石油化学工业、合成材料工业、电子工业、仪器仪表工业、稀有金属工业等，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工业部门。而我们在这些方面，大都还处在实验室或者中间试验阶段。现在已有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也比较低，工厂的建设投资、品种、质量、生产成本、劳动效率、耗用原料材料等技术经济指标，都比较落后。工业技术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金属材料尚不能完全立足于国内。大约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金属材料品种，主要是耐腐蚀、耐高温、高强度等特殊性能的合金材料，特厚、特薄、特宽、特细、异型等特殊规格的材料，尚不能全部解决。常用的钢材，质量规格也不能满足要求。在炼钢技术上，氧气转炉炼钢，投资省、建设快、成本低、少用废钢，已经成为现代炼钢工业技术革新的重要方向；在平炉上采用氧气，也可以大大提高炼钢效率。日本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一年五年间，钢产量每年平均增加三百四十万吨，其中由于采用氧气炼钢而增加的占百分之

六十八。而我国的氧气炼钢却还处于试验阶段。

有色稀有金属，更是当前突出的薄弱环节。我国有色稀有金属的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但又有不少中、低品位矿或难选矿，由于选矿和冶炼技术没有解决，不能加以利用。一些复杂共生矿，如云南锡矿、包头稀土矿等，其中有些宝贵的成分，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有色金属合金，除常用的铜合金和铝合金外，品种欠缺较多，由于加工技术的薄弱，规格更不齐全。稀有金属在国外已有相当规模的工业生产，而我国基本上还处在中间试验阶段。

合成材料工业还未建立起来。目前，世界上已经工业化生产的常用的合成纤维已有十多种，按我国需要，至少要有五六种，而我们目前生产的只有一种，而且技术尚未完全过关。塑料、合成树脂、合成橡胶的情况，也大体相仿。制造合成材料用的原料，国外主要是从石油、天然气中取得，这是最经济的方法，如一九六〇年美国全部有机合成材料产品中，百分之八十来自石油化学工业，日本也达百分之五十三。而我国大部分还来自煤化学工业或乙炔化学工业，一部分还用粮食做原料。

燃料动力的构成不合理，技术比较落后。工业先进国家的燃料消耗，石油、天然气的比重，一般占二分之一左右，个别的高达三分之二，而我国百分之九十还靠煤和木材。我国陆地和浅海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是丰富的，但勘探和开采技术跟不上。若干炼油的新技术还未掌握。经济和国防需用的石油产品，有少数高级的还不能生产。煤炭大部分直接烧掉，热效率低，回收的化工产品很少。我国有极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已经开发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

机械设备品种不足，水平不高。各部门近期需要约两万多

种基本型号的机械产品，能生产的只有三分之一强。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许多设备还不能成套供应。现有产品的质量不够稳定，技术经济指标低。许多先进的机械工艺还未很好地掌握、推广。重型、精密的机械设备尤其不足。如发展新型材料急需的十种轧制和锻压的重型设备，还在设计。精密机床，在五十六种基本型产品中，已试制出来的，不到四分之一。化工、石油等重要的设备，我们的设计、制造技术力量比较薄弱。

无线电电子技术和仪器仪表的薄弱情况，十分显著。一九五八年美国生产的晶体管型号已达一千种以上，电子管的基本品种有三千种左右，而我国目前只能生产八种晶体管和二百十六种电子管。通用电子计算机，几个先进国家已投入运行的近二万台（其中美国约一万五千台，苏联约一千台），而我国已运行的还不过十台。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国外最高已达每秒百万次，而我国已生产的还只有一万次，正在试制调整五万次的。仪器仪表品种，近几年内至少需要四千种，而目前能生产的不过八百种。而且短缺的品种，大多技术上要求严格，材料、设计、工艺等问题，都需要很大努力才能解决。

工业各部门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还很低。反映在劳动生产率上，比工业先进国家水平，一般相差好几倍，而且劳动强度大，不安全。如煤炭，我国每个工人的日平均产量为零点七三六吨，而国外主要产煤国家平均为三点七吨以上，其中，美国已达到十四点七吨。至于建筑、矿山采掘、公路、铁路、装卸搬运等繁重体力劳动的机械化程度更低，仅装卸搬运一项，占用的强劳动力在百万人以上。我国建设的新工厂，由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低和没有采用新的工艺过程，因而和国外水平较高的工厂比较，投资、占地面积、职工人数等指标，往往都大一倍甚至还多。

此外，对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调查、勘察、利用和保护，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运用现代技术方法的调查、勘探工作，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三）医学科学技术方面，虽然我们在临床医学，例如外科、中西医结合治疗某些疾病以及防治主要传染病等上面，取得了某些突出的成就，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基础医学的研究工作，以及各种新药物、器械等的研究、试制工作，还比较薄弱。

（四）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除少数杰出的工作外，一般也落后二十年左右。特别是在实验装备和实验技术上面，差距较大。研究试验队伍的水平，总的来说，也比较低，而且在某些学科中，还有一些缺门。

在这次十年规划中，我们强调了有意识地从国家建设需要、世界先进水平两个方面去找差距，并以此作为确定规划任务的根据。

三、为了实现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 宏伟目标，十年内，必须先的重要和 急需的方面，赶上六十年代的水平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经过艰苦努力，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我们既要立足于现实，清醒估计各项可能条件；同时，又要高瞻远瞩，尽最大可能往前追赶，力争尽早实现这个目标。

在科学技术上赶世界先进水平，今后十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这十年内，在重要和急需的方面，赶上六十年代的

科学技术水平，并准备向七十年代的水平过渡，才能适应工农业和国防发展的要求；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在今后十年内赶上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可能的。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我们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勤劳勇敢、团结一致的广大人民群众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我国的科学技术，是一定可以高速度地前进的。

在科学技术上，还有以下几点有利于完成上述目标的条件：

第一，我们目前已经大体达到了四十年代的水平。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至多只相当先进国家三十年代初的情况。七年就大约赶上了十几年。现在基础比过去大了，又吸收了过去发展中的经验，今后十年赶国外二十年的发展，应该是可能的。

第二，在这十年内，赶六十年代水平，主要是去掌握人家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自己固然要做大量的艰苦的研究试验工作，但是毕竟比从头创造容易。按国外一般的情况，一项新技术，从开始研究到可以用于生产，大体上也只需要五年到十年时间，何况我们还有可能引进国外技术，并以国外经验为借鉴。

第三，所谓六十年代科学技术，在工业技术的研究试验方面，对我们最重要而又最急需的，就是冶金、机械、化工、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中的一批新技术，以及几项新兴工业技术（如原子能、喷气技术、石油化学、稀有金属、电子技术、仪器仪表等）。只要我们真正看准了技术关键究竟在哪里，就可

以集中力量，在主要的方面突破。日本、法国等国家在近十年来，也经历了这么一段集中力量、努力追赶的阶段，进展并不慢。我们应该努力追赶得更快一些。

第四，我国有长期积累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传统，有丰富的祖国医学遗产，这些宝贵的经验，进一步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在农业和医学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独特的成就。

在十年内赶上六十年代水平，固然有很大困难，但是如果这样赶，我们的困难就更大。这不仅表现在许多急需的新技术能否初步过关上面，也表现在如果不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不论农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就要少、慢、差、费得多（例如化肥的生产，不采用新技术，成本就比进口价格约贵一倍，大量施用就有困难）。要不要用最大的努力去赶六十年代水平，关系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关系着经济、国防实力的加强。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采取革命的、积极的态度，不应该采取保守的、犹豫的态度。

因此，在这次规划中，我们提出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整个十年规划的目标，简括为下面的七点：

（一）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

（二）重点掌握六十年代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

(三) 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初步过关;

(四) 加强资源的综合考察, 加强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研究, 为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根据;

(五) 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 作出显著成绩;

(六) 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 充实科学理论的储备, 加强科学调查和实验资料的积累, 建立和加强重要的和空白薄弱的学科;

(七) 大力培养人才, 充实现代化实验装备, 在各个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 形成研究中心, 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我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在任务的安排上, 拟着重打基础, 抓两头。一头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 一头是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要抓好这两头, 就必然首先要求工业科学技术, 特别是基础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要求基础科学中许多学科水平的迅速提高。在十年当中, 前五年着重打基础, 补全缺门, 配套成龙。这样做, 我们今后的前进, 会是最扎实、更迅速的。

四、确定重点项目,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由于我们基础薄弱, 差距较大, 全面赶上六十年代科学技术水平, 不是这个十年能够实现的。因此, 必须“有先赶, 有后赶; 有所赶, 有所不赶”。必须看准我们急需的、重要的科学技术,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九五六年制订十二年规划时, 我们曾经选定喷气技术、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技术、自动化六个新技术部门作为重点, 采取了集中力量的紧急措施。这六种新技术, 原来几乎是完全空白的, 经过几年的努

力，已经有了粗具规模的现代化试验基地和一定水平的研究队伍，作出了不少成绩。这个经验说明，正确选定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我们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方法。

在十年规划中，根据生产建设的重要问题，各学科、各专业共提出了三百七十四四个重点研究试验项目，将由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选定了国家重点项目三十二项。这是实现十年规划过程中的第一批骨干项目。拟由国家科委会同国家计委、经委、农办与有关部门、地方，在国民经济计划中逐项作出切实安排，并组织有关科学技术力量，全力以赴，务求尽早作出结果。

在这三十二个项目中，农业方面有十项。这就是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十项综合性的关键科学技术任务（已另有详细报告）。例如黄淮海平原的整体改造问题。这里有四亿亩耕地，位于我国心腹地区，但洪旱涝碱淤五害并存，年年要调进粮食，必须综合治理，找出完善有效的方案。又如，为了在机械、化肥数量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四、五、八的指标，按自然资源条件和农业区划，分片搞出切实可行的样板，以供推广，这是促进粮食增产的重大任务。大体说来，如果这十大研究试验任务都作出了切实的成果，那么，我们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方面，在治理我国农业生产上几项影响较大的不利的自然条件方面，在适应我国情况探求农业高额丰产和技术改革的途径方面，都能提出一批比较有效的、可供推广的综合技术措施。这些都是为多快好省地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准备工作。

工业、交通运输、资源勘探方面的国家重点项目十三项。主要是首先补全基础工业的技术缺门和为发展新兴工业、新兴技术准备条件。这十三项重点，是为了解决以下技术关键：

第一，发展石油化学的技术，包括：掌握以石油为原料制取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生产建设技术，建立一批样板工厂；掌握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制备合成氨，采用全循环法制取尿素的技术；掌握天然气化工利用的技术等。

第二，补全材料工业的缺门，主要是解决高温合金、高纯度稀有金属、精密合金、特殊性能的合成材料、特种硅酸盐材料、人造晶体、高能燃料、润滑剂等新型材料的品种问题；加速试制十项重型轧制、锻压设备，解决特宽、特薄、特厚、特细、异型等材料规格的问题。要努力使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国防技术所需要的材料，在技术上能够完全立足于国内。

第三，解决发展氧气转炉炼钢、真空冶炼的技术问题。

第四，解决发展高精度机械和仪器仪表工业的技术问题。主要是先掌握已经选定的五十多种基本型高精度机床和一百五十多类重要精密仪器仪表的生产技术。配合冶金、化工、石油等部门应用新技术的需要，解决高真空、深冷和大容量制氧设备等的制造技术。

第五，研究、设计、试验适合各地条件的成套的农业机械。

第六，为了满足农业机械化、交通运输技术改造和国防的需要，加强内燃机和液力传动的研究试验。

第七，尽早掌握近期需要的大约一百种晶体管、九百种电子管以及一批新型无线电元件的制造技术。系统地掌握半导体的工业生产技术，建立现代化的半导体器件样板厂。

第八，有重点地进行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的试验。

第九，加强特种资源的勘探、利用等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铬、铂、钽、铌、稀土元素、钾盐、压电石英、金刚石、云母、金红石、钴、铍等）。建立采矿学和选矿学的研究基地，

加强燃料动力资源的勘探、开发及利用的研究。

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选择了六个标志着新兴科学技术方向的项目（如光的受激发射、分子生物学等）。这些研究试验成果，在得到应用后，将会带来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的若干重大变化，我们要及早安排有关这些方面的工作。例如光受激发射，将引起国防技术、工业技术和现代物理学中多方面的重要进展，国外近两三年来开始大力发展，我们要集结力量，加紧追赶。

医学科学技术方面，列了一个国家重点项目：大力充实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医研究院两个研究中心，以便在掌握与发展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上面，在整理、发扬祖国传统医学上面，作出显著成绩。

适应工农业、国防和科学研究的急需，把全部建立二百余种计量基准、标准和统一量值传递系统的工作，作为一项国家重点项目。

为了及时地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更好地进行引进国外技术的工作，把加强国外科学技术调查研究工作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进一步改进科学技术情报工作。

这三十二个重点项目完成后，大体上说，可以在农业增产和农业技术改造方面，提供比较系统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工业方面，从技术上补上了最急需解决的若干缺口，提高基础工业的水平，并且为发展几门重要的新兴工业提供样板。同时，也开展了可能成为七十年代尖端技术的探索研究。这只是第一批国家重点项目，还不是全部的关键项目，今后十年内还要根据情况发展，看准了就再安排第二批。通过两批、三批重点项目的完成，加上与此相适应的各方面的研究试验工作，就可以使我们在重要和急需的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达到六十年代的

先进水平。

当然，在强调重点时，规划中还注意了全面安排，充实基础。必须防止对理论联系实际作狭隘的了解，防止忽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倾向，否则重点的科学技术任务还是上不去，而且对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很不利。因此，规划中既强调要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又在安排上注意积累各种基本的科学资料和实验数据，掌握最新的实验技术，进行探索性的基本科学问题的研究。在制订规划中，对于这两方面任务安排的比例和做法，争论相当热烈，经过多次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并且根据各门学科和专业的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具体的安排。比如，在基础科学的重点课题中，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课题与探索性的课题，大约是七与三之比；在技术科学和各专业规划中，这个比例约为八与二或九与一之比。科学家们认为，这样安排是适宜的。

五、为了保证实现规划，要下决心 迅速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目标是比较切实、比较先进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要用这样短的时间，来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世界上各强国现有基础比我们厚，并且都在拼命地发展科学技术；近十多年来，科学技术工作的规模愈来愈大，进度愈来愈快，从科学研究成果到生产、军事应用的周期愈来愈短。在这种情况下，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更不容易。从几年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深感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虽不神秘，也不简单。一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开会议论、停工待料当中滑

过去的。如果不能雷厉风行地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千方百计地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个规划，确实有完不成的危险。我们在战略上，固然要藐视困难，但是在战术上，一定要充分重视困难，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努力去克服困难。

在十年规划的纲要中，根据科学工作者反映的意见，在机构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保证科学研究的各项工作条件等方面，提出了十二条措施，并在事业发展规划中，对人力、物力、财力的需要，作了大致的安排。

为了使各项措施能够落实、规划能够实现，我们觉得，有七个关键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第一，把科学技术工作真正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主席把科学实验突出地提出来，把它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放在一起，作为建设我们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个伟大的号召，提高了全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认识，给科学技术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对全党来说，自然科学的实验毕竟是一项比较新的任务，关于这方面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我们要自力更生地迅速发展现代化的经济和国防事业，一定要能够独立地解决其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应该努力使它走前一步，为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做好准备。但是，在一部分干部中，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以致在具体工作中，科学技术工作往往排不上队，甚至把科学技术工作当作是“可有可无”或“远水不解近渴”的事情，没有认真去抓。科学技术工作的顺利进展，必须要有各个方面的支持。这次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是大力促进我国科学实验事业，使它更好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服务的全面规划。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干部，应该把从各方面促

进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实现，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看作是自己的一项重大责任，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面来。

第二，认真改进研究机构与各级科学技术领导机关的工作。

目前我们各级科学技术机构的组织管理工作水平，一般还比较低，存在着许多缺点和漏洞。这是实现规划中最大的问题之一。通过最近的五反运动，揭发了许多严重的官僚主义，如：解决问题很慢，任务、计划多变，力量分散，协调不够，行政管理工作紊乱，财力物力的积压浪费很大等等。再加上工作方法上，有时没有认真研究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需要，往往满足于一般化的办法，钻研业务不够，不大解决实际问题，甚至因循保守，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些都是同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要求很不相称的。

我们的物质条件，不如各工业先进国家，要比他们取得更高的速度，就更要靠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两条。现在规划已经定下来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准备花很大力量，来提高各级科学技术机构的组织管理水平，订出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切实执行。我们希望，经过两年或三年的努力，在各级科学技术工作领导机关和重点的科学研究机构内，都能有一批能够正确掌握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熟悉必要的科学与业务知识、作风较好、办事效率较高的工作骨干。

各级科学技术机构的领导干部，应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学习，参加研究试验单位的工作和生活，亲自摸透一两个典型，总结经验，并且要切实钻研业务，切实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把科学组织工作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第三，加强科学和生产的联系，缩短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

在前几年，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许多项目，采用国外设计、成套设备或根据国外技术资料仿制的办法，从设计到生产建设，很多都是照搬国外的研究试验成果。自己的研究试验成果还不多，把研究试验成果用之于生产的系统经验，也比较少。现在，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研究试验成果来解决生产建设中的技术关键，这样，在研究试验到生产建设应用的各个环节之间，就暴露出许多脱节现象。这就要求研究工作与生产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要求科学研究的选题方向，应该进一步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并应尽可能走前一步。

从科学研究到生产应用，一般需要经过中间试验（包括农业上的大田试验）、设计、试制、投入生产等环节，而且要解决相应的材料、设备、协作等问题。这个周期越短，研究成果的应用越早，生产中技术水平的提高也越快。现在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大都只做到在试验室取得成果为止，由于中间试验、设计、试制等环节的工作没有相应地配合，以致不少研究成果得不到推广应用，或者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拖得很长。试验室取得成果以后这一段工作，光靠研究机构去做，当然是不成的。生产部门一定要积极组织研究成果的中间试验、设计、试制、推广应用等工作。双方配合得好，周期可以大大缩短。目前我们有不少研究工作，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和国外的差距只是两三年，后来差距反而拉长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科学和生产的相互促进、相互支持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正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拟陆续提出中间试验、设计、试制新产品、推广研究试验成果，以及研究机构与生产单位相互衔接、相互协作等方面的具体规章制度，以便改善这种情况。

开展工厂、农场中的研究试验工作，是加强科学与生产结

合的重要途径。在工厂、农场中开展研究试验工作，可以充分利用它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和装备条件，可以更加密切结合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其研究试验成果也能够更快地应用推广，这是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为此，应该配合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发展，加强工厂、农场、农业推广示范单位中的研究试验工作，并从制度上解决研究试验的经费条件问题，以促进这些工作的开展。

第四，建立制度，切实解决科学研究、中间试验的投资、经费和器材。

科学研究和中间试验所需的投资、经费，要有固定的解决渠道，在国家预算中占比较稳定的比例。建议在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中，把科学研究（包括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中间试验的投资、经费，列为单独的一类，由国家科委审核后，经国家计委审查平衡，纳入国家计划，统一安排，实行分级管理，专款专用。这样，科学研究和中间试验的条件，才能有比较切实的保证。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科学研究和中间试验所需器材，特别是各种仪器仪表、非标准装备、试剂药剂等，问题比投资经费更复杂。由于这些东西的品种繁多，比较难于计划（不可能像工厂需要的材料那样能完全预计，而且这些科学器材又不是工业生产计划中的大宗产品），有许多还需要工业部门安排试制，目前，往往不容易排上队。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工作的进度，并且使不少研究人员常常处于“窝工”状态，或者到处为器材奔跑，感到“有劲使不上”的苦恼。这同我们要加快速度的愿望正是相反的。重点科学研究试验任务所需的经费和器材，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是很有限的。而这些科学技术问题能否迅速解决，对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影响却是很大。对科学技术部门

来说，要认真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坚决反对浪费。从总的安排来说，对于重点研究试验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必须采取坚决保证、优先解决的方针。拟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一个工业部门优先为研究试验任务提供科学器材设备的生产与分配办法，同时对国内一时还不能生产的器材，安排必要的进口、仿制，以便迅速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第五，坚决实行科学技术工作的集中领导。

在科学技术战线上，要抢时间、打硬仗，一定要有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机关。同时，我们的科学技术力量薄弱，任务很重，如果不认真反掉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不克服某些工作中存在的力量分散、行动迟缓等毛病，规划的实现是没有保证的。

几年来经验证明，凡是任务明确、力量集中的工作，都完成得较快、较好，反之，就完成得较差。过去，我们对集中这一面抓得不够，协调工作做得不够好。今后一定要根据十年规划规定的重要任务，逐项安排，进一步强调全国一盘棋，更有效地组织和运用全国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对研究机构设置、任务分工、人才和器材安排使用上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要坚决进行必要的调整。这项工作，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第六，制订使用、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具体政策，加强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目前科学技术人员的成长，总的说来，是不算快的。科学技术队伍中，中级、高级骨干严重不足，同时，又存在着对优秀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不放手使用、不积极培养的问题，还有不少浪费人才的现象。这是我们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个很大弱点。这里，不仅要解决对科学技术人才的一些认识问题，而且还必须要有一套有利于人才迅速成长的制度和办法。现在，在

科学技术人才的管理上面，具体政策还不完备；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选拔、分配、调动、考核、晋级、学术称号等，缺乏统一的系统制度；对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成果，缺乏系统的奖励办法。科学研究机构的人员编制和劳动工资，也还需要有适合科学工作特点的若干规定。我们准备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具体的政策和办法，分别专题报告。

第七，注意引进国外技术。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我们争取时间、加强自力更生的力量，具有很大作用。苏联在建设初期，从这方面得益不少。日本近十年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发展很快，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即使是目前世界上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也都互相引进先进技术，来加速自己的发展。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困难，矛盾很多，除那些特别机密的技术以外，只要我们有外汇和工作得法，大多数技术都是有可能搞得到的。配合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要求，已会同各有关部门拟订引进国外技术的计划，以便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这一工作，包括：加强国外科学技术调查研究和情报资料工作，利用贸易、文化、友好等活动开展工作；派遣有水平、政治坚强的科学技术人员出国留学、考察、实习、驻厂验货；根据我国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有选择地从国外购买必要的技术专利和设备等。建议由国家计委、科委、经委、外办、外贸等部门组织一个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引进技术方面的活动。

以上报告，请中央予以指示。这次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制订工作，虽然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复研究讨论，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与认识水平的限制，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有些专业的重点和方向还不够明确或不够准确，措施还要继续落实等等。同时，今后在生产建设中还会出现新的科学技术问

题，在研究工作中还会出现新的苗头。所有这些，均有待于在执行过程中及时调整补充。如中央在审查后同意，建议原则批准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批转给有关部门、地方。各专业、各学科的规划和重点项目，则可由国家科委会同各主管部门下达。

中央科学小组

国家科委党组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过渡计划和长远规划*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周 恩 来

我们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三年计划，叫做过渡计划，意思是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学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摸索把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过渡到以后十五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求得在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全面跃进，就必须有这三年的过渡。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开国初三年，恢复了财政经济以后，就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得不首先而且必须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当时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重要的工程项目，这对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来办事的。那时我们还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到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希望在几年内，

* 这是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部分节录。

就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摸出一个规律来，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加以大家求成心急，就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加以从一九五九年以后三年的严重灾荒，给我们在粮食和一些工业原料方面带来极大的困难。特别是苏联在一九六〇年七八月间突然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经济建设造成极大的困难。这一切，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进行这三年的调整工作。经过三年调整，我们克服了困难，开始了全面好转，打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基础。这个情况，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是今年的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1〕}中，已经提过了，我就不再讲了。

但是，这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只是初步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以争取进一步的好转。要这样做，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要总结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创造自己的经验，进行调整工作的经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需要进行全面的安排，而不是一项一项地调整；需要实行综合平衡，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且需要瞻前顾后，创造出有利于今后长期规划的条件，以便于实行全面的跃进，完成历史的任务。所以，我们提出这三年过渡时期的任务，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逐个解决，而是要全面安排。

现在，这三年的第一年已经快过完了，还剩下两年。明年的计划和预算也做了初步的安排。今后的政府工作就要抓紧这个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就是说，不单单地看到今后的两年，还要看到以后长期的规划。我们要利用这个过渡时期，进行这样的准备工作。

讲到规划，联系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目前比较突出的问

题，大概有这样十六个：

第一，农业的规划和技术措施。这是大家都注意到了的。但是，必须有全面的规划，看到农业发展的远景，适应我们人口和工业发展的要求。

第二，工业交通的布局，地质勘察规划，国防工业规划和工业体制。

第三，商业的全国布局和商业的管理体制。这个问题，现在才开始着手解决。

第四，外贸的规划。我们要实现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计划，外贸的发展需要引起更大的注意。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不能不转到国际市场上互通有无。同时，我们的外债到一九六五年就可以还完，这样，我们出口的物资就可以更多地转移到进口物资的交换上。我们的技术水平跟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工作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我们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循序渐进，来追赶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要迎头赶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样，就不得不使我们要在有利的条件下，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进口一些新的技术设备和技术资料。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现在，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民族独立国家的增加，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影响，资本主义市场缩小了，互相争夺加剧了，因此，引起西方国家对这样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市场的极大的注意。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要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进行有利的外贸活动。所以，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规划，以适应我国工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发展的要求。我们在计划报告上说，既要照顾吃、穿、用，

又要发展基础工业，还要照顾国防，突破尖端，这同外贸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在教育方面，我们对高等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也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因为我们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实现普及教育的，所以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进行职业教育。在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还需要继续提高和发展。

第六，科学规划。今年我们定出了一个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2〕}，也定出了一个农业的技术规划^{〔3〕}，现在已开始下发并开展工作。

第七，我们需要一个文化改革的规划。我们要肃清国内长期遗留下来的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和传统的、旧的、保守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就要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的新闻、广播、体育，也应该有长期的规划。

第八，卫生工作，特别是计划生育的工作，要有长期的规划。有的代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这一项规划。

第九，大中城市的建设规划。工业的发展，使我们的城市扩大了，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控制。现在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包括矿区、林区，大概有二百个左右，有七千五百万人口，我们应该对这二百个左右大中城市很好地进行规划。

第十，城市劳动力的安排和工资规划。每年我们能够增加劳动力的数目、工资增长的数目和调整的计划，应该有个规划。

第十一，我们城市的后备劳动力是超过城市劳动力安排的需要的，应该把这部分超需要的劳动力有计划地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在也正在进行规划。

第十二，我们的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农产品和工

业品相互之间的比例，还有调拨价格等等，也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第十三，我们的财政税收方面也要有一个规划，计算我们今后长期规划中需要的数目和能够积累的数目。

第十四，在金融管理和信贷计划方面，也应该有一个规划。

第十五，行政编制的规划。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辽阔，我们的行政编制、行政的层次，比中等的、小一点的国家多得多。如果在县以下还要设区的话，那么，从中央一直到生产队就有九级之多，即中央、大区、省、专区、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这就说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要贯彻到基层单位非常费事，而且常常走样。如何使我们的编制适合我们这样人口多、面积广的国家的需要，不是图案画式的千篇一律，而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实现的。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行政编制的规划。行政人员太多，就妨碍事情的深入下达和政策的正确贯彻，而且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

第十六，政府应该有一套工作制度和办事的章程。我们今年在“五反”运动的初期，曾经起草一些条例，但是，要经过各个部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试行以后，才会提炼出一些原则，制定出一套通用的条例章程出来。这件事，毛主席在去年就提醒我们了，总要有一套章程制度来工作。

这些规划，当然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一定要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具体地安排。

注 释

〔1〕指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李富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上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已收入本书第16册。

〔2〕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批示》，已收入本册。

〔3〕指一九六三年二三月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制定的《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比学赶帮，齐争上游

——论各地工业企业之间比先进、
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近来，在我国各地工业企业之间，特别是在上海和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业企业之间，掀起了一个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热潮。各地许多工业企业，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有计划地派出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先进企业，蹲点学习先进经验。这个“比学赶帮”运动的兴起，使我国的工业战线更加呈现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个“比学赶帮”运动，是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广大工人群众和工业企业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进一步唤起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自觉。一些在生产上处于落后状况的企业，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先进的企业则力争更加先进，同时大大发扬了热情帮助后进的共产主义精神。广大群众和干部社会主义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的空前高涨，使“比学赶帮”运动的开展有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这个“比学赶帮”运动，是在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地工业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降低产品成本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摸清了当前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样，当前各地企业之间的“比学赶帮”运动，目的性就更加

明确, 内容也更加丰富。它的主要目的, 在于通过“比学赶帮”, 互相学习和交流先进经验, 促使各地工业企业继续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继续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品种, 降低产品成本, 降低原材料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这个“比学赶帮”运动中, 由于汲取了过去“比学赶帮”活动的经验, 各地在派人互相学习先进经验的时候, 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方法: 由当地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工业企业人员前往其他地方的先进企业学习; 以产品的生产技术关键问题为内容, 以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为重点, 制订出明确的学习计划, 集中力量, 有的放矢地一项一项地学, 一步一步地学; 参加学习的企业人员, 包括了厂长、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 组成一个“三结合”的学习先进经验的班子; 在先进企业学习时, 跟班劳动, 跟班操作, 跟班研究, 边干边学, 真正下“硬功夫”, 把先进经验学到手。这些学习方法是正确的, 为学习先进经验树立了良好的风气。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在各地工业企业之间,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一个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比学赶帮”运动, 效果很显著, 意义很重大。这是一个充分发挥我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 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也就是说, 是在工业战线上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法。

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工业生产, 所有工业企业的同志, 都必须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 发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 而“比学赶帮”运动, 正是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不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好方法。各地工业企业的同志, 既要经常表扬本企业中的先进范例, 发动其他车

间、班组和工人同他们比较，向他们学习；也要放开眼界，经常同其他地区的先进企业，同国外的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进行比较，找出同国内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才能不断地激发企业的全体群众和干部学习先进和赶上先进的革命热忱，防止产生和及时克服安于现状、故步自封的思想。同时，有计划地在各地企业之间开展学习先进和帮助后进的各种活动，就既可以增强落后者赶上先进的信心，也可以鞭策先进者更加先进。这样，广大群众和干部，就会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各地企业之间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也是群众性的互相学习、交流和总结先进经验的好方法。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需要学习社会主义阵营和其他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首先要认真切实地总结和推广我国人民自己所创造的先进经验。我国各地工业企业，在解放以后的生产实践中，尤其是在前几年的大发展和最近两年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中，无论在生产技术方面，在经营管理方面，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千百万群众智慧的积累。把分散在各地区、各企业中的经验，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使其更加完善，就不仅有利于推广已有的先进经验，使它迅速变成各地企业的共同财富，也有利于进一步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更先进的经验。

充分运用先进企业的力量来帮助落后企业，对于加速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很大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先进企业应该成为而且一定能够成为落后企业的帮助者和促进者。资本主义企业之间那种互相封锁技术秘密，互

相倾轧等恶劣风气, 和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 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 是我们能够以高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来发展我国工业的重要条件之一。经验证明, “比学赶帮”是帮助落后企业迅速赶上先进的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只要先进企业热情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先进经验教给落后企业, 只要落后的企业虚心地、认真地学习先进企业的经验, 又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推广这些经验, 就可以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 在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等方面, 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在“比学赶帮”运动中,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 那些在各项经济指标方面还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 应向那些先进的企业学习, 尽快缩短和消除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要把这件事看作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实际行动。应当认识, 先进企业之所以先进,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物的因素, 如机器设备等, 又有人的因素, 如人的精神面貌、人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等。一些先进的企业, 常常是在机器设备等物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在机器设备等物质条件比其他一些企业还要差的情况下, 在产品的质量、成本等方面, 创造出了比较先进的成绩。即使有些先进的企业现在的机器设备比较先进, 但是, 这些机器设备, 也有不少是在原来老的落后的机器设备的基础上, 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 在技术革新中创造出来的。他们积累下来的比较丰富的生产技术经验, 企业管理工作经验, 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等等, 有很多是值得学习的。各地企业在学先进、赶先进中, 只要有高度的革命干劲, 只要有求知的渴望, 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只要有顽强的探索新事物的决心和态度; 只要有正确的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 就一定能够

收到显著的效果。

学先进，赶先进，对于先进的企业也是很大的促进。先进企业的同志，应当热情地接待和帮助各地前往学习的同志；同时也应当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加奋发起来，力争好了更好。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各地很多先进企业，不是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是虚心寻找还存在的薄弱环节。他们积极派人到外地学习先进经验，也主动积极地向到自己企业里学习的各地同志“求教”，力争更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这是无产阶级的高贵的革命品质。所有先进企业的同志，都应当培植这种高贵的革命品质。

在各地工业企业之间开展“比学赶帮”的同时，决不可以忽视在各个企业内部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各个企业都有比较先进的车间、先进的班组和先进的生产者。只有十分重视在各个企业内的车间、班组和个人之间，广泛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的各种活动，并且把企业内部的“比学赶帮”和各地企业之间的“比学赶帮”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比学赶帮”真正成为一个人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我们希望，工业战线上的全体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比学赶帮”运动中去。把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更进一步地开展起来，坚持下去，就必将会促使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更加高涨，力争上游的精神更加昂扬；就必将会促使我国工业生产迅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问题，要算是赫鲁晓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苏共领导口口声声说，他们忠实于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们把世界各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记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赞成和平共处，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主张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领导把自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许多言行，说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鲁晓夫等人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又是怎么样的货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1〕。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2〕。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

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3〕。

直到一九二〇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4〕。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5〕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6〕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7〕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8〕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9〕。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10〕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11〕。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12〕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13〕。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14〕。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

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15〕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16〕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17〕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18〕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

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19〕。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20〕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

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21〕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22〕

十四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们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们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

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们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们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

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23〕。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24〕，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25〕。

（二）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26〕，“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27〕。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28〕。

（三）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

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29〕，“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30〕。

（四）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31〕。

（五）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32〕，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33〕。

（六）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34〕。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35〕

（七）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36〕。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37〕。“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38〕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当代

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申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申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

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

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做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39〕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

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40〕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41〕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

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42〕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

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申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43〕。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44〕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

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 适应美国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45〕，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46〕。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47〕。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48〕。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就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49〕。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50〕。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续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51〕。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52〕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53〕。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54〕。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55〕。“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56〕。“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57〕。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58〕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59〕。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60〕。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

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

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61〕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62〕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 “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

一个其他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63〕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64〕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65〕。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66〕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67〕，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68〕。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

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69〕。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注 释

〔1〕《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2〕《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9页。

〔3〕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8页。

〔4〕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0页。

〔5〕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

〔6〕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页。

〔7〕《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3—124页。

〔8〕《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7页。

〔9〕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5—446页。

〔10〕《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2页。

〔11〕《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4页。

〔12〕《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76页。

〔13〕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

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9页。

〔14〕《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页。

〔15〕《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3页。

〔16〕《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页。

〔17〕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6页。

〔18〕《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见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苏联《真理报》。

〔19〕《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48页。

〔20〕《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0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2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23〕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波诺马廖夫：《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旗帜》。

〔24〕《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1期，鲁勉采夫：《我们的共同的思想武器》。

〔25〕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26〕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加渣玛达大学的讲话。

〔27〕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28〕苏联《消息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编辑部文章。

〔29〕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给肯尼迪的贺电。

〔30〕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31〕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32〕《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12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33〕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二年第2期，第89页。

〔34〕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波诺马廖夫：《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35〕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36〕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37〕《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12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38〕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39〕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40〕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苏联《真理报》。

〔41〕《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42〕《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4、347页。

〔43〕《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页。

〔44〕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45〕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我们对尼基塔必须友善到什么程度？》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

〔46〕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电视谈话。

〔47〕英国《时与潮》周刊文章：《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四

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48〕法新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华盛顿电，综述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

〔49〕美国前副国务卿狄龙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

〔50〕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51〕肯尼迪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52〕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

〔53〕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谈话。

〔54〕腊斯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55〕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56〕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57〕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

〔58〕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59〕肯尼迪：《和平战略》，第199页。

〔60〕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

〔61〕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62〕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63〕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64〕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65〕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同美国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66〕葛罗米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67〕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在纽约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68〕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69〕苏联《消息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评论员文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 学习，克服固步自封、 骄傲自满的指示

——批转湖南省委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1〕}。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

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

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 不作调查研究, 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 往下灌的东西多, 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 因而脱离群众, 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 他们开始改变了, 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 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 还有省和市的干部, 组成两个考察团, 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 请你们注意研究, 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 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 请你们提出。

中 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李瑞山、华国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的指示, 本书从略。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萧华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

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附薄一波同志给我的信^{〔1〕}一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指薄一波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你十二月十一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十三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在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

中共中央关于在春耕前 普遍讲解一次两个文件的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总政，中央各部、委党组、党委：

（一）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参考。

（二）请你们把这件事认真抓起来，争取在春耕以前，在农村、城市、军队、机关、学校（小学除外）普遍讲解一次，并且略作讨论，粗线条地解决一些问题。

（三）要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给予指导。

（四）农村中分期分批进行点上的工作，同时进行，不要放松。

中 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 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 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央、华东局，并告各地、市、县委：

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下达以后，我们除了立即组织县以上机关干部和一万七千名工作队队员学习中央两个文件以外，并部署各地先在县、市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读讲解，还要求地、市委的负责干部亲自深入一两个社队向群众试读讲解。目前，已有四十二个县、市的三级干部会议和二十三个面上或点上的先行公社，进行了这一工作。

中央两个文件，一经与基层干部和各阶层群众见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澄清了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疑虑和猜测，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央的这两个文件，称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章程”，干部自我革命的“好镜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为：中央把文件发到大队、生产队，每一次都会发生巨大的威力。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决定“十二条”，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年的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好；这次贯彻这两个文件，一定会出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发展的局面。在

宣读讲解的过程中，各地普遍的情况是，到会的人数多，会场的秩序好。江都县艾菱公社刘庄等四个生产队，宣读讲解文件的时候，第一天到会八十五人，第二天九十二人，第三天一百一十人，第四天一百二十五人，过去一直不参加会议和常年不出门的人也几乎都来了。

基层干部听了中央两个文件的宣读讲解以后，提高了阶级觉悟，消除了不少疑虑和误会，弄清了一些过去长期没有弄清的问题。他们不仅看到了当前还有阶级斗争，而且认识到这种斗争已经反映在自己身上；自己不仅要好好地洗手洗澡，而且要牢牢记住“五个不能忘”、“七个不准干”。普遍反映：“学了文件，分清了敌我，明确了方向，找到了病根，清醒了头脑。”他们对于文件中阐明的对待干部的方针政策有四个满意，即：对干部的全面估价满意，对“十六字方针”满意，对“冷处理”的办法满意，对开头就把政策底细全部交给他们满意，认识到这次运动“不是换班子、倒干部，而是换思想、救干部”。很多干部反映：“党中央，毛主席，教育干部苦口婆心，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帮助干部仁至义尽，处理干部实事求是，真像大寒天的太阳，晒在身上，暖到心里。”不少干部表示：“党向我们交底，我们要向党交心。”有些干部还主动找领导上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大家认为，有了中央的两个文件，今后农村工作就有了“准绳”、“标尺”、“方向盘”，事情好办了。普遍反映：“今后要牢牢记住一个纲，两个团结，三大革命，四个基本建设，五个要点，工作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不会出轨了。”广大贫农、下中农听了中央两个文件的宣读讲解以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他们对于中央重申必须坚持贯彻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特别感动。尤其是贫农、下中农受到歧视和排挤的地方，广大贫农、下中农的心情

更是豁然开朗。有的反映：“过去不把我们当作二百钱数，现在仍要我们作擎天柱，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我们贫农、下中农的心！”“听了文件上的话，心头暖了，眼睛亮了，腰杆直了，腿肚子也有劲了。”他们对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热烈拥护，拍手叫好。反映说：“社会主义教育再不搞，地富反坏要造反，资本主义要泛滥，干部思想要变坏，农民团结不起来，集体经济难巩固，贫农、下中农要吃苦。”他们对于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实行“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建立贫农、下中农组织，最为满意，认为是“说了贫农、下中农心里要说的话，办了贫农、下中农心里要办的事”。有些贫农、下中农，这几年来，敌我界限、社会主义方向逐渐模糊了，现在认识到自己是党的依靠力量，阶级责任感和主人翁思想提高了；有的还自觉批判了过去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表示要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农听了中央两个文件的宣读讲解以后，情绪开始稳定，开始向贫农、下中农靠拢。中农，主要是上中农，原来不少人怕斗到自己头上来，怕戴资本主义帽子，怕重划阶级成分。当他们了解到党的团结中农的政策以后，“千斤石头落了地”，反映：“党对我们中农还是没有当外人看待。”广大中农对于实行“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以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为“都是好政策”，“照着这些政策办，办好集体经济有指望了”。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原来也是受苦的人”，“和贫农、下中农是一根藤上长的，今后一定和贫农、下中农走一条路”。过去和地富反坏勾勾搭搭或者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人，有的开始主动地向干部打招呼、做检讨。

地主、富农子女听了中央两个文件的宣读讲解以后，十分

感动，普遍感到有了前途。有的反映：“过去对地主、富农与地主富农子女要区别对待，别人弄不清，自己也弄不清，总认为自己是‘小地主’、‘小富农’，前途渺茫，很难做人；现在了解了党的政策，认识了自己的前途，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们对于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划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最为满意，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党的政策合情合理，英明伟大。”他们认为，文件中分析他们的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是完全正确的，指出他们中间多数的人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是对他们敲起的警钟，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加强自我改造。有的说：“自己出身在肮脏家庭，幸亏生长在新的时代，有了共产党的指引，一定要做新社会的新人。”

地富反坏分子对于向他们宣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普遍感到意外，说这两个文件是“两好”政策——对四类分子好，对四类分子子女好。开始认识到只要劳动守法，自己有前途，子女也有前途。有的说：“过去是生死不知何日，今天改造有了灯塔。”“过去担心自己的前途是监督生产——依法管制——逮捕劳改；听了中央文件，心里落实了。”还有的说：“国民党错杀一千，不放生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仁义服人，再不真诚接受改造，真是天地难容了。”也有的说：“政府政策已经交代得明明白白，再不老老实实也不行了。”有的四类分子，当场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违法行为，修订了自己的改造计划。

在宣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过程中，各地也发现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是：（1）有些干部群众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对能否贯彻执行还有怀疑，反映：“说是这样说，就怕办不到”。（2）有些干部群众认为，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和对待四类分子的政策“太

宽了”。有的反映：“每次处理干部都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究竟什么时候才算‘今后’？”“对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像是对他们专政。”也有少数干部认为退赔政策规定得“太严了”，叫喊“退不起，赔不出”。（3）少数和地富分子结婚的党员、干部，上中农成分的大队、生产队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在当地工作的基层干部，思想上有些波动。以上这些问题，今后都需要解决。

根据各地试读中央两个文件的实践，要做好宣读讲解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宣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一般应当先读“决定（草案）”，经过讨论学习，着重解决“一纲、五点”的认识问题；然后再读“规定（草案）”，弄通具体政策。这样做，能够使干部群众比较深刻地领会两个文件的精神，效果较好。有些地方一次读完两个文件，然后组织讨论。这样做，干部群众听得吃力，记不牢，效果不够好。还有的地方将两个文件中的有关部分组织在一起，分作几个问题，宣读一个问题，讨论一个问题。这样做，虽然问题比较集中，但是，不能很好体现两个文件的完整的精神，而且掌握不好，容易断章取义，一般也不宜采用。

二、在县、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读讲解两个文件，可以大会宣读讲解，也可以分大组宣读讲解。大会宣读讲解，可以由县委和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宣读讲解，质量要好一些，但是，如果到会人员过多，会场条件不好，人多声杂，容易影响效果。分大组宣读，虽然宣读讲解的人员条件要差一些，但是，能够避免大会人多声杂的缺点，而且能够使较多的领导骨干得到一次实际讲读的锻炼，有利于今后更好地向群众进行宣读讲解。

采取后一种做法，领导上要认真选择宣读讲解的人员，充分做好“备课”工作。

三、在群众中宣读讲解，一般应当先党员、积极分子，后一般社员，再四类分子。个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可以吸收他们和一般社员一起听，不要叫他们和地富反坏分子一起听；听过以后，由领导上找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和教育，不要吸收他们参加社员的小组讨论会。向党员、积极分子宣读讲解，一般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向社员宣读讲解，可采取在一个大队范围内分片宣读的办法，但是，分片不宜过多，否则，不是宣读讲解的质量不高，就是宣读讲解的人手摆布不开。向地富反坏分子宣读讲解两个文件，应当以大队为单位进行。

四、在宣读文件时，进行重点复述讲解，帮助干部、群众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随意发挥，曲解文件的精神；不能过多地联系实际，扯得太远；更不能把个人的意见和文件的精神混在一起。哪些地方需要复述讲解，怎样复述讲解，哪些地方需要联系实际，联系哪些具体事例，都应当在“备课”时，经过集体讨论确定下来，决不能由个人随心所欲地临时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宣读讲解以后，要认真组织小组讨论。领导骨干，一方面要继续帮助大家复习文件，忘记再读，不懂再讲；另一方面可以联系实际，漫谈个人体会，帮助大家更好地领会文件的精神。

五、要训练好宣读讲解的骨干。除了要训练好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以外，由于面上宣读的任务较重，而时间也不宜拖得很长，因此，还需要选择一批有宣读讲解能力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或相当于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级的干部，加以训练，参加宣读讲解工作。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中央、华东局指示。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